

## 目 录

我经营猪鬃二十余年的回顾 .....	古耕虞 ( 1 )
蒋介石解决龙云的经过 .....	杜聿明 ( 32 )
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 .....	邓汉祥 ( 53 )
蒋介石派张群图川的经过 .....	邓汉祥 ( 72 )
记谭延闿 .....	陶菊隐 ( 90 )
抗战期间阎锡山和日寇的勾结 .....	南桂馨 赵承绶 (117)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亲历记 .....	周大文 (128)
韩复榘的特谍队和张宗昌的被杀 .....	王慰农 (135)
四川綦江战干团惨案回忆 .....	周振强 (143)

## 附 载

编写“辛亥革命到太原解放山西历史资料”工作

总结 .....

(147)

## 附注

对《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五十二辑二四九页

对《记谭延闿》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

第三十一辑二九四页

对《抗战期间阎锡山和日寇的勾结》一文的补充和订

正见《选辑》第七辑一六九页

对《韩复榘的特谍队和张宗昌的被杀》一文的补充和

订正见《选辑》第二十三辑二二一页

对《四川綦江战干团惨案回忆》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四十三辑二六三页

## 我經營猪鬃二十余年的回顧

古 耕 虞

从前清末年起，我的叔祖就开始經營猪鬃生意，后来父死子繼，衣鉢相传，到我这一代，已經有三代的历史。我家这份传家的事業，最初只是一个封建性的独資經營的川帮行业，經過我們祖孙三代数十年的惨淡經營，逐步发展成为现代化的資本主义大企业，再一跃而成为資本雄厚、世界馳名的托拉斯組織。数十年来，我們这个商号的招牌屢經变更，但是它所出的虎牌鬃却一直在世界市場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享有很高的声誉。我国的猪鬃产量向居世界首位，最高时曾达全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八十；如果单就我們的虎牌产品來說，最高时曾达世界总产量百分之七十。解放以后，这个以紅色老虎作为商标的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的信誉仍然保持不墜，虽然它的性質已經起了根本的变化——已經从一个为資本家追逐利潤的工具变成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設积累資金的工具。

由于我們所經營的这个商品是工业上不可缺少的用品，在战时更是一项重要的战略物資，利潤很大，因而同业之間的竞争以及与官僚資本的斗争非常激烈。同时，更由于它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外銷物資，我們在几十年来的經營过程中，就不可避免地要同帝国主义势力、同国际垄断資本发生关系。我們同它們既有过尖銳的斗争，也有过密切的联系，这其中的过程和内容是极其錯綜复杂

的。作为一个曾經亲身主持其事的当事人來說,把我过去二十多年来对于猪鬃这个商品的資本主义經营活动作一番回顾,將对中国資本主义发展史的研究工作,可能会有一些参考作用,同时对于加速我个人的改造,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 一、古青記时期（一九二五——一九三七）

### 我在青年时代的立志

在开始叙述我經營古青記的历史以前,我想先談一下我在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和当时的志愿。我于一九一九年入上海圣約翰大学的預科,主要是学习英文。我父亲送我入这个学堂的原因,就是由于他不能說英語,受尽了买办的气。当我在中学三年級讀書的时候,暑假期中有一天,我父亲回家告訴我說,隆茂洋行的买办程桂亭有意同他为难,收了他价值規元銀二十万两的猪鬃,借口貨次,不付价款。他非常为难,要我陪同他去見隆茂的洋大班,替他作翻譯。第二天我們去了,事情解决了,但这件事使我認識到外国人和买办的可恨,他們既賺我們的錢,还要拿气給我們受。当时我想,假如我們的事业要发展,能发更多的財,非將自己的产品能直接运到英美市場銷售不可,否則无法不受老牌洋行和买办的气。因为有了这种动机,我在学校学习英文和資本主义的对外貿易、运输、保險、銀行等方面的課程,就認真下了一番苦功。經過好几年的学习,对外国人經營貿易的一套,我也具备了一些书本知識。

### 一紙祕密合同打开了直接外銷的通路

一九二五年我离开圣約翰大学以后,就参加了我父亲独資創

办的古青記字号,开始着手筹备直接向国外推銷猪鬃的业务。但是我們几經研究,总认为如果試行向英美推銷,上海各洋行将会同时联合起来抵制我們,用种种办法設法使我們失敗;可能我們直接外銷未成功,而我們反将先受到洋行的抵制,业务馬上就会受极大的影响。后来我們在与美国的猪鬃大王孔公司代表接触当中,了解到美国市場上的虎牌鬃,一向都是間接从英国伦敦市場上购进的,它們如果和我們直接交易,直接向我們购进虎牌鬃,它們就可以避免上海洋行和伦敦进口商的双重分潤,取得比較便宜的原料;而我們如直接卖給孔公司,售价虽較伦敦市場为低,但較之售給上海洋行的价格則高得多,因为我們也可以避免上海洋行的中間剝削。因此,我們和孔公司直接掛鈎,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当然也是双方所乐意的。但是当时双方对于这种做法都有顧慮,都害怕被上海和伦敦的中間商知道之后,他們将会对我們的交易进行破坏。我們和孔公司的代表經過多次商討,决定采用一种对上海洋行保密的办法,即:我們銷給孔公司的虎牌鬃,不用古青記的唛头(装船标志),而用“LT”两个毫无意义的字母作为唛头,装貨人也不用古青記的名义,以掩过上海洋商的耳目。我們就这样在一九二六年間和孔公司签订了秘密合同,开始建立联系,以一部分虎牌鬃直接出口,运銷美国,并且逐渐增加数量,最后終于完全甩掉了上海洋商,全部直接出口。

从此以后,不但我們最初所抱的直接运銷国外市場的目的达到了,而且在这种局面之下,無論洋商或是本商,都无法同我竞争。我获得的利潤也是与年俱增,除了个人和家庭消費一部分外,大部分轉化为資本。到一九三四年,古青記的資本已相当雄厚。一九三四年,中国銀行見我在上海市場售出外汇甚多,非要将这笔外汇排入

它的业务中不可，即由該行上海总行命令渝行給我押款一百萬元，以外匯售給該行為條件。於是，我的銀行信用資本增加得更多了。

### 我所受到的帝國主義在華勢力的歧視和排斥

在這期間，我的豬鬃企業雖然由於同國外市場直接聯繫而發展得很快，資本積累得很多，但是同時也受盡了帝國主義勢力的種種歧視和排斥；同官僚資本家和其他民族資本家之間，也是矛盾重重，競爭劇烈，極盡勾心鬥角之能事。

在華的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帝國主義對我的歧視和排斥，首先表現在海關方面。在以前，中國本商不能直接報關，必須由報關行代辦，這樣，就比洋商直接報關，要多花一筆報關費和水腳回扣。當我向重慶關註冊報關時，重慶關不允我註冊。經我一再抗議，并向總稅務司衙門和南京財政部控告，要求與洋商一律待遇，准予直接報關。經過一年多的鬥爭，結果仍須先繳三千兩關平銀子作為保證金，才得到批准。外商不但不需要繳保證金，而且他們的貨可以隨時通過稅務司免驗放行；而我則常常受到種種刁難和歧視。

其次是外商銀行的歧視。一九二五——一九三四年間，上海外國銀行商行林立，它們各自扶持他們本國的商人，給以種種便利和支持，而對於我則不但不給予打包放款，並且非要拿到提單，所有手續一切俱備之後，方准給與結匯。如果手續差一點兒，甚至如果打錯了一個字，它們就借端挑剔，不給結匯。一九三五年以後，中國銀行和上海銀行加入國際匯兌銀行界業務後，洋商洋行因為要同它們競爭，對我們的態度才比較好一些。

再次是稅收上的不平等。外商除了按照協定繳納關稅以外，其他稅目均一律不繳。而本國商人則除了關稅之外，還要繳所得

稅、營業稅、印花稅等等，至于苛捐雜稅，更是名目繁多，數不勝數。這樣，本國商人因成本增大，也就無法和洋商競爭。

最後，在運輸方面，當時長江航運主要控制在英國人手中。它們在運價和噸位方面都給外商以特殊照顧和優先權利，中國商人被其扼制，只好忍氣吞聲，望洋興嘆。一直到了北伐前後，反帝運動形成高潮，特別是在萬縣慘案以後，川江的駁船曾長期拒絕裝卸英、日輪船貨物，同時，中國人自己經營的輪船航運也逐漸興起，本國商人才有路可走。

### 在同合中公司的一次較量中擊敗了官僚資本

在這一段時期中，曾經同我較量過的官僚資本，主要是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官僚資本、或者說江浙財閥資本，具體的對手是朱文熊的合中公司（朱系江浙財閥、中國銀行經理張公權的妹夫）。合中公司註冊資本為五百萬元，一九三四——三五年間，在重慶設立分公司，開始經營豬鬃。朱自以為實力雄厚，竟咄咄逼人，向我提出無理要求，要我把虎牌產品完全就地出售，由他收購出口。我婉言謝絕後，朱一怒之下，就在重慶出重價收買豬鬃，意欲將我排出市場。但是豬鬃的收購、加工和售賣，技術複雜，如果沒有熟練人才，非失敗不可。我家經營豬鬃事業，在我之前已經有兩代的历史，我祖我父留給我不少人才，而朱却是沒有這個基本條件。我和朱文熊之間的這場序幕戰開始後，我就有意識地提高虎牌的品質，同時暗地里支使別人將次貨（即小廠委托我加工的不够好的貨）售與他。他買得了這批次貨，不特量不如我多，質更差得遠。在抗戰前一、二年間，合中公司也收了几千箱貨，運往英倫市場售賣。但是英國多年來早已習慣用我的虎牌鬃，他們的鬃在倫敦市場上銷不出

去。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們又做了一种飞虎牌鬃,并向英伦买主担保,质量和我們虎牌鬃一样。我待他們成交以后,将虎牌鬃在英伦市場的价格有意識地放低,造成一个我的虎牌价廉物美而他的飞虎牌价高貨次的鮮明对比。两三个月后,双方面的貨都运到了英国,英国购方見到他們貨次价高,羣起要求退貨还錢,賠償損失。合中公司透过国民党政府駐英公使顧維鈞从中交涉,也毫无結果,最后只好交付仲裁。

按照英国的仲裁方式,規定由中国卖方和英国购方各指定一个鬃商作为代表,再由鬃商公会指定一个有声望的鬃商听取双方代表的意見作出仲裁书,交法院执行。而这次鬃商公会指定的仲裁人恰巧正是我的虎牌鬃的代理人克罗克斯。朱文熊了解到这一情况之后,感到冤家狭路相逢,他若不打通我这一关,可能要吃非常大的亏。所以他不惜約了张禹九(张公权之弟)来到重庆拜訪我,以放弃在重庆經營猪鬃业务为条件,請求我出面調解,他希望做到承認賠款而不退貨(按照英国仲裁法令規定,賠款如超过貨价百分之十二点五,买主有权或者接受賠款,或者将貨退回原主,要求賠償一切損失;賠款数量有限,而退貨并賠償一切損失則吃亏大)。这件事我当然乐得做个人情,于是我假充好人,写信、打电报到英国替他說項,結果,双方同意解决这个問題。到此,这个強大的竞争者不到一年,就被我打敗,举手投降。从此以后,江浙財閥集团在这段时中不敢再来西南同我竞争了。

我同西南軍閥資本虽然也有矛盾,但不是主要的。其中比較大的一个对手是张志和(第二屆政协委员)。他曾任二十四軍的师长,下台后拥資不少,在重庆以五十万元独資開設了一个和姓商号,运銷猪鬃到上海,售与各洋行。他的資本虽然雄厚,但是由于



不懂得价格规律,其他技术条件也不够,经营不得法,同我竞争不到数年,终于折本不能继续经营。

### 古青記垄断局面的形成

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四年,重庆经营猪鬃的出口商(指由重庆贩至上海)先后不下数十家,互相竞争,此起彼倒。到了一九三四年,大鱼吃小鱼的结果,除去我的古青记外,只剩下鼎瑞、祥记、和祥三家。此三家尽管还能支持不倒,但是业务也奄奄不振。而我的业务则蒸蒸日上,年年上升,资本有显著的增加。如果继续再竞争下去,这三家亦不能维持,非倒不可。于是我就假作好人,提议停止竞争,并出资维持和祥,由我兼经理。几经商量,达成协议,内容大体规定我做百分之七十,其他三家经营百分之三十,购买和售卖价格规定彼此协商,实际上全由我指挥。协议签订后,实质上形成了一个由我操纵运用的统购统销局面,他们虽然也有一些利润,但是很少,而我的利润则较前更大。从此,就由互相竞争局面进入到一个由我垄断的局面。这个垄断形成之后,我的资本积累更快更大,也就是说,我的剥削程度更深了。但是这个集中经营的局面,在对付帝国主义,同帝国主义掠夺原料、压价收购作斗争方面,是起了一定程度的积极作用的。

我如何能够在长期竞争中把大多数对手打倒,并且最后使仅存的三家中,一家被我兼并过来,其余的两家俯首听命呢?除了我的父亲所遗留给我的一批技术人才以及虎牌商标的信誉而外,主要是由于我有雄厚的资本和一套现代的贸易技术。此外,我的企业职员待遇比其他同业高过几倍,并且欢迎他们入股做股东,使他们甘受剥削,并代资本家剥削生产工人,创造更大更多的剩余价

值,从而增加更多的积累。同时,我的資本愈集中,我对銀行的信用也就愈大。我对銀行的利用,最初是从重庆的錢庄开始,进而发展到重庆的商业銀行,再进一步发展到重庆江浙財团的銀行和当时的官僚資本銀行。这些因素的总和,就使竞争者无法立脚。以下再就几个主要原因加以分析:

首先,因为我的資本雄厚,所以能够在冬季产禁季节大量收购生禁,备足一年的原料,而其他竞争者则仅能有收购半年、最多不过七、八个月原料的資本。同时,我又可以利用資本雄厚这个优越条件来选择技术最优良的工人。工人技术优良,不特成品出得好,而且又出得多。我們虽然和别的厂一样,也是采取計件工資制,但因产品多的关系,成本就比别的厂輕。而且别的厂只有半年生产,而我的厂則能全年开工,可是固定开支是一样的,这样,成本自然也比别的厂輕了。半年开工的厂,工人生产情緒不高,特别是每当原料快要用完、眼看就要停工的时候,工人們往往进行怠工或罢工,因为他們在停工以后,要等到第二年恢复生产时才有工可做,能够把生产時間拖长一点,总好一点。而我厂則由于全年开工,沒有这种現象。

其次,我的竞争者都只能把貨販运到上海,售与上海的洋行轉售英美市場,而我則是直接运售英美。由洋行轉售,它們至少要从中间取得百分之五的中間商利潤。同时,貨物由上海运銷外洋和由重庆运銷外洋,保險費是同一个保險率;在重庆結汇和在上海結汇、汇率也是一样的。因此,我把产品由重庆直接运銷外洋,从重庆到上海这一段途程的保險費和利息負担,就可以減免。这样,我的虎牌产品在国外市場上的价格,虽然同我的竞争者的产品差不多,但是我所获得的利潤,常常高于他們百分之十左右。这种經營方式,簡單說来,就是由产地收购、原料加工,一直到推銷国外,一切都自

己一手來作，不把剩餘價值分給別的資本家。而這種經營方式，在當時只有我這家古青記能夠這樣作，其他同業是無法辦到的。

## 二、抗戰時期的四川畜產公司

(一九三七——一九四五)

### 四川畜產公司的成立和抗戰初期的暴利

抗戰爆發前夕，古青記得到了長江即將封鎖的消息後，就商得其他三家商號同意，將他們的成品交給我，連同我的成品，一齊全部結匯出口（當時是直報外洋的提單，貨物在重慶裝船後就結匯），所以我的資金非常充裕。而其他商號則因長江封鎖，無法出口，票價暴跌，瀕於破產。後經我出面，商得他們三家的債權人同意，由他們將票交與古青記經粵漢路、滇緬路或航空運出，售賣後優先清理債務。他們的債務清理完畢後，即經當時國民黨政府貿易委員會的督促，將他們三家商號併入古青記，合併成為四川畜產公司（以下簡稱“川畜”）。

抗戰初期，國民黨政府宣布了各種戰時法令，將豬鬃列為管理結匯出口物資。當時美匯牌價規定為三元三角，但因物價暴漲，匯價脫離了物價，商人羣起請願，要求改訂外匯牌價，而川畜又是比較大的一個企業，不得不帶頭請願。國民黨政府以提高匯價將引起物價上漲為借口，不允提高牌價。經過反復鬥爭，不但毫無結果，反而引起了執政者對我們的不滿。這時鬃的結匯價格低於實際市場價格，我即將多余的外匯來賣黑市，以抵償成本之不足。但終因物價漲得快，生產無法維持，最後不得不走上統購統銷的道路。

在統購統銷的初期，在豬鬃外銷方面，僅有川畜一家與經辦統

購統銷業務的國營富華公司簽定供應合同，先由富華公司付給牌價百分之七十，待貨運到香港賣出後結算。適逢這年豬鬃的生產少，而备战需要特別大，因而鬃價暴漲，重慶二十七號配箱每磅由一元二角漲到三元餘，同時外匯美元價格又由三元三角改訂為二十元。於是，川畜獲得了暴利。這麼一來，一方面引起了一部分人的責難，認為這個辦法太有利於商人，使商人大發國難財；另一方面四川民族資本和銀行資本對這個行業也眼紅起來，認為大有做法，於是羣起向財政部和貿易委員會請願，申請批准成立公司，加工豬鬃出口。在各方面壓力之下，國民黨政府批准成立的，有潘昌猷的崇德公司、劉航琛的和源公司、美豐銀行的寶豐公司、上海銀行的新華印刷廠等八、九家，但我公司仍能占主導地位，產量占全部的百分之六十——七十，約一萬担左右。

當時日美關係已趨緊張，在日本未發動太平洋戰爭以前，我已看出香港地位不穩，屢次建議富華公司將轉運中心由香港移至仰光，既可節省運費，又可避免危險。當時富華公司總經理席彬儒惟恐自己遠出後，大權將落到他的協理手裡，因而不肯照辦。日本侵占香港後，我公司在港存貨計值美金百餘萬元，完全成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戰利品！

### 統購統銷和復興公司

美國參加世界大戰後，需要豬鬃數量增多。但是在日寇侵占香港、新加坡、緬甸等地以後，中國對外的陸上交通已完全斷絕。在這種形勢下，為了加強外銷物資的統購統銷，當時的統購機關富華公司和中茶公司均併入了復興商業公司。

在這裡我要介紹一下復興商業公司的性質和歷史。復興商業

公司成立于日美宣战前一、二年,当时美国政府不甘坐视日帝国主义独霸中国,影响到它的在华利益,所以借了一笔款子约一亿元给中国政府来购买美国的战略物资,以“支援”我们抗战。但是它又不愿公开此事,以免引起日美关系尖锐化,于是在美国成立一个世界公司,在中国成立一个复兴公司(注册资本为一千万法币),表面上说这笔借款是商业性质,由复兴商业公司以桐油等商品偿还,我和李义斋(桐油商)均任董事,名义上各出资百万左右,其余董事都是当时财政部指定的,有宋子良等共九人,陈光甫任董事长。美、日宣战后,复兴公司已无保密必要,就正式直接隶属于财政部,我的董事名义亦因复兴改组而被取消。当时苏、美、英均需要猪鬃甚急,所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成立了一个三国代表共同参加的猪鬃分配机关,负责交涉向中国取得猪鬃并分配所取得的猪鬃,英、美两国国内也各自设立机构来分配这个战略物资与各工业部门。英、美两国这些主要部门的工作人员原来都是一些商人,和我都有往来,相当熟悉。在他们组织就绪的时候,就派了一个和我非常熟的美国人作代表来重庆交涉猪鬃的供应问题。当时他们提出要求,为了争取战争的胜利,中国每年非供应盟国三寸至六寸的长鬃一万担不可。在英、美的一再要求下,复兴公司宣布统购统销法令,内容主要是,除统购统销机关或指定机关运销外,不能买卖,也不许屯积,违则没收法办;被指定的特约商人按年按季交给复兴公司若干箱猪鬃;复兴公司对指定商人的关系,系核定成本加合法利润。当时指定商人除川畜外,还有崇德、宝丰、和源等八、九家商号。

复兴公司的牌价大约每季调高一次。因为通货膨胀,物价不断上涨,牌价上涨总是远远跟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从货币数字上看,牌价是不断调高的;但是从实际购买力来计算,则是不断下跌。

牌价最低时，如以实物計算，猪鬃二十七号配箱二十箱仅等于一件棉紗；但在国际市場上每箱鬃价为美金七百八十元，而每件棉紗仅值美金一百五十元。照此換算，則每箱鬃的牌价只等于应值价格的百分之一点四。所以在調整牌价的問題上，鬃商总是不断向复兴公司作斗争。而复兴公司一方面为了保證物資供应，必須維持鬃商，不让他们停止生产，但另一方面又不让鬃商賺錢，又要保持統銷利潤，所以也不肯让步，因而双方常常相持不下。我公司因大量生产，成本較輕，于是常常周旋于双方之間，使牌价定出，方能支取貨款以应开支。当时苏、美、英三国均有常駐代表在重庆，天天向复兴公司催貨，复兴公司到期非交不可。因为我和英、美代表是熟人，常常見面，所以知道复兴公司的这个弱点。因此，我和其他同业就抓住它这个弱点，利用“盟国”的力量来向复兴公司作斗争，而复兴公司因为英美代表逼得很紧，在价格上有时也不得不向商人让步，这样他們才有貨可交。

### 抗战期間川畜在国民党反动統治压榨下繼續发展

在抗战期間，川畜除了統购統銷的牌价問題而外，还經常受到軍隊、特务和稅收机关的种种刁难、苛索和压榨。例如：当时为了取得足够的长鬃，必須設法自华北淪陷区取得一部分原料，才能滿足需要。但是我們所派收购人員通过战区的时候，虽然执有通过証和貨物許可証，常常为軍隊所扣留。我們把人、貨要回，非常伤脑筋，常常經时数月，方能办通。又如：經濟检查队这个特务机关凭借特权，横行霸道，时常借故敲詐商人，索取賄賂。我公司在年初訂合約而年底尚未將貨交清的情況下，竟被特务机关指控为囤积居奇，將我和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关起来查了七、八天賬，他們的

目的就是想发一笔财。在稅繳方面，猪鬃因系統銷貨物，当时照章不納营业税，但营业税系地方稅，这样一来，地方稅收机关就非常不滿，营业税局常常来打麻煩，找岔子。至于所得稅，各商号如照賬面上看来，應該說是有所得的，但是在通貨恶性膨胀的情况下，商家如要照賬面上的所得来照章交稅，則非关門不可。因此，两套賬和向稅收机关行賄，就成了各商家司空見慣的应付手段了。結果，稅局收不了稅，稅务人員发了財，而商人則不堪其扰。

在抗战期間，我們同工人之間以及我們同业之間，矛盾并不大。工人階級覺悟高，他們为了支持抗战，虽然在物价高涨、实际工資不断降低的困难条件下，生产情緒并不低落。如我公司在重庆的三个厂，在同一天被日机炸毀，而各該厂的工人均能搶救猪鬃，即日迁移到山区，使損失达到最低限度。在工資問題上虽有斗争，但总能在抗战大前提下很快地得到解决。猪鬃商品質量，一般說来在战时都能維持标准，而我公司的虎牌鬃更能維持較高的标准，盟国駐重庆检查人員也从未提出异議。这些事实都可以說明当时工人階級支持抗战的生产积极性。

同业之間，在战时虽然也有竞争，但是由于大家为了共同利害，联合起来一致向当时政府主管机关开炮，相互之間的矛盾退居于次要地位，較之抗战前那种你死我活的斗争情况，要緩和得多了。

总的說来，在抗战期間，我們的业务虽然也有发展，但是不易維持；資金虽然也有所积累，但也是有限的。川畜在抗战时期的主要成就，是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从一个地方性的川帮企业上升成为一个全国性的大企业，为以后的大发展創造了良好的条件。当时川畜担負着这个战略物資的生产的主要責任，除了四川这个主要

基地之外，还在黔、滇、陕、甘、湘、鄂、豫等省地区广設收购和加工机构。在国际市場上，我們的虎牌鬃占全部銷售量百分之七十，于是老虎牌的声誉比战前更高了，英美的进口商全都知道川畜的名声了，英美的厂商更习惯于用老虎牌鬃了。这种情况下，就为日本投降后川畜进一步垄断全国的猪鬃貿易打下了稳固的基础。

### 三、抗战結束后的大发展(一九四五—一九四八)

#### 反对統购統銷、恢复自由貿易的斗争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鬃商馬上羣起向复兴公司开炮，要求結束复兴公司，准許自由貿易。当时重庆的报界除《时事新报》外，均表示支持，羣起写文章，特别是党领导的《新华日报》和《商务日报》，更是大力支持，揭发复兴公司的官僚腐败情形，批評統购統銷政策不合于平时，声势頗为浩大。

与此同时，猪鬃工人經過抗战八年底工資的殘酷剝削，也举出代表来我家見我，对我說，如不加工資，就要举行大罢工。我就对他們說，如果統购統銷政策不取消，增加工資是非常困难的，暗示他們举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資，必須同时反对統购統銷政策。果然，猪鬃工人大罢工举行了，数以千計的男女工人由重庆的南岸渡江，列队到曾家岩行政院請愿，要求增加工資，取消統购統銷。請愿工人为軍警驅散后，其他各公司的工人也不回厂，进城駐进了各公司，因为他們的原料已經用完，无法生产了。但是我公司的原料当时仍存甚多，同时我又答应工人俟新工資标准确定后，工資照新标准結算。因此，我厂工人仍旧回厂安心生产。由于輿論界和工人罢工的压力，同时各外国商人也要求中国取消垄断的統銷，恢复



自由貿易，各國政府也間接表示了这个态度，經過一段时期，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就約了我和同業康心远以及复兴公司的總經理席彬儒談話。我在这次历时二小时的談話中，說明我在战时对这个政策虽然也曾历次表示不滿，但为了抗战，我当时拥护了这个政策；現在抗战既已結束，如果仍繼續实行这个政策，我是坚决反对的，因为这个政策使生产受到限制，影响国家的外汇收入，太不合算，同时也要受到盟邦的反对。宋子文最后表示要考虑我的意見。大約一、二星期后，行政院明令废止了統购統銷法令，撤銷了复兴公司。

### 同美商孔公司的进一步結合以及相互間的矛盾

复兴公司的撤銷大約是在九、十月份。四川畜产公司見統购統銷法令既已取銷，而同时英美对猪鬃的战时法令亦告同时取銷，正是恢复自由貿易的大好时机，当年就分別在汉口、上海、天津、沈阳成立了分公司，各就該地原料就地加工出口。这几个大城市原来的鬃商在日本占領期間，資本已大部分損失，而日、德商人又被国民党政府遣返本国。英美資本虽然有一部分活动，但在当时汇兌管理的情况下，也不愿把大量外币汇来，以免将来无法汇出，坐看它变成法币，天天貶值。而川畜因在抗战时存有短鬃几千箱，在統銷法令取銷后，即以重价雇帆船运宜昌轉上海出口。当时国外长期缺貨，短貨的市場需要特別好，所以这笔貨售得之款，就可以用来接济各分公司的需要。再加以美国的猪鬃大王孔公司需貨甚急，无条件开与我各分公司循环信用狀一百万美元，我公司就可以持向中国銀行作一个月的打包低息借款。所謂无条件的循环信用狀，是在成交之前就开出信用狀給我們，在这个信用狀上既不載明

商品花色，也无装船期限，我們可以随时凭川畜的发票、汇票、装船提单兑支在一百万美元以內的現款，并且在貨物成交、孔公司付款后，信用狀的金額仍为一百万美元。换言之，信用狀的金額在一年內任何时期都是一百万美元。孔公司开出这种信用狀，它們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即是說，有一百万美元的风险，但是它們为了要保持禁大王的地位，而且也知道川畜的信用好，这样做，它們就可以取得优先购买我們的产品的权利，而且可以保証每个月肯定有一百万美元的貨源。川畜自然也愿意这样做，因为既可取得等于一百万美元的中国銀行低利貸款（当时由于通貨膨脹，利息是非常高的），同时也免得如我們的同业那样，要預先卖定，才能取得买主的信用狀；我們可以随时作价，可以卖得比較如意。这种合作方式之所以可能，一方面是美国的垄断猪鬃商在銷場上有絕對优势，又兼市場甫經开放，商用缺貨，售賣非常容易；另方面也由于中国八年抗战也有不少存鬃，經營的既不算多，也易于購買。川畜和孔公司的这种合作，实际上成了一个非常之大的世界性的垄断“組合”。在这种合作之下，双方都获得了超額利潤，就这一点來說，双方都是滿意的。但是川畜和孔公司究屬两个組織，两方面都不可能滿足于現狀，都想进一步形成由自己这一方面完全垄断的局面。因此，孔公司要它的駐中国代表向我的竞争者购买比較便宜的貨，而我公司也要我們的駐美代表向孔公司的竞争者出售价格較高的貨。可是两方面也都心里明白，誰离开誰都不可能寻得出更好的代替人。

### 海洋公司——和华尔街垄断資本的直接挂鈎

上述这种双方面在既又非常滿意而又不滿意的状况下的“組

合”，維持了一年多。一九四六年二月我到了美国，与当时的世界公司總經理罗海德相談之下，他提出愿意和我公司合作，由我公司出資二十四万美元，他出資一万美元，組織一个在美国注册的海洋公司。他是前美国化学銀行的副總經理，曾任美国財政部的司长，在华尔街是一位有声望的人士。这个公司實質上就是川畜的子公司，不过利用他的声名在华尔街活动而已。这一組織成功之后，我們可以自己在美国的第五街銀行开出大量的見票四个月兌款、年息三厘的信用狀。第五街銀行是美国最老的、也是最殷实的銀行，当时它肯做这笔买卖，当然是認為这是可靠的投資，同时也可以帮助美国資本家取得便宜的原料。这一来，川畜的資本与美国华尔街的資本就直接挂上了鉤，我們最高額用过第五街銀行将近一千万美元。此外，由罗海德任經理的世界公司，是战时由美国政府出資、名义属于中国政府財政部、但中国政府財政部又无档案可查的一个机构，它也拥有資金五、六百万，我們也有时利用它的資金。但因为它既要利息，又要索取貨款的佣金，我們的利用也就逐漸減少。

因為我們利用美国第五街銀行的貸款，利息低，可以減輕成本，所以过去与孔公司的合作关系，至此就觉得吃亏，完全不适合我們的利益和发展了。于是我們就透過海洋公司开出信用狀，利用这个信用狀在上海、天津的結匯銀行（主要是中国銀行，也应酬一些在上海的几家其他銀行和几家川幫結匯銀行）做打包放款来购买罌，以补自己的資本之不足。这种作法不特利息低，成本輕，更大的好处是不需要为了要取得打包放款，在不应卖貨的时候把貨卖掉，如其他同业那样。我們在貨物离开中国港口、运往国外以后，可以有五个月长的看价格的时间。罌产冬季，集中到大城市加工在春夏，这个时候国内国外的价格均下跌；到了九、十月，国际市場下半年需

要量大了,而这时卖便宜貨的人已經把貨物卖掉了,因而市价一般趋涨,这已成了几十年来一定的規律(这个規律到現在不变)。川畜由于經濟力量雄厚,头年冬季向全国各地收进原料,次年春夏加工,再把成品陸續运到美国,随时看价出售,在头寸上可以毫不受制。

### 占領天津主陣地以及同天津洋商的斗争

我們于一九四五年九月由重庆沿江而下,搶先到达汉口,在各同业还没有到达之前,就开始营业。汉口当地并没有做出口的鬃商,不过本来有許多大小不等的加工鬃厂,在日本占領时期已停业多年。我們当时考虑到,假定我們仍然采取原来的办法,从收进原料到加工都由自己来做的话,不但我們当时的人力不許可,而且可能引起当地人的反感,不同我們合作。因此,我們就采取了利用当地加工厂、使它們能賺点小錢的办法,美其名为扶持他們,实际上他們既然沒有資本或者只有很小的資本,就不得不依賴我們,不得不受我們的控制。这样做,我們收得非常好的效果,汉口产鬃大約一万五千箱,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产品都归了我們。这个分公司的成就就是非常大的,但是还不是主要的;更大的、更重要的成就,是我們占領了天津这个主要陣地。

天津是唯一的猪鬃大埠,因为气候較寒冷,所以产鬃季节远較南方为长,年产約三万担,值美金千余万元。所以天津是做猪鬃生意的必爭之地。这个地区是包括长江以北各省的集中市場,也是洋商比較多的市場,所以竞争比較劇烈。洋商中如美商的万記、英商的怡和洋行、华商中的德記、朱文熊的南洋公司等,在天津都有长久的历史,并且拥有雄厚的資本。我們为了能在天津占領陣地,在日本投降后就配定了最有才干、最可靠的干部来到天津分公司、唐

山河头办事处、北京办事处主持业务。天津这个陣地,我們虽然在抗战结束后才着手开辟,但我們在一九四六年不特在天津同业中居于領先地位,而且爭取到当地猪鬃营业额半数以上。

我們在天津同其他同业的矛盾,主要是同美商万記的矛盾。万記是美国的进口鬃商,同时也是美国的分配商,在美国的地位仅次于孔公司,拥有資本五百万美元以上。它一方面是我們最強有力的竞争者,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它的紐約总号又是美国的仅仅次于孔公司的猪鬃大买主,因此同时也是我們的顧主。我們應該把它当成竞争者对待,还是当成一个顧主对待,就成为我們天津分公司急待解决的一个問題,也是內部爭論最烈的一个問題。最后我們得了这样一个結論:假定我們的价格能够和它自己在天津加工的成本一样,而我們的質量又能高于它自己的貨色,它必然会逐漸趋向于购买我們的貨而不再愿自己加工。我們就照这个目标和方法来同它的天津分公司竞争。不到半年,即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我到美国費城万記总公司去看它們的總經理,他就告訴我說,他的天津分公司的貨色質量远不如我們好,而成本也不見輕,他想关門,假定关門有困难,也要縮小組織。他希望能同我們加強合作,并且表示說,不仅重庆、汉口、上海等地的鬃它們要依賴我們進貨,就是在天津鬃也要主要依靠我們。至此,这个主要矛盾以后逐漸縮小了,同我們的竞争不大了,它們的天津經理有时反要到我們公司来取得联系,不再象过去那样夜郎自大了。

天津的另一个洋商劲敌,是英商怡和洋行。它是英帝国主义在我国进行經濟侵略的主要工具,有一百余年的历史,有雄厚的資本。它在重庆、汉口、上海都逐步放弃了經營猪鬃的业务,但在天津还頑固地同我們竞争。虽然許多年事实証明它在銷路上不是我

們的手，但它在英倫市場有它的子公司古柏公司的合作，始終是我們的勁敵。我們在美國市場上占優勢，它在英國市場占優勢，彼此旗鼓相當，互不相讓，但就營業額說，我們大過它若干倍。因為美國市場大，它包辦不了；而在英國市場小，我們雖不能勝過它，但也能做進不少。我們同它的競爭一值相持到一九四八年解放為止。

華商同業如南洋公司、同孚、德記等有好幾家，但營業額都不太大，雖然它們同我們也有一定的競爭，但總的說來，無論在質量上、數量上以及在外銷售和資本周轉方面，都不能和我們處於同等競爭的地位。不過德記、同孚因為在天津經營多年，在一定程度上對市場是比較熟悉的，所以還有生存的余地。

### 重慶、上海據點的守勢策略

我們總公司在這段時期仍設重慶，但僅限於管理財務、人事，實際業務完全由我在上海親自掌握。日本投降後，我仍一直任川畜總經理，除往國外我公司視察業務外，經常駐在上海，以便與國外機構聯繫。川、黔、滇各省雖是川畜的貨源地，但因日本投降後幹部抽調到全國各地太多，同時在抗戰期中創辦起來的同業如崇德、和源、寶豐等七、八家，在日本投降後也加強了業務，所以在這個區域我們的業務不是上升的，反而有或多或少的下降。其所以如此，有以下兩個原因：

(1) 重慶在抗戰時期出產的鬃比任何時期為多，復興公司撤銷時各特約公司均握有一部分存貨，所以重慶市場有一定數量的供應，需求之殷反不如其他區域。因此重慶地區的利潤小，不如別的地區、特別是漢口地區的利潤大。所以我們對我們的老巢，反取

守勢。

(2) 在同盟反对复兴公司的統銷时，西南的同业最初是不贊成我这个倡議的。因為他們認為，假定統購存在，川畜和它們是站在同等地位，它們并有一定利潤可得(雖說不太多)；統購一旦取銷，受益的是川畜，因川畜的外銷力強，將會把各公司吞并过去，這是它們所害怕的。經過了一個長時期的爭論和說服，它們始終不肯加入我們反对复兴公司的統購統銷政策的陣綫，后我約集和源公司的董事長劉航琛、崇德公司的董事長潘昌猷和宝丰公司康心远，經過了一個長時的談話，最后，出乎我意料之外，劉航琛竟然表示贊成。他說：“統購統銷是我們不能發展的主要根源，我們非反对不可。我們外銷方面不如川畜，我們應該拿起蒲團向他們拜門作徒弟，同时川畜也應該有义务教徒弟。我們决不因为外銷不如人，連統購統銷都不反对了，結果自己不發展，別人也不能發展。這是所謂既不利己、也不利人的自杀政策。”劉发言后，其余的人也都表示贊同，于是反对統購統銷政策这一行动在綢商内部就获得了一致，大家同盟，全力对外。我亦在此时作了帮助他們的諾言，并使用他們的名义為他們銷綢，代他們訓練出一批人員接替业务。所以我在西南各省的业务不能不略为放松，以表示履行諾言，同他們合作。但这不过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从我們本身来看，川畜这时已經从执西南牛耳的地位进一步发展到执全国牛耳的地位，正在忙于在全国范围内向更有利的地区发展，西南业务顧不过来，也就乐得放松一些，做个人情了。

我們在上海地区經營的比重不算大，我們也有意識地控制发展。上海地区产綢本来不多，花色过短，是一个最不好的产綢地区。但这并不是我在上海地区控制发展的真正原因。作为一个唯利是

图的資本家來說，即使产品质量差，产量不多，利潤也少，但如有利可图，也是不肯輕易放弃的。真正的原因，是怕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煩。首先，当时我考虑到，上海有两家前輩同业（一个是和昌，有四十年的历史，經理张貽志；另一个陆生田，亦有三十九年的历史，这两位前輩，均同我先君友善），在古青記未經营直接外銷前，我們卖給他們的貨不少，現在重庆、汉口的鬃都不經他們的手了，仅余下一點上海鬃，总額不过五、六千箱，值美金不过百余万，如我再去伸手，怕他們說：“上海人守上海灘；四川人把上海人的飯搶吃了。”再則，周松林的国民党党营机构、朱子良的揚子公司、朱文熊的南洋公司等官僚資本企业都在上海經營猪鬃，在这种粥少僧多的情況下，我如果和他們竞争，首先可能引起官僚資本的不滿，惹出什么其他問題来，这是不划算的。上海同业公会方面，我的父執輩不少，熟人亦多，固然我有資格去做公会主席，但我考虑仍以託张貽志为妙，因他做主席，有事一定来同我这个实力派商量；我还可借他的声望来緩和我和其他同业之間的矛盾。所以我就決定替他活动，託他当了公会主席，我自己則退居幕后。因有以上原因，我們上海分公司除买点苏北貨外，經營不多，成为售賣汉口、重庆鬃和活動經濟的机构，总公司駐沪办事处实际上成为一个外銷指揮部門。

在一九四六到一九四八这三年之中，川畜业务异常发达，每年營業額均达一千余万美元。一九四六、四七两年获利約一百万美元，純利潤率为百分之十；一九四八年获利达三百多万美元，純利潤率为百分之三十左右。这还仅仅是照營業額計算的，照資本算則更多，因川畜成立时注册資本只有五十万元法币，仅等于十六万美元，且不說每年股东所分的利潤了。一九四八年川畜的全部資金約为美金七百万元。



一九四八年获利最多，主要是因为这一年冬間天津解放后海口曾一度封閉，以致禁价暴涨了百分之五十，因而造成了暴利。

### 解放前夕上海的形势和香港新据点的开辟

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以后，全国解放之期已不远。这时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元券，蔣經国任上海財政特派員，企图刮尽民間黄金外币，以便退守台湾。当时上海各大企业負責人天天被蔣經国“召見”，天天都有被捕下獄的可能，如申新總經理荣海元被捕下獄，王春哲被枪毙，甚至杜月笙的儿子亦被逮捕。川畜在上海也是一个大名鼎鼎的对外貿易公司，我也被蔣經国“召見”过一次，使我至今仍心有余悸。上海資本家人心已不可終日，川畜亦不例外。我在上海召集了各分公司經理會議，依照法令将各公司所有的黄金美鈔交与当地中央銀行；国外資金約三十余万美金亦按照規定陈报，但我們借辞因为国外經營无法拨交，交了就要影响禁的成交，直接影响国外的一千余万元的外汇收入，始終未交。这时候通貨已成恶性膨胀，我們的禁在蔣經国威胁之下非出口不可，否則就有被捕的危险。但是貨物出口結存的金元券，因物价冻结，无法用来购进猪禁。我回忆当时将銀行欠款还清以后，仅上海分公司就有中国銀行一百余万金元券看着它烂掉。在这样情况下，业务也无法做下去，駐在上海也有問題。适逢党領導的地下企业机构合中公司蔣汉杰来告訴我說，香港有大批山东石島禁和东北禁，因香港洋行无人承买，假定我去开一分公司，一定有一笔好生意可做。所以我决定將駐沪办事处的人員陸續撤去香港。因我們駐沪办事处是不对外的，所以这个行动也不引人注目。对于国内各分公司，我也作了布置，即各分公司的貨物和人事均不动，等候解放；如果同重庆总公

司失掉联系,就同香港公司联系。这一布置并由董事会作出决定,正式通知各分公司照办。

#### 四、从香港回到北京(一九四八——一九五〇年三月)

##### 同美商踏价的一场战斗

一九四八年冬,川畜在香港政府注册,开始经营业务。当时淮海战役已胜利结束,上海即将解放,长江航运随时可能中断。所以川畜汉口分公司和重庆总公司的鬃均经粤汉路运到香港。同时东北已解放,东北鬃开始大量运入香港,山东鬃、国民党中央信托局的鬃以及各地同业的鬃也陆续来到香港。事实上香港已取代上海、天津的地位,成为中国鬃唯一的集中地。但香港的洋商对于鬃这个商品毫无所知,技术上的问题无法解决,都不愿经营。川畜开始营业后,卖客羣集,門庭若市。当时我们只在东亚银行租了一间写字间,卖主每晨到我办公室,要排队依次接谈;房间既小,也没有那么多的椅子,谈话时只好我坐着、他们站着。当时的北方鬃卖主有华潤公司、合中公司,香港企业有广大华行(都是解放区的企业机构),重庆、汉口、上海有国民党中央信托局和各省同业,总共不下四、五十家。到了一九四九年夏天,天津口岸开始开放对外贸易营业,天津鬃又开始易货,到达香港。因此,一九四八年的鬃价水平已不能维持,开始下跌。这时美国的鬃商如孔公司、万记等又联合起来,相约踏价,以致鬃价一跌再跌,出现非常低的水平,到一九四九年夏,几乎卖不出去。我就下了决心,把所有在香港的鬃收买起来,并向同业建议最好不卖,如卖我买,不要卖给美商。我总共收买了一万多箱,并以一百多万美元贷给国内各专业机构。当时有

一美商到港来看我，說：“你买下了这么多，如果我們不买你的，看你怎么办？”我說：“你們非买不可。如果你們三年不买，我就把全部猪鬃扔掉，自己跳海。”可是过了不久，紐約鬃商开会分析情势，就已經觉得斗不下去了，他們已經支持不住了。到了九、十月間，国外需要来了，一下子鬃价暴涨了百分之五十。

### 初步納入国家計劃軌道

一九四九年十月間，我上海分公司用长途電話通知我，北京將召开全国性猪鬃會議，我以专家身份被邀参加。我到京参加了會議并且接受了一九五〇年两万担的生产任务。我会后到上海、汉口視察川畜业务，同时在汉口和中南畜产公司訂立了外銷鬃和代銷加工整理的協議。

一九五〇年二月初，川畜在汉口召开會議，各分公司的主要負責人均到汉参加。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如何分配二万担的生产任务，另一提到日程上的議題，是各地分公司与国营猪鬃公司的矛盾問題或者說关系問題。对于这后一个問題，当时会上有三种意見：（甲）投降派：主张由我到京与中央貿易部談判如何移交給专业公司，理由是我們的机构和业务均大于国营公司，这样下去，必将与国营公司发生矛盾，結果是对我們不利的。（乙）观望派：認為川畜在国内是无法与专业公司竞争的，业务将会走下坡路，但我們的国外机构完整，在短时期內专业公司仍要依靠我們的国外机构，因此，似乎可以观望几年再說。（丙）游击派：主张除保持国外机构外，解散国内机构，分散开来打游击，或者說化整为零，做小的加工、販运生毛等业务。議論紛紛，各有理由，但每派所持的理由都不能說服其他各派。

## 資本主义經營历史的最后結束

我們正在得不出結論之時，忽然奉到樊陶齋同志由北京來信告訴我說，中央貿易部姚依林部長托他告訴我，假定我願意，可將川畜同中國豬鬃公司合併，由我任經理，其餘以下人員原職原薪不動，均加入專業公司，我如有意即可到京面商。同時中國豬鬃公司的副經理趙崇德亦以長途電話告我，姚部長請我即來北京，有要事相商，川畜開會的人均可來京。於是，我在三月初率同川畜全體負責人來到北京。我和主管部負責同志初步達成口頭協議，川畜國內機構完全併入中國豬鬃公司；存鬃按牌價全部售與中國豬鬃公司；成品、家具作價，其他商品自行處理；虎牌交由中國豬鬃公司使用；國外機構仍保持原有名義，受專業公司領導，成為專業公司組成部分；我仍回香港，在專業公司領導下赴美國主持外銷豬鬃業務。隨後開了一次全國性豬鬃會議，成立了中國豬鬃公司，川畜和中國豬鬃公司根據部務會議的決定簽訂了書面協定。我召集川畜各經理和各地專業負責人共同開了一次會議，並根據協定併入中國豬鬃公司。至此，川畜宣布結束，國外機構仍保持川畜名義，但成為專業公司的組成部分。

在會議上，姚部長來講了話，我亦在會上講了話。我非常興奮地講到：我一生由封建主義的古青記轉入資本主義的四川畜產公司，現在又由資本主義轉入社會主義，三種制度在別的国家所經歷時間是以千百年計，而我則在二十餘年就渡過了。我現在仍正值壯年，為黨為人民服務的時期還相當長。我在會上還就虎牌鬃說了以下一段話，來表達我內心的興奮和喜悅。我說：“我們這個馴服的老虎為我們古家服務了幾十年，以後又為四川畜產公司的股東服務

了十一年，現在这个老虎能够投降人民，永远为人民服务。我想我川畜的股东和川畜的全体职工都为这个老虎能为人民服务而骄傲，我先父槐青公如果有灵，亦当含笑九泉，大談他手創的紅色老虎不但一天天成长壮大，而且現在才真正的紅了（老虎牌商标本来是紅色的）。"四川畜产公司的資本主义經營历史，至此告一結束。

川畜在結束过程当中，内部的思想斗争是相当剧烈的。在前面所提到的三派之中，不消說，投降派的情緒表現是比較乐观的，因为川畜这样結束，本来是符合于他們最初的主张的。至于原先打算观望几年再說的观望派，虽然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而不能再观望下去，不能不勉強跟着走，但是他們对于資本主义的經營道路仍然恋恋不舍，心还不死。曾經有几个人不約而同地問过我这样一句話：“我公何时东山再起？”这一句話深刻显露了观望派当时的內心世界。抵触情緒最大的則是游击派，他們这时的心情有如三国时代邓艾灭蜀时杀家哭庙的北地王刘諶一样，伤心痛哭，寢食俱废，甚至有人歔歔慨叹地責备我說：“尔祖尔父历尽辛苦所手創的这份事业，被你毀之于一旦，你真太不成器了。”当川畜董事长吳晉航由京去沪的那天，川畜全体主要干部到車站送行的时候，有一位当初共同創業、相从数十年的元老重臣特地把我引到一边，對我說：“到了現在这个时候，你还这样欢天喜地，你真是連个阿斗都不如！”

然而，經過十年来党的教育和实际生活的鍛炼，过去川畜的重要干部的思想觉悟都不断有所提高；特別值得提出是，在他們之中，那位哭庙派的古青記元老重臣，現在已經变成了在政治上最进步、已經被批准加入工会的一个优秀人民勤务員。

## 五、資本主义經營的几点經驗

我經營猪鬃二十多年，对于資本主义經營方式也积累了一些經驗。这些經驗对于研究資本主义經濟史可能有一些参考作用，因此，我在写完这几十年来的回顧以后，愿意不憚繁瑣地把这些經驗一并写出来。

1. 托拉斯經營方式的优越性：从前經營猪鬃，分工的环节太多太細。我們把产区收购、集中加工，一直到运銷国外各个环节結合起来，成为一个联合企业，用資本主义經濟学的術語來說，就是一个“托拉斯”的組織。这种經營方式的好处，在于管理起来，一个环节扣一个环节，不但效率高，而且成本輕，特别是免除了中間商的分潤，劳动生产創造的全部价值就可以完全归企业所占有。

2. 大量生产，全年生产：由于我們是大量生产、全年生产，比起小量生产、半年生产的厂，成本就輕得多。因为不論是全年生产或者半年生产，管理人員、厂房設備所付出的开支是一样的，但加在成本上就有所不同。全年大量生产的厂，有条件可以选择最有技术的工人，而最有技术的工人也要千方百計地到这个全年开工的厂来。熟練工人和不熟練工人不特出品有好次，而且他們虽然都是計件工資制，但食宿和福利是按人計算的，当然也是工資一部分，这一部分工資由于熟練工人和不熟練工人生产質量和数量不同，所付出的工資实际上自然也就不同了。

3. 产品标准化：猪鬃生产的季节和地区有好次之分。大厂全年生产，可以把各个季节和各个地区的产品适当搭配，使全年所出的全部产品都是一个标准，不致一时好、一时坏。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购主來說，猪鬃是一种国外原料，常常是备足一年的数量，

而他們購買時又無特殊機器可檢驗出貨品的好次，必須從所做出的成品中，經過多年長期的觀察，才能知道。虎牌鬃在幾十年內的成品率幾乎完全一樣，這就使外國廠商對於收購我們的產品有了絕對的信心，不致使他們吃虧。

此外，我們在包裝方面，所使用的材料都有固定的標準，包裝方法也經過特別設計，絕不輕易變更。這看起來雖是小事，但是實際上在保證質量和保持信譽上作用很大。

4. 重合同，守信用：豬鬃交易一般有三個月至六個月的預售期，成交時國外買主在向賣主開出信用狀的同時，也向他們國內廠商預售。如果我們成交後不按时裝出或者中途毀約，就會造成他們的損失。川畜可以說在幾十年中從未發生過在成交以後不能裝貨或毀約之事。即使在成交後遇到條文規定可以不負責任的所謂“人力不可抵抗”的情況時，我們還是多方想辦法將貨運出，從不推卸責任。從表面上看起來，這樣做是繞彎的，但收效之大，是不能以數字來說明的。如美國商人說，“和古耕虞訂立合同，可以安心睡覺，決不致有任何問題發生。”又如英國一些商人說，“古耕虞的合同和英格蘭銀行的信用一樣，決不發生任何問題。”

5. 放賬慎之于始，倒賬不打官司：我們這個行業有一個放賬習慣，而且因為鬃是貴重商品，也非放賬不可。洋商放賬收不回來就把對方送進縣衙門關起來，本國同業也常為賬務打官司。我們幾十年來在這一方面總結了一條經驗，即：放賬要慎之于始，先看對象有無經營能力；收賬時假定他真有困難，就寧肯少收，決不打官司。這個辦法我們行之數十年，非常有效。這個道理在於：你會打官司，別人就會怕你，結果你的往來不是愈來愈多，而是愈來愈少。我們採取這個辦法，爛的賬不但不比別人多，而且比別人特別少。同

时，发生放账关系以后，要把对方所经营的生意认为与自己有关，要常常把我们对市场情况的看法通知他，总使他在为我们进货的时候也能够有点小钱可赚。这样，他当然就不会倒你的账。

6. 收买职工：我们有一套软化、收买职工的办法。我们除利用高薪办法外，还用送股票的办法来收买职员，使他们每人都拥有川畜股票，同时职工福利委员会也拥有百分之二十五的股票。这就使公司职员的身份劳不劳、资不资，不肯同资方对立，使每一个职员都想做小股东，再进而想做大股东，发财致富。这样就使职员和贵族工人同资方的矛盾相对地统一起来，使他们帮助资方剥削生产工人。

7. 掌握猪价规律：猪鬃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涨落是非常大的。在几十年中，竞争者因为涨了交不出货或因大跌而破产的，不知若干家。我们在过去近三十年中几乎每年有盈利，其中原因固然甚多，而掌握猪价的涨跌规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市场千变万化，投机性特别强，许多人认为不可能发现它的价格涨跌的规律性。我认为如果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多年的实践，规律是可以预先发现而不致发生重大错误的。猪价几十年来的涨跌规律大体有以下几点：（1）每年二月至七月，因供应多，一般下跌；八、九月以后，因需求多而供应减少，将逐渐上涨。（2）工业特别是建筑业的上升或下降，与猪价的涨跌有密切关系。如工业特别是建筑业发展，猪价亦必随之而涨；反之，亦然。（3）猪进入别国市场后，和所在国的物价平均指数有一定的关系。假定猪价远远低于物价平均指数，会引起消费的增加或投机囤积，因之引起涨风。（4）近二、三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几乎每年均有不同程度的膨胀，因而物价指数也随之上涨。从总的趋势看，猪价是跟着物价



指数上漲的時候多；但从短期間(一年)的变化来看，鬃价涨跌，季节性的影响較大。(5)如从鬃业市場的現象来看，英美的刷厂日夜三班，鬃必上漲；开两班，要下跌。开三班而又多做长鬃刷子，鬃必奇漲；反之，开一班而做短鬃刷子，必大跌。因为前者的情况是开三班仍不能供应需要，只好选价錢最貴而賺錢最多的来做。后一种情况大都是因为关厂不可能，只好拣成本輕的来做，少做可以少賠。

附記：因古青記和四川畜产公司的全部材料都在重庆，这篇資料完全是凭我的記憶来写的，某些人名和時間可能有錯誤。

# 蔣介石解决龙雲的經過

杜 聿 明

## 一、抗战开始，着手布局

在国民党政权統治时期，蔣介石和龙云虽然同是国民党統治集团的当权人物，可是多年以来，龙云在云南搞成了一个独立的小王朝，一切政治、經濟、軍事、人事等都有他自己独立的一套。这在蔣介石看来，自然是一个眼中釘，他为了实现他統一中国之迷梦，久已蓄謀吃掉龙云，夺取云南这块地盘，但是在抗战以前，时机未至，因而一直未能如愿以償。

抗日战争初期，蔣介石以抗战統帥的权力，首先于一九三八年将龙云經過多年訓練并用法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云南精銳部队的主力抽調出境，以卢汉任第一集团軍总司令，率領两个軍到湖南第九战区参加抗战。当时我曾在湘潭附近遇到龙云的部队，觉得“中央軍”同这支“云南軍”比起来，軍容上似有逊色。

一九三九年冬，日寇侵入桂南并且接着侵入越南之后，中国經過越南的国际交通綫被截断。蔣介石为了保卫云南大后方及緬甸这条国际交通运输綫，即抽調第一集团軍总司令卢汉率領第六十軍及第九集团总司令关麟征率領第五十二軍由湖南經广西百色开入迤南（云南通称滇南为迤南），沿滇、越边境布防，并給卢汉在云南新成立一个軍（即第九十三軍）。这是蔣介石的中央軍首次进入云

南，也是蔣介石为吃掉龙云而下的第一步棋。

一九四一年，中英軍事同盟成立，准备双方协力保全滇緬公路及仰光的国际交通綫。蔣、龙之間經過长期的商討，到一九四一年秋冬間，第五軍先后开入云南楊林、潞益、盘县間。不久，蔣介石在云南成立軍事委员会駐滇參謀团，以林蔚任团长；并成立昆明防守司令部，以我兼任司令，并有第六軍及六十六軍（后成立）在黔、滇边境集中，准备日寇一旦侵略馬來亞时，中国軍隊即与英緬、英馬軍隊协同在緬、馬边境布防，并肩作战，以保全仰光的国际交通海港。这是根据一九四一年中国緬印馬軍事考察团的意見并得到英政府的同意而决定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珍珠港事变发生后，日寇同时袭击香港，十二月十日，英艦“威尔斯亲王号”与“抗拒号”在新加坡海面为日机炸沉。这时，蔣介石判断日寇势将攻击新加坡，由馬來亞进侵仰光，即根据中英軍事同盟协定，动员这三个軍向中、緬边境畹町附近集中，入緬远征；同时并調第十一集团軍所屬第七十一軍等若干部队陸續向云南集中（番号詳后）。及先头部队第二百师到达迤西保山附近时，因英方政府提出异議，中国軍隊遂暂时停止待命。英駐華武官丹尼斯（积极主张中国軍隊入緬协同英緬軍并肩抗日之一人）正由緬甸返渝拟解决这一問題时，中途飞机失事殞命。中国軍隊亦因而迟迟未能入緬阻止日軍侵緬，而停留于云南境內达月余之久<sup>①</sup>。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夜，日寇由泰国与馬來亞交界的东海岸宋卡登陆，所向披靡，英馬軍和英澳軍皆潰不成軍，龟縮于新加坡

---

<sup>①</sup> 由于中国远征軍有先后两次动员，英武官丹尼斯之死，也許是二月一日日寇由宋卡登陆席卷馬來亞，中国远征軍再度动员入緬时的事。

島上。日寇迫近新加坡，將新加坡的淡水源截斷，二月十日，英馬、英緬軍全部舉手投降<sup>①</sup>。日寇挾其大勝之余威轉而北進，及二月二十一日，已越過緬、馬邊境，強渡比林河，逼近仰光。這時中國軍隊再度動員，入緬遠征。由於英政府懷有鬼胎（事後據一個曾經在中國擔任亞細亞石油公司經理的蘇格蘭人說：大英帝國英格蘭人的政策是：緬甸殖民地寧可丟給敵人，不願讓給中國），一直延宕到三月一日，中國遠征軍才開始入緬，其間中、英雙方經過極尖銳的鬥爭。八日，仰光失陷，中國遠征軍亦因而注下失敗的因素。可是，先後集中在雲南境內的抗日軍隊計有第二軍、第五軍、第六軍、第八軍、第五十二軍、第五十三軍、第五十四軍、第六十軍、第六十六軍、第七十一軍、第九十三軍等十多個軍及龍雲的兩個師，再加上美空軍陸軍等部隊，雲南大軍雲集，交通、運輸、補給等等任務極其繁重。尤其是美軍因在雲南各地建築機場、營房、宿舍，所有關於占用土地、征購建築材料等等問題都直接與雲南的政治經濟發生關係。這時雲南在龍雲控制之下，不僅行政效率極低，而且每件事都得經過討價還價，如果錢少，不能滿足龍雲及其所屬的欲望，任何事也行不通。不僅國民黨的中央政令在雲南無法推行，即美軍也噴有煩言，美、龍間的矛盾比蔣、龍間的矛盾更為尖銳化。於是美方提出：中國如不能解決雲南的政治問題，美國就無法援助中國抗日得到勝利。因此，蔣介石就決心利用美、龍間的矛盾來吃掉龍

① 據《中外歷史年表》七十頁記載，一九四二年“三月十五日，新加坡英軍向日軍投降”；而江丹楓所著《緬戰隨軍回憶錄》中則說：“一九四二年二月二日敵人占領馬來亞，十日攻陷新加坡。”以我的回憶：一九四二年三月八日仰光失陷（《中外歷史年表》中亦記載“三月七日緬甸英軍退出仰光”，這是相符合的），日寇侵占緬甸是在馬來亞、新加坡全部占領以後的事，因之我認為江丹楓記的時間比較正確。

云,以完成他多年“統一”云南的宿愿。

## 二、笑里藏刀,杀机渐露

蒋介石是这样的一个人:当他需要你的时候,卑躬屈节,好話說尽,同时也埋伏杀机,准备吃掉你;至于别人对他有一点不好的話,則是視如仇敌,咒罵不休,甚至置之死地。如在抗日战争中,他自己虽然經常摆出投降的架子,可是他对于大汉奸汪精卫及其有关的人則极端敌視。正因为这样,当一九三八年的十二月,汪精卫潛离重庆,經越南逃往南京做大汉奸,經過昆明时,曾得到龙云的同情;汪离昆飞往河内时,并由龙亲自送行(龙云曾亲自对我說过:“汪先生在政治上比蔣先生高瞻远瞩,汪先生去南京前我們长談过,我贊成汪先生的主张”),蔣介石就对龙云恨之入骨。可是蔣介石为了給他自己留有余地,并未将这件事表面化,相反地,蔣倒是对龙云优礼有加,并給龙以云南行营主任。当第五軍开入云南时,蔣介石曾面示过說,对龙云要絕對服从,要如同服从他蔣介石一样地服从龙云;就是龙云有不对的地方,“你們为了前途,为了整个計劃,也要委屈求全,不要发生摩擦,影响国家大事,这点你們懂么?”其实,蔣介石是正在暗中密布特务,准备实力,如当时滇緬公路局、滇緬运输处及昆明防守司令部等机关、部队中都有“調查室”(軍統的特务組織),滇黔及滇康边境均駐有重兵,随时准备入滇吃掉龙云。

一九四四年秋間,日寇为了打通中越間的所謂“大陆交通綫”,一举侵占长沙、衡阳、桂林、柳州而进出都匀时,龙云这时的态度极为不明,并对我表示:“抗战到了和的时候了。”龙对我說这話后不久,大汉奸汪精卫就派了一个“使者”經越南由滇越边境入云南,送

一封“劝降书”給龙云。这个人被蔣介石的特务发现，由宪兵第十三团扣押。龙云得訊后，立刻派兵将这个“使者”和信件一齐搶去，并将宪兵十三团团長龙迪波扣押，电蔣介石撤职。

事后，約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中旬，我曾当面問龙云对于这个“使者”的看法，龙云說：“龙迪波不懂国家大事，胡鬧！”我又問龙云：“这个人現在到什么地方去了？”龙云說：“已經送重庆去了。”

当时我們觉得很奇怪，蔣介石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独夫，龙云对他的一个心腹特务头子这样的打击，为什么他能这样容忍呢？可是蔣介石不仅承認龙云的做法，而且还对龙表示做得对。于是龙云兴高采烈，蔣介石也对龙云更加优礼相待。当时我們不了解，还以为蔣介石对龙云太敷衍了。而实际上蔣介石这种种作法正是在为彻底解决龙云来創造有利的条件——当然，蔣介石还有他不可告人的鬼計——这就是蔣介石权謀政治的阴狠莫测的所在。結果，龙云终于“出了小气，而坏了大事”。

### 三、面授机宜，伺隙下手

一九四五年春夏間，滇緬公路(又称“史迪威公路”)完全打通后，蔣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打出“統一抗战、安定后方”的幌子，决心剝夺龙云的一切軍政权力，可是他預料龙云絕不会接受他的命令，于是就决定明用行政命令、暗施武力的办法解决。

約在一九四五年四月初，有一天昆明飞机場打來電話說，“老头子”(指蔣介石)要我馬上到重庆去，飞机已备好。我急急忙忙飞到重庆，当天下午見到蔣介石。蔣头一句話問我：“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人沒有？”我說：“在昆明沒有任何人知道。”又問：“到重庆見到什么人？”我說：“誰也未見。”蔣介石很高兴，連称“好，好！”接着他

說：“目前准备对日寇反攻，必須先安定后方，統一云南的政治經濟和軍事，以保障抗战的最后胜利。現在拟調龙云到中央任軍事參議院院长，但是恐怕他不服从命令，你要在軍事上作彻底解决龙云的准备，先将昆明附近的国防工事全部控制，然后我再明令調遣龙云、于命令到达的同时，即以武力解除龙云的全部武装，并限龙云于三日內到重庆”，并問我的意見如何。

我虽然同龙云相处五年之久，私人感情甚好，見面无話不談，可是总觉得龙云反蔣，不能作为自己的靠山，当然同意蔣的意見，并認為龙仅有两个步兵师、一个宪兵团（即三个宪兵大队）在昆明，另有几个交通大队及地方保安团队在云南境內，在軍事上，解决他是毫无問題的。蔣介石听了很高兴，要我即刻回昆明准备，以免龙云及其左右知道了发生怀疑，并再三叮嚀：“要守秘密，要慎重。”于是我当天午后就返回昆明。

我当天回到昆明后，時間虽然已晚（約晚八点多鐘），可是为了不使自己的行动露出馬脚，就赶往参加龙云參謀长刘耀揚的宴会。刘一見面就問：“你到重庆有什么要事，就急急忙忙赶回来？”我假意說：“不是去重庆，是到曲靖看部队的。”由于我平日經常到各处看部队，也同刘耀揚等經常玩耍賭錢，因之刘信以为真，未发现我在騙他。

不久，何应欽到重庆去，蔣又告訴何要解决龙云，何由渝回昆后，就同我商量。他認為劝龙自动辞职是可能的，龙不会頑固恋栈，这样解决，可以免得动武。我心想，如果何应欽对龙云的看法比蔣介石正确的話，也免得动兵之日好象蔣介石做好人，而我自己做坏人，也就同意何的主张。于是何应欽和我經過五、六、七月三个月之久，从多方面劝龙云自动辞职，并經龙的亲信卢汉等人从旁

婉劝,但均无效。一九四五年七月間,有一次我們三人在一起,何对卢說:“龙先生似应自动辞职才好。”卢說:“我也这样主张,許多人劝他都不听。”又有人說:对于这件事,龙云曾召集他的智囊团开过秘密會議,大家一致主张龙不要辞职,因之龙决定既不辞职,更不到重庆去。于是何应欽几个月的和平解决云南問題的活动就形成了一种无法解决的僵局。

一九四五年八月初,蔣介石认为中苏条約已經簽訂,即将要配合盟軍反攻日寇,可是云南問題如不解决,他自己既不甘心,也无法回报他的美国主子。他感到何应欽既不能实现以和平方式調龙离滇的計劃,而又不积极准备以武力解除龙的武装,于是他又撤开何应欽,决定仍交給我实行他久已决定的决策,因此他又电召我到重庆去再度面授机宜。

#### 四、日寇投降,准备开刀

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我到重庆,当天午后即传出日寇承欽无条件投降的消息。蔣介石这一天忙于处理他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措施——禁止八路軍接收淪陷区,并令日軍維持治安,待命受降,因而他当日未与我会談。次日清早,蔣介石召見我說:“你先回去做解决龙云的准备工作,等日寇投降的事情处理后再待命实行”,并說,除軍事上积极准备外,还要对云南的通訊、交通及各机場作周密的計劃和布置,以防龙云逃跑。

我听了蔣介石的指示后,感到大失所望,因为我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以为日寇投降后,我能到各处对日受降,比較解决龙云这件事要“光荣”些,可是又不敢违抗蔣介石的意旨,只得接受他的指示,未作任何的申述。



八月十一日,我由重庆飞返昆明以后,即照蒋介石的指示,积极准备解决龙云的各项措施。在军事方面,我假借准备到淪陷区各大城市解除日寇武装作为掩护,对各部队排长以上干部亲自教过沙盘演习,各部队并分别实施过排连战斗演习。对于如何投送蒋介石的命令,说服龙云部队投降,也作了准备,并且根据龙云所部排、连、营、团等兵力大小和驻地工事好坏程度,作了不同的火力兵力部署和准备采取的战斗战术方法,以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龙云的武装彻底解除。同时,我对云南省各电报、电话、公路、铁路和各机场,也准备好一套严密控制的办法,以便在蒋介石的命令发表后,使龙云与各方隔绝,既不能逃走,也无法对外联系,只给龙云留五华山弹丸之地(云南省政府所在地)和他的一营卫队(又称警卫大队),让他看到大势已去,不能不俯首贴耳地服从蒋介石的命令。

这些准备工作,前后共经过约一个月之久,才告完成。所有在昆明的人包括部队干部在内,都未曾察觉我所执行的蒋介石这个企图吃掉龙云的阴谋,因为一方面我视察部队,在部队中上课,是一个经常的、为人所共知的事,我的这些行动已不为人所注意;另一方面我在这一期间又借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为名,广事各种交游,经常举行宴会、舞会,或者与云南的朋友们玩耍到通宵达旦,以此来作掩护。

当八月十一日我从重庆返昆明后,我的英文秘书袁仲珊悄悄地问我說:“是不是要解决龙云?”我說:“你胡說。”袁又說:“从九号起,美軍就下了戒严令,官兵日夜武装,禁止外出,并严密防止龙云部队袭击他們的兵营、将领住宅以及仓库、武器、弹药、油料等,他們說要解决龙云,并說,不解决龙云,中国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统一的自由民主的强国。”我又假意說:“日寇投降了,还談这些事干什

么？美国人以美国的眼光看中国问题，简直是发神经病，你不要听他们的说法。”

美军当时在昆明约万余人，已经露出这样明显的马脚，而龙云几乎毫无所知，仍然蒙在鼓里。龙云虽然同蒋介石一样，也有他的一套小特务组织，什么便衣、宪兵布满昆明，为他搞情报迫害人民，防范异己，可是到了这种重要关头，却不管用了。

第二天（即八月十二日），我为了亲自观察龙云及其左右是否发现蒋介石这个阴谋，曾经去拜访过李培炎（别号西平，龙的大舅子，是他的智囊之一）、李培天（别号子厚，龙的二舅子，民政厅厅长）、李希尧（龙的警务处长）、杨竹菴（龙的副官长）等人，午后又见了龙本人，为抗日胜利向他们道喜，言谈之间都未发现他们对美军露出的马脚有任何怀疑的表示。于是我唯恐泄露机密的担心也放下了，解决龙云的一切准备也就秘密开始了。

## 五、調虎离山，龙云中計

当八月十五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指使下，一方面以美械装备部队（当时美帝国主义分子魏德迈规定，非美械部队不准派去接收）开往南京、上海、广州、汉口、北平、天津去掠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则阴谋策划排除异己，以完成他统一云南的宿愿。这时，蒋介石表面上特别对龙云推崇备至，而骨子里则是想尽量地把龙云在云南境内的实力削弱，为进一步解决龙云打下基础。

当时卢汉率领第一方面军的三个军（第五十二军、第六十军及九十三军）进入越南对日寇受降，兵力本已绰绰有余。可是，美、蒋为了准备下一步棋，硬说日寇有阴谋，接收兵力不足，恐怕出意外，就

从多方劝说龙云再扩充一个军，加入第一方面军入越南接收。经过一番曲折，龙云才将他原来留在昆明“保险”的家兵——龙绳武（他的大儿子）的一个师扩编为一个军（番号记不清），随同第一方面军开入越南。至此，龙云多年来所训练的“看家宝”只剩下龙绳祖（他的二儿子）和宪兵团、警卫大队了。而蒋介石这时在昆明的队伍尚有第五军、第二〇七师、云南机场守备司令部所属四个团、宪兵十三团等部队。

这时龙云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而蒋介石则认为龙云“正中吾计”，准备下毒手了。

## 六、狠心无过蒋介石

九月二十七日，蒋介石派他的心腹王叔铭秘密到昆明，送来一封亲笔信给我，信中大意说：日内就要颁布免除龙云在云南军事政治本兼各职的命令，调他任军事委员会军事参议院院长，要我最好一枪不发，并绝对保证龙云的生命安全；并说，龙任军事参议院院长，“仍然是你的长官，必须以长官之礼相待，照命令限期送龙云到重庆。……”但是他又说，他已令昆明飞机归我指挥，应将飞机、大炮、坦克一齐准备好，万一龙云不接受命令的话，就立刻集中火力轰击五华山。蒋介石就是这样的一个狠心人。

当时我想：在政治上，我同龙云是不可能并立的；可是在私人感情方面，我同龙云相处甚好，而且到了无话不谈的程度，对龙本身加以危害的事，我绝不能做。我并暗想到：蒋介石这封信写的十分冗长而且前后矛盾，可能他要假我的手杀龙云，以除后患，万一龙云死了，舆论哗然，蒋介石必定把这一罪责加到我的头上，而他自己反倒装成一个“菩萨”似的好人，何况杀鸡并不要宰牛刀，解决龙

云也并不需要使用这么猛烈的火力。于是我连夜复了蒋介石一封信,信中大意說:对于解决龙云的軍事,我已准备妥当,龙云及其左右直到九月二十七日为止尚在梦中,只要蔣的命令发表,在两小时内可以全部解除龙的武装,控制五华山以外的整个市区,并恢复秩序;龙云只剩五华山弹丸之地,而且只有一个警卫营的兵力,絕不足以为患,他看到大势已去,将会自动离昆赴渝。我又說,即使龙云不听命令,負隅頑抗的話,也是他自找沒趣,自寻死路,与蔣介石的威信无关,我可以用一部分陸軍立刻解除龙云警卫大队的武装,活捉龙云;但是假如照蔣介石的指示,使用飞机大炮轰击,不但龙云的生命难以保全,而且五华山建筑及城内无数居民的生命财产势将遭到损失,甚至波及云南大学及西南联大师生的安全,引起学潮,在政治上将发生极端不好的影响。

蔣介石是最怕鬧学潮的,过了一天,他复信同意我的意見,决定不使用空軍轰炸,同时蔣又认为龙云不会接受他的命令,勢必頑抗到底,对于解除龙云的武装問題又进一步作了詳細的指示,并說“金馬、碧鸡是历史上爭取昆明的要点,得之者成,失之者敗,必須以重兵占据,万不可疏忽”,云云。其实蔣介石真是紙上談兵,以阿育王时代的神話来处理現在的軍事部署,他也不了解这时龙云在昆明的武装是在昆明市城廂附近,金馬已在第五軍重兵控制之下,而碧鸡关則距昆数十里,已不是当时解决龙云的軍事要点。

蔣介石是賊人胆虛,他在解决龙云的过程中唯恐他自己在重庆会受到政治上的影响,稍有泄露,就会打乱他彻底解决龙云的預定計劃。于是他就像偷地溜到西昌去(大約是在九月十九日),到西昌后才命王叔銘乘专机将解决龙云的命令送到昆明,同来的还有新任云南省民政厅厅长、代理云南省主席李宗黄,这时已到黄昏

前后。

我記得蔣介石当时的命令共計三件：

一、免去龙云軍事委员会云南行营主任、云南省政府主席本兼各职；軍事委员会云南行营撤銷，行营所屬人員由中央統一安排；

云南地方軍隊交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接收改編；

云南省政府交卢汉接收，在卢汉未到任以前（卢汉这时入越南对日寇受降），由云南省民政厅厅长李宗黄代理。

二、任命龙云为軍事委员会軍事参議院院长。

三、任命卢汉为云南省政府主席。

这时在西昌蔣氏左右最亲信的仆从們还不了解蔣介石究竟鬼鬼祟祟地在搞什么，所以連对我通訊的电报密碼也未帶去，当晚及三十日先后收到我拍去的电报也无法譯出（这是事后俞济时对我說的），蔣反而来电（是由空軍第五路司令晏玉琮譯轉的）責备我作事疏忽，对于处理这样重大的事，一天一晚不給他发一份电报，說明对于命令实施的情况。据俞济时说：他們当时既未帶密碼，又不敢同蔣介石說明，因为說了蔣会罵死人。

## 七、如法泡制，龙云被吃

九月二十九日晚，我即赴昆明市北的崗头村預先准备好的指揮所，召集团长以上的干部及新任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长、代理云南省主席李宗黄等开会下达命令，我記得当时命令的要旨如下：

（一）摘录蔣介石命令要旨。

（二）命第五軍軍长邱清泉指揮第九十六师、第四十九师包围昆明市城廂的龙云武装部队及警察，解除他們的武装。

(三)命第九十六师师长黄翔所部担任解除昆明市东郊暂编二十师之一部(約一个团)、东城門楼宪兵大队与金碧路、正义路至华山路間昆明市警察武装的任务。

(四)命第四十五师师长胡常青指揮所部担任解除北校場营房及北城門楼宪兵大队武装的任务。

(五)命第二〇七师师长罗又伦指揮所部担任解除曲靖某团及县保安队武装的任务。

(六)命云南机場守备司令郑廷笈指揮各机場守备团警备各机場,并严格检查各机場往来乘客,以防龙云逃走。

(七)命宪兵十三团担任昆明东西南北各公路、鉄路要道的检查。

(八)命昆明防守司令部通訊营控制昆明各电报、电话机关,凡属龙云对各方往来电报一律检查扣留,并将电话綫截断。

(九)命第二百师师长熊笑三率領所部由蘿茨县沿滇緬公路經碧鸡关开至昆明市西郊,作为预备队。

(十)实施办法:各部队部署就緒后,将預先印好的蔣介石命令交給龙云所属軍警宪兵各部队长,如有不服从命令交出武器者,即以武力解决;对于街市警崗則用行軍纵队通过街市方式,前面大队通过,由后面队尾对每一崗警留下两个士兵,一人監視,一人拿命令对警察說明,劝其交枪。

(十一)将解决龙云命令送交美方一份。

(十二)各部队到达准备位置后,預定五点钟以电话联络开始实施,同时将蔣介石解除龙云本兼各职及調龙任軍事参議院院长的命令送交龙云。

(十三)其他:命令官兵不得擅入商店民宅……。

命令下达后，已至午夜，各将领纷纷来说时间来不及。我说：“一切详细部署及解决龙云的具体办法，就是曾经演习过的沙盘演习，你们官兵都参加过演习，不会来不及。”各部队长至此才恍然大悟，兴高采烈、如狼似虎地分头吃龙云去了。

三十日早晨五时，各部队都到达准备位置，并给龙云所属部队送去蒋介石命令，同时将蒋介石给龙云的命令送给龙云本人。这时，东北校场的龙云部队及北门宪兵大队都表示愿照命令缴枪，唯独东门宪兵大队不接受命令，不准任何人接近城楼。有一个居民说，他同宪兵大队的人相熟，自告奋勇，愿将信送上城去。他得到对方宪兵大队的同意将信送上去后，这个队长一看命令是蒋介石要他们缴枪，立即开枪将这个送信的居民打死。于是枪声四起，双方开火。接着，北门和北校场龙云的部队听到枪声，也反了脸，开起火来。这时蒋介石的部队就照预定计划，给龙云所部一个下马威：枪炮齐放，把龙云部队封锁得连门也出不来，同乌鸦一样挤成一团。加以龙云所部除东门部队有队长外，其余的团营连长甚至排长都不在部队，师长则更不用说了，于是羣龙无首，都纷纷缴械逃命。不到五十分钟，除五华山以外，龙云所部都被缴械完毕。

到六点多钟，我派到城厢视察的参谋回报说：各部协同一致，已经迅速解决了云南军警宪的武装。我这时认为，龙云大势已去，除监视五华山等待龙云本人答复之外，全市可以解除戒严，恢复正常秩序，于是下令解除戒严。

这时，美、蒋官兵和吉普车到处奔驰，居民也逐渐自由活动开来。由于龙云过去不准蒋家官兵携带武器进城，这时第五军的官兵好象出了一口气，特别显示出一付骄傲神气。美军乘着吉普车到处横冲直撞，伸出大拇指头说：“顶好”。美、蒋双方互相道贺他

們合伙解决龙云的胜利。

## 八、五华山上,龙云負隅

九月三十日拂晓,龙云听到东門附近枪声时,即从五华山南的住宅后門逃上五华山,发出“戡乱”的电报,大意說:杜聿明叛变,围攻昆明城,令各区专员、县长率領所有保安团队星夜向昆明集中,内外夹攻叛軍,以解昆明之围。这时龙云似乎仍在梦中,还不知道他的心腹部队早已完蛋了。

龙云这时在各县的保安团队,据說約近十万人,都由龙的信亲专员、县长直接控制。龙自恃这一支力量可以击退蔣家軍,所以他在五华山坐守待援。同时,龙也不了解这时他的所有电台、电报局皆被蔣家軍及特务監視,他的戡乱文电并未发出。龙云也不了解蔣家軍所以未围攻五华山,并非不能攻,而是蔣介石的一种政治策略。所以他就坐鎮五华山,抗不接受蔣介石的命令。

蔣介石虽一再催龙赴渝,龙也置之不理,于是形成僵局。这时蔣方的李宗黄等人則說龙云是个独眼龙,至死不会回头,建議我以武力解决。我則認為龙云只剩五华山一隅之地,迟早非离昆明不可,用不着再动武力。

可是,全城恢复秩序不久,忽然城内枪声又起,便衣队到处乱窜。被抓到的人中,有的說他是龙的多年旧部,現在这样对付龙云他們不服气,要同蔣家軍拚命;有的还說,他們奉龙主任的命令,要把蔣家軍赶出昆明。于是全城再度进入戒严状态。

戒严后,昆明全市杀气腾腾,形同死城。全城除了布满蔣家軍武装部队之外,居民不敢外出。便衣队經過两三小时的搜查,基本上肃清。



九月三十日上午,我本已发出了“安民布告”,解除戒严,恢复全市正常秩序,可是由于龙云負隅頑抗,又有便衣队到处捣乱,只有临时改变计划,只将昆明金碧路以南及昆明城东西城墙以外地区恢复交通,而城内及与西南联大毗連的地区則仍繼續戒严,以防龙云的反抗行为同西南联大师生的民主运动結合起来,使蔣介石在政治上发生更大的困难,因为当时民盟的成員中早就有人露出“龙云的武装就是民盟的武力”的說法。

在这几天之中,城内居民买不到柴米油盐和菜蔬,而城外从四面八方来的农村小販也不能进城銷售,从迤东、迤西、迤南、迤北各县来的商旅又越来越多。城外交通恢复后,在东西汽车站附近形成了临时的集市,商旅自由交易,都說“这一下可好了,龙家的馬弁、宪兵、警察,再也吃不成他們的干股了”(据說:龙云的馬弁、宪兵、警察在昆明看到誰家的商业发达,就要搭一股,而商店則不敢收他們的股金,还要按年給他們分紅,实际上是送錢,否則这些人就对商店进行种种捣乱,使商人无法經營而倒閉)。但是他們并不了解,这只是一个統治者換了另一个統治者,只是由零星的敲詐勒索变为一个規模更大的压迫和剝削而已。

当昆明再度戒严之后,接連兩三日昆明城内变为死城,不仅居民粮食菜蔬无从采购,特别是西南联大数千人的伙食也发生了問題。当时西南联大总务长查良釗为此事非常着急,第五軍兵站分監蔣瑞清了解这一情况后,深恐因此引起学潮,建議送些軍粮供应联大师生,我認为很对,馬上命蔣瑞清給联大师生送米送面,以籠絡他們。

由于西南联大的进步人士和革命分子多,民主运动当时十分高涨,在解决龙云的过程中,我对联大师生暗中戒备甚严,以防止

他們集会活动,支持龙云。尽管联大师生并无这种行动表现,但是我当时贼人胆虚,不得不严加防范。我在表面上假意地派人慰问西南联大师生,可是将西南联大对外的交通和通讯联络完全截断,因之在解决龙云的过程中,联大师生对外的联系是隔绝的,少数住在校远地方的师生也无法与校中取得联系。当时联大师生除了看昆明市《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所公布的蒋介石命令及蒋家军单方面的消息之外,对于龙云方面的情况则完全隔阂。虽然有些同情龙云、想“利用”龙云武力的人,看到那种迅雷不及掩耳般地解决了龙云的情况,也只有大失所望。

### 九、紳士出面,討价还价

龙云武装被解除后,我曾几次派人劝龙云及早赴渝,但均遭拒绝。于是我下令开放市区的一部分电话,以便于同地方上取得联系。果然,到十月一日午后,昆明紳士及龙的亲信李西平、李子厚、李希尧等人来电话说,拟来岗头村见我商讨龙云赴渝的办法,我表示同意他们前来。他们来到岗头村后,谈话内容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们之中,有的人如李子厚等为龙云抱不平,说蒋介石和我作得太过分了,不然,龙云不会不听命令。有的如李西平等则说龙云太固执,早就有人劝他辞职他不肯,今天只有听“委员长”的命令才对,龙又不听,还有什么可闹呢?他们表示愿意去向龙云疏通,劝龙云早日赴渝,大家都好。

第二,希望解除戒严,给予居民生活上的方便。

第三,对于龙云的旧部属希望能予以安排。

我当时表示基本上接受他们的意见,并对他们表示以下几点:

第一,希望他们劝“龙院长”遵照“蒋委员长”的命令,于十月四

日飞重庆就职。

第二，昆明城内自明日起(十月二日)，除五华山外，可以解除戒严，恢复正常秩序，让市民安心生活。

第三，龙云的旧部请蒋介石全部安置。

各紳士們当时认为滿意。以后蒋介石也批准給龙云的二儿子龙繩祖一个师，宪兵編为一个独立团，所有云南行营人員均由中央命令安排工作。

当然，蒋介石的目的是在剥夺龙云的政权，只要把龙云的政权搞垮，其他一切都可假仁假义地做个人情。

这批地方紳士們回去后向龙云劝駕，龙云仍然在摆空架子。他一方面感到大势已去，不得不表示說他对蒋介石的命令是服从的；另一方面他又說，他在云南十多年，一切手續要交代，要時間，絕不愿意在十月四日以前到重庆去。这时蒋介石已派专机在昆明机场等候，而龙云則坚不肯去，于是形成僵局。

#### 十、何应欽碰了一鼻子灰，宋子文亲上五华劝駕

蒋介石見龙云不肯赴渝，深恐拖延日久，发生問題，于是派当时已到南京接受日寇投降的陆軍总司令何应欽飞昆明劝駕。何于十月二日午后到达昆明机场后，一見我就說：“叫你們不要胡鬧，現在鬧出事，弄得騎虎难下，又要我来做善后，……”

何应欽当时满怀信心地以为龙可以听他的話到重庆去，可是他到机场空軍司令部給龙云打電話，龙連電話也不接，并拒絕何上五华山。接着，中国銀行昆明分行行长王振芳也奉蒋介石命由渝飞昆。他与龙通話后，龙表示欢迎他上五华山会談。王振芳去后不久，回到机场說，龙云表示必須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亲来昆明，并

保证他的安全，他才可以去重庆。

何应钦碰了这一鼻子灰，十分尴尬地说：“龙云是这样一个人不明大义的混蛋，幸亏你们用武力解除了他的武装，不然真要造反。蒋先生还是有先见之明。”

王振芳与蒋介石（也许是宋子文）通电话后，当晚返渝复命。

十月三日，蒋介石派宋子文飞昆，上五华山与龙云长谈之后，龙始表示愿于十月四日离昆赴渝。

十月四日午后龙云离昆时，我和龙的亲友旧属都到机场送行，还派了仪仗队。当时我对龙说：“对不起院长。”龙说：“你是奉命行事，不怪你。”

### 十一、背过立功，明降暗升——蒋介石的最后一着棋

龙云到达重庆后，仍然心怀不满，但他慑于蒋介石的威势，不敢直接怪蒋介石，只好把他的一肚子怨气向我身上发泄。他对蒋介石说，他是绝对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的，就是因我不送命令给他而先动武力，简直是一种蔑视国法、背叛长官的行为，所以要求蒋介石惩办我，否则，即使他能原谅我，云南老百姓也是不能原谅我的，势必造成更加混乱的局面。他对于一般往访的人，也是将我大骂一番。他对关麟征说，一定要惩办我，并要将我调开云南，并表示欢迎关麟征去云南。关亦向龙云表示愿意去云南而不去东北（这时关已发表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

于是蒋介石就将计就计，施用一套权诈手段来对付龙云，以息龙之愤。

当龙云赴渝后，我就照蒋介石的指示，实行肃清龙云多年在云

南的殘余勢力，將龍雲的舊部集中起來編為一個師及一個憲兵團，并令昆明市所有龍雲過去的文武官員將私有武器限期辦理登記，不得私藏軍火。到十月十四日，我忽然接到蔣介石的命令，要我到重慶去。十五日我飛抵重慶，見了蔣介石。蔣介石這次接見我，與過去大不同：先則禮有加地詢問了解決龍雲的經過，繼則吞吞吐吐地說：“你解決龍雲對國家是立了功，可是得罪了龍雲，你應該為國家（實際上是為蔣介石）背過。我表面上先公布將你撤職查辦的命令，實際上是調升你到東北去當保安司令長官。”我是一個歷來為蔣介石背過并且因此而在反動集團中爬上去的人，很了解蔣介石的心理，就慷慨地說：“只要與‘國家’有利，個人不計較任何名和地位。”蔣介石听了很高興，笑容滿面地說：“你這樣識大體、明大義，很好，就照我的命令辦吧。不過因為龍雲的關係，處分你的命令要先發表，你明天就到昆明辦理交代，十八日就來重慶，我再發表你到東北去當保安司令長官。”

於是蔣介石在十月十六日發表命令：杜聿明在雲南處理失當，着即撤職查辦（大意是這樣），調關麟征為雲南警備總司令。這項命令，蔣介石還特別交代要在《中央日報》上以頭號標題發表，以息龍雲的余怒。

蔣介石歷來慣用這種權術來處理他的所謂“國家大計”，也正是用這種狡詐手段來對付龍雲的。由此可以推斷，以後蔣家軍在昆明屠殺聯大學生及李公朴、聞一多等民主人士，也一定是依據蔣介石的命令來干的，及至事後輿論沸騰，蔣介石就託關麟征、霍揆彰為他背過，先而把關、霍二人撤職，繼而則又加以重用。

## 十二、結 語

蔣介石解決龍雲，是反動統治集團中內部的鬥爭，是蔣介石要統一他的大王朝而龍雲則要保全他的小王朝所進行的鬥爭。這一鬥爭的結果，雖然未曾直接影響到中國人民的革命進程，可是使反動統治政權形成一個暫時統一的、比較穩定的局面，使蔣介石以後在迫害民主運動和進行反人民戰爭方面減少了不少的顧慮。蔣介石經過這次事件控制了雲南之後，才敢大舉屠殺昆明聯大學生及民主人士，並將雲南的反動軍隊大部調出投入反人民作戰，如一九四六年以後第五軍參加華東反人民作戰及二〇七師參加東北反人民作戰的部隊，都是從雲南調出的。這雖然無法挽救注定要滅亡的蔣氏王朝，可是對於當時的民主運動、對於解放戰爭，都增加了一定的困難，對於革命事業是不利的。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日

# 刘湘与蒋介石的勾心斗角

邓 汉 祥

## 一、新军阀混战时期刘湘和蒋介石的互相利用

四川军阀历年混战的结果，在防区时代形成了两个派系：（一）以刘湘为首的四川速成系，主要分子有楊森、唐式遵、潘文华、王纘緒、王陵基（王曾在四川陆军速成学堂任过教官）、傅常、郭昌明等；（二）以邓錫侯、刘文輝、田頌尧为首的保定军官系，主要分子有黄隐、陈书农、刁文俊、牛錫光、董长安、曾南夫、孙震、夏仲实、唐英、张为炯、张致和、向传义、吳景伯、田伯施等。其中以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三三年間刘文輝的防地较为富庶，川西南的最重要地区大多是他的防地，共約七十余县。

刘湘霸据川东，防地虽不甚广，但因重庆为重要商埠，他采取远交近攻策略，一面扼制保定系，使其无法补充軍实，一面利用长江交通，买枪械，設武器修理所（即变相兵工厂）、炼鋼厂等，大事扩张。又因蒋介石“四·一二”背叛革命后，对工农紅軍发生广泛的断断续續的战争，同时更因蔣要消灭异己，造成清一色的蔣家天下，同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湖南唐生智，广东李济琛、陈济棠，以及閻錫山、馮玉祥等，前后发生了若干次的內战，在这过程中，他不能不拉攏长江上游的刘湘作声援，而刘湘更想利用接近蒋介石，来便

利他的企图。

在刘湘任二十一軍軍长的时代,他对共产党是极端仇視的,他在軍部內設有特委会,以他的同学李根固主持其事(李曾任二十一軍軍部副官长、重庆警备司令、宪兵司令等职)。所謂特委会,就是专为对付共产党而設的机关,后来刘兼四川善后督办,更扩张为清共委员会,軍、警、宪都参与其事。当时在他的防区所屬川东各县,革命工作人員受其殘害的很多,其办法分为杀、关、放三种:(1)情节严重而又坚持革命立場的,大多被杀了;(2)嫌疑稍重、态度不十分坚强的,就扣押起来;(3)間或有立場不稳、登报声明退出进步关系的,就释放了,甚至利用个别的作为工具,帮助特委会調查、破坏地下革命干部的工作,震动一时的“三·三一”惨案<sup>①</sup>,虽系劊子手王陵基、蓝文彬等所造成,但刘亦不能辞其責。

一九三〇年蔣与閻、馮战争发生时,张学良在两者之間,有举足輕重之势,蔣介石派张羣作代表到沈阳去运动张維持“中央”;同时,閻錫山派他的秘书长賈景德,馮玉祥派他的总參議薛篤弼,也到沈阳包围张。而刘湘为探討张学良的真实态度,以便决定他对双方的策略起見,特委託邓汉祥前往謁张。因邓和张原来有交往,晤談时张便向邓說,“恶政府甚于无政府,蔣介石誠然不对,但閻錫山、馮玉祥又有甚么对的呢?我已决心維持南京政府,并經电約热河、吉林、黑龙江各地負責人来沈阳面商。如他們贊同我的主张,

---

<sup>①</sup> 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一日,重庆国民党左派所領導的蓮花池省党部,于通远門打枪坝召集羣众大会,反对英美軍艦炮击南京。刘湘及所部师长王陵基、旅长藍文彬、江巴萐南各属团練总指揮曹受阳、大队长申文英等派使便衣部队袭击会场,男女学生及羣众死伤数百人,省党部执行委員楊闇公及陈达三、新蜀报主笔漆南薰等先后遇害。



我就一面通电，一面率兵进关。但因我目前的处境关系，时机还未成熟，现在对两方的代表不能不说两种话，请你务必严守秘密。”邓将这个情形电知刘湘后，刘就极力表示靠紧蒋介石。当时刘文辉的代表冷杰生、张篤伦走汪精卫的路子，在北京扩大会议活动；刘文辉、邓錫侯、田頌尧反蒋“鱼电”发出后，声言要派兵去援助閻、馮。而刘湘为討好蒋介石起见，就公开地说，成都方面如果要发动，他就要起来制止。

一九二八年春夏之間，蒋介石同桂系在武汉发生战争，刘湘有举足重輕之势。当时他坚决倾向蒋方。一九三一年刘湘的代表鍾体乾到南京，蒋曾向鍾体乾提出要求，大意謂两广方面将有异动，中央要集中力量对付彼方，鄂西的紅軍，他势难兼顧，請轉达刘湘派兵到鄂西担任进剿紅軍的責任，将来武汉都可以交給刘湘；并許了刘湘若干包袱，对鍾体乾个人也十分客气，称呼他为“老前輩”。刘湘經鍾轉达后，认为有发展机会，就派王陵基、郭助祺等部到鄂西“围剿”紅軍。所以在购买械弹及机器方面，南京中央确給了刘湘一些便利。从形势上看来，刘湘和蒋介石似乎很接近，实际上則彼此互相利用，并非推誠相与。

在速成、保定两系的对峙中，刘湘、刘文辉势均力敌，两人又系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者，均有統一四川的企图。他們尽管有叔姪关系，但因利害冲突，复有学派之不同，于是就形成势不两立的局面。故一九三二年冬，竟演成二刘之战。刘文辉失敗退至雅安后，偏处一隅，形势远不如昔，而过去又曾一再反蒋，但是他处在这种环境之下，还能够保持相当力量，后来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在彭县起义，确非易事。

## 二、刘湘被紅軍击败后,蔣介石派參謀团入川控制川局

一九三三年工农紅軍进据通南巴各县后,蔣介石以刘湘为“剿匪总司令”,所有邓錫侯、田頌尧、李家钰各部都归刘湘指揮。但据刘湘云,邓、田各部对他的作战計劃,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所以对于川北紅軍,始終沒有办法。当他的直属部队王陵基、唐式遵等部在万源被紅軍击潰后,实力損失很大;又夹杂有所謂刘神仙的关系,前綫部队内鬩甚烈。当时刘湘感于川情复杂,而黄埔系的四川人,复揣摩蔣介石的心理,在各軍以及刘湘直轄部队之間进行挑拨离間。刘湘甚为懊丧,曾电蔣辞职,并約上海邓汉祥来渝,派邓代表他到庐山去見蔣介石,提出几項要求并以辞职相要挟:(一)各軍不奉命,而又有一些黄埔学生在四川挑拨离間,請示如何办法;(二)各軍向他請求临时補助軍費,他以川东一隅的財源,自顧不暇,請中央酌給鉅款,以便支应;(三)請接济他若干机关枪及炮弹等。邓到庐山,先将刘湘无法負責、不得已而辞职的情形,向蔣的秘书长楊永泰危言聳听地談了一番,然后才去会蔣。因楊已先同蔣商量有結果,故邓一見蔣面,所有的問題都得到相当解决。当时蔣介石向邓表示立即电飭川中各軍務必服从刘总司令的命令,如有违命的,准由刘先行撤职后报中央;如有假借中央名义在四川挑拨离間者,准由刘拿办,一面給現款五十万元、炮弹五百发,并給有迫击炮等。

一九三四年十月,江西工农紅軍突围北上抗日,蔣介石跟即电約刘湘到南京面商,一面楊永泰、張羣到上海請邓汉祥电催刘早日东下。邓电知刘后,刘又电約邓汉祥到汉口等他来先行会商。邓到汉口与刘湘見面时,刘問邓:“你看蔣这回約我来,要談些甚么問題?”邓說:“蔣表面上必定講些加重你的責任、提高你的地位及如

何信賴你等等好聽的話，實際上就是要利用你阻止紅軍北上，以期達到他兩敗俱傷的願望。同時他還會借防堵紅軍為口實，派重兵入川，實行掌握川局。”劉湘說：“我們的處境相當困難，只有在兩害取輕的原則下來決定態度，等我深思熟慮後，再行詳商。”劉、鄧由漢口出發，系坐船到南京，船到武穴時劉湘又同鄧密商。劉說：“我的主意已經打定。紅軍的目的究竟是在拿四川或是過路，現在尚難判斷。假使他們的目的在拿四川，當然我們吃不消；但是以官兵保卫桑梓的關係，又是以逸待勞，也未嘗不可一拚；幸而站得住，四川依然是我們的。如果紅軍的目的，只是在假道，那就更不成問題。但如果蔣介石借這個機會派軍隊入川，則我們同紅軍作戰的結果，幸而勝，也是替蔣造機會；若失敗，那就更不必說了。所以無論如何，要阻止蔣派兵入川。我們到南京後，就本着這個意思相機應付。”

劉湘抵南京時，除蔣介石外，所有各院部的負責人，都到下關碼頭來迎接。劉在京住鋼銀巷辦事處，休息片刻即由楊永泰陪同去見蔣介石。蔣向劉說：“有許多重要事同甫澄兄商量，你在途中辛苦了，請你稍為休息後，我們再詳細談。”劉湘為避免見忌于蔣，故意裝着笨拙的樣子，話都說不清楚。下來後，楊永泰向鄧漢祥說：“你這位伙計是個劉璋，怎麼担得起重任？”鄧說：“你不要把人認錯了。”跟着蔣介石命楊永泰、張羣、吳鼎昌三人同劉湘談問題，他們三人商量結果，決定先約鄧談，然後再晤劉，較有伸縮余地。於是楊、張、吳就向鄧提出了蔣介石的具體意見，主要就是：要劉組織四川省政府，擔任主席；四川善後督辦署改為川康綏靖公署，由劉兼主任；現舉國的共產黨都要到四川，蔣決定仍要劉兼“剿匪總司令”，但以一省的力量擔任這個艱鉅的責任，很難有把握，蔣擬派十

个师分头由川东、川北两路入川协助作战，所有入川的中央軍及四川各軍，統归刘湘指揮調遣；至軍費及械彈等，中央更应負責。他們的話說完后，邓汉祥回答說：“这个布置很周密，但四川軍民的心理，我們应特別考慮到。我是貴州人，我深知过去因滇、黔軍隊以及北洋軍几次入川蹂躪地方，四川人对客軍的印象历来就很坏。現在中央軍固然同滇、黔、北洋軍不同，但是一般軍民認為是客軍則一也。四川全省軍隊約有五十万人，若果因为这十个师入川的关系，而使五十万人生出主客利害不同的心理，不肯努力作战，刘甫澄个人縱然肯負責，恐亦无济于事。”楊、張、吳对这一点都提出不同的看法，并說了許多解釋的話。邓將同楊、張、吳談話的情形轉告刘湘，刘說，这个意思表达就足够了，同时又告訴邓說：“你再会到楊、張、吳时，就說我愿意尽力效命疆場，但总司令一职，責任重大，請中央指派資望較高的人去担任，我愿听指揮。”經一再往返磋商，蔣見刘的态度坚决，不愿弄成僵局，始打銷派兵入川之意，而另組織參謀团入川帮助；又提出賀国光为參謀团主任，因賀与刘湘是四川速成同学的关系。同时組織四川省政府，蔣介石提出以康泽为保安处长，蔣志澄为教育厅长，其余人員統由刘湘推荐。刘只承訖蔣志澄的教育厅长，拒絕康泽作保安处长；后来康泽率別动队随參謀团入川，分駐交通要道各县，表面上說是为了清查共产党，暗中則进行破坏刘湘的活动。一九三五年一月參謀团到重庆时，工农紅軍已到貴州遵义，刘湘同賀国光会商結果，派郭勋祺、潘佐等部向貴州土城方面，派廖泽等部向貴州松坎方面，阻击紅軍。后来紅軍由云南、西康經川边北上，刘湘又率重兵在邛崃一带阻止。这是刘湘反革命活动的具体事实。

### 三、參謀團入川后劉、蔣的明爭暗鬥

參謀團到重慶不久，就改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重慶行營，專管川、滇、黔、康的政治、軍事、經濟大事，蔣介石并親自來川主持。行營秘書長就是楊永泰，賀國光改任參謀長。表面上蔣介石說扶助劉湘統一川康，實際則企圖拉垮劉湘，直接掌握川康。這個時候，劉湘如芒刺在背，時感不安。劉湘雖亦陽言擁蔣，暗中則多方防制蔣的勢力侵入四川，蔣、劉矛盾，因之日趨尖銳化。劉每天所搜集的情報，內容大多都是關於復興社分子對他進行破壞活動的情況。一九三五年二月，川省府在重慶成立，蔣刚到重慶，就叫他的秘書長楊永泰向劉湘說：“重慶行營要仿武漢行營的先例，在重慶訓練四川縣政人員，訓練完畢後，交由省政府以縣長、區長委用。”當時劉湘堅持此項訓練應由省府主辦，并以去就力爭，結果改由行營同省府合辦，由劉湘主持其事，另由行營派王又庸任該所主任，以省府秘書長及各廳處長為教官，關於法律的課程，由高等審判廳長擔任，三民主義的課程，由國民黨書記長擔任，保甲法令，由行營派程懋型專任，并由行營派復興社分子擔任軍事管理和軍事訓練的責任。於是一九三五年的四、五月間，在重慶成立縣政人員訓練所，招考學生約四百人，凡國內外大學畢業、在軍政機關服務一年，或高中畢業、在軍政機關服務四年者，皆可報考。開辦後由鄧漢祥以省府秘書長的名義代表劉湘主持一切，劉湘并諄囑鄧要用全副精神來注意此項訓練，絕對不要受訓人員走“中央”的路子，因為要利用這些人員到基層去防制“中央”的勢力浸入地方。又以受訓人員全部都是四川人，鄧便以地方的狹隘觀念來麻醉他們，一面暗示他們一定要擁護劉湘，跟着省政府走，才会有前途，并明白告訴他們，

县长、区长是由省府委派，行营虽然可以管省府，但绝对不能委县长、区长。一般受训人员因自身的利害关系，当然倒向省府方面。受训期间，规定为三个月。约在一九三五年七月，省府由重庆迁到成都，县政训练所也随之搬来成都。在第一期将要毕业的时候，适蒋介石在峨眉调训全川中上级军官，并命县训所受训人员前往参加训练，于是该项人员又到峨眉受训后，才回成都考试毕业，毕业时分为县长班及佐治班任用。县训所前后办过三期，共毕业一千零十七人。在刘湘任川省主席时期，县训人员担任县长的经常保持八九十人；全川五百多个区长，完全是县训人员充任。县训所二、三两期受训人员，绝大多数仍是考试来的，有一部分是调训现任县长，有很少数的人，是由邓锡侯、刘文辉、田頌尧、李家钰、杨森等各个军事长官保送的。入所后，规定集体加入国民党，也不过是照例文章。这是蒋、刘争取行政干部的经过事实。

一九三五年夏，川省府颁布在成都征收房捐的命令，尹昌衡、胡景翼、刘存厚等联合部分武备生准备起来反抗，并以运动罢市相要挟。刘湘为贯彻他的命令及保持省府威信计，就派兵把尹、胡、刘的住宅监视起来，表面上说外间谣言甚多，特派兵来保护，请“尹都督、胡都督、刘将军不要出去”，以免发生危险，一面并逮捕了几个武备学生。这时候蒋介石为讨好那些反抗分子，命刘湘立刻撤去包围尹、胡、刘住宅的队伍，并释放扣押诸人，刘拒未照办。蒋、刘的斗争，就更表面化了。

蒋介石为麻醉、收买川军中上级人员，曾在峨眉组织军训，并亲临主持，而以刘湘副之。刘为缓和彼此间的冲突，曾向蒋披沥肝胆，大意谓：“湘的胃溃疡病十分严重，自知有生命危险，来日无多，其所以勉强担任川省军政职务者：一因受委员长的知遇，当此国家

多事之秋，不忍決然引退；二因受地方父老之培植，在四川担任軍政职务二十余年，无一善政报答桑梓，不能不力疾从事。四川是国家后防重地，委員長在川对于国防上的布置，請放手为之；关于四川軍民两政的措施，亦請明白指示，湘无不唯命是听，但希望中央在川人員通力合作，方能收指臂之效。”刘当时大有垂涕而道之概。蔣聆悉后，很肤泛地答复說：“甫澄兄，你的意思很好。你安心好好养病，以后有事，就叫秘书长、參謀长来見我。”刘湘回成都将这个經過告訴邓汉祥，认为蔣介石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于是决定采取两面手法，表面敷衍蔣，暗中則加強防蔣的布置，对外切实聯絡两广、云南各反蔣派，以作声援，先后派张斯可、李星輝、刘亚修到两广活动，派魏子銑、李叔尧到云南接洽，龙云也派胡郁蓀当代表，长駐重庆。凡关于反蔣方面的接头事宜，刘指定总參議鍾体乾、參謀长傅常負責，这一类有关函电，統由綏靖公署办理。关于敷衍中央方面的接洽，則指定秘书长邓汉祥負責，往来的函电，由省政府办理。

#### 四、两广事变与刘、蔣矛盾之发展

一九三六年夏，广东陈济棠通电反蔣，桂系亦准备发动，情势甚为严重。蔣曾电刘要他通电指責陈济棠据地称兵，破坏国家統一，其用意就是逼刘表明态度。当时刘在大邑县安仁鎮家里，邓汉祥持电前往面商。邓开口就說，四川輸贏吃糖的机会到了，这回蔣同两广打的結果，必定两败俱伤，无论誰打胜，都非拉攏四川不可。邓主张先打一个冠冕堂皇的通电，再坐观成敗，刘极不贊同。刘认为应响应两广，壮其声势，若不然，两广先敗，四川更无法对付蔣，要邓回省通电，以一百字为限，使两广看去不是在帮蔣，但对蔣也必須敷衍。邓回成都照刘的意思发出通电后，刘湘也跟即来蓉，秘密

召集主要干部商討此事。开会时參謀长傅常及潘文华等都主张立即发动,先包围成都中央軍校及重庆行营,把它接收过来,邓未說話。最后刘又問邓对大家的意見是否贊同,邓說:“原則贊同,但采取的步驟应慎重考虑。因两广反蔣固然一致,但內中分歧很多,而且蔣介石一貫以挖牆脚的办法对付各省,陈济棠的部下是否有被蔣收买的,尙难断定。如果我們馬上发动,万一两广內部有問題,不能支持,則蔣介石的矛头、必然就会轉向四川。我認为目前只能暗中准备,俟双方战事到重要关头,再采取行动,較为穩当。”刘湘当即表示同意,但散会后,仍由綏靖公署密令所部軍隊夜里向成都、重庆两地集結。殊陈济棠通电不到三天,陈的部下余汉謀就发出反陈通电,广东的空軍也变了,于是未放一枪而陈济棠就垮了台。这时刘湘很着急,曾到貴州館街邓汉祥的家里,要邓代表他到庐山去見蔣。邓說,这个时候去,沒有甚么作用。刘說,“現在非去不可,蔣對我們究竟是什么态度,必須探討清楚,才好决定应付之方。”邓即到庐山,蔣一会見就怒容滿面,喊副官把地图拿来,指着地图說:“甫澄夜里調动某些地方的軍隊,作附和陈济棠反抗中央的活动,我已經很清楚。”憤怒之情,溢于言表。邓当即力为解說,极端否認調兵的事情,并謂即令有此事,也是为了勦匪,而不是附和陈济棠,因四川的土匪同哥老向来互通声气,所以勦匪的軍隊一定要在夜晚行动,才不会泄露,并举过去刘湘維護蔣的許多事实,来証明刘絕對不会附和陈济棠。因而蔣的气始稍平,最后写了一封亲笔信交邓轉給刘,略示敷衍,但內心上对刘已結成不解之冤。

刘湘始終顧虑的,是怕蔣介石收买他的部下,挖他的牆脚,于是把原来二十一軍有名无实的武德学友会充实起来,表面上以崇尚武德、研究軍事学为号召,实际上則是团結所部拥刘防蔣,并由



傅常、张斯可向刘介绍郭春涛、高兴亚、郭秉毅、汪导余、李蔭枫等为武德学友会设计委员，另外以彭光汉、刘兆葵、潘佐等为核心，专门考查各级军官的言论行动，密报刘湘，作为各级军官升迁奖惩的参考材料。刘并在成都调训营长以上的军官，由各设计委员分别担任讲授有关思想方面的课程，至精神讲话，则由刘湘、邓汉祥每星期各去讲两次。自张斯可代表刘湘在广西签定反蒋抗日联共的“红、桂、川军事协定”<sup>①</sup>，商定如果蒋介石不抗日，还打内战，就联合起来反蒋，以后刘曾派王干青代表他到延安，延安也派李一氓代表来川，嗣后又派罗世文代表来成都。在这个时候，刘自知力不敌蒋，为图生存及割据四川，不能不联络蒋的敌对势力，尤其是不能不敷衍共产党，借以自卫，这是由于他的利害关系使然，并不是真正对共产主义有什么好感，观点立场有所转变。然而他既要“联共”，对过去摧残进步人士的那一套反动措施，就不能不收检起来，这对发展民主抗日力量是有好处的。

一九三六年八月发生的成都大川饭店事件，也是蒋、刘暗斗的事件之一。是年六月，南京外交部曾电刘湘说，日本拟在成都设立领事馆，刘湘复电，以成都既非商埠，又无日侨，更无条约的根据，且东北淪陷后，川人仇视日本的情形甚为激烈，请外交部慎重考虑，严词拒绝。八月二十日前后，日本派来设领事馆人员深川经二、渡边洗三郎、田中武夫、瀬戸尚四人，住驛馬市大川饭店，刘湘

---

① 据张斯可谈，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即由北京到桂林，代表刘湘同李宗仁联系，探询桂系对于时局的态度，当时中共亦有代表在桂。张回川将会商结果向刘湘报告后，刘又命他赴桂签订这个协定。张现因患中风症，记忆力很差，只记得当时代表桂系签字的是李宗仁，至于代表中共签字的代表姓名，他已想不起来。

毅然拒絕，決定辦法三項：（一）派員到大川飯店向此四日人說明成都不能設領館，勸其早日離開；如果善說不行，即由武德學友會策動成都各界示威遊行，壓迫他們出境；（二）為了避免中央特務搗亂，並為將來應付中央預留地步，暗中策動抗日民眾團體，邀請蔣介石在成都的特務分子參加指導遊行；（三）示威遊行時，軍警只能維持秩序，不准干涉。在示威遊行的時候，特務分子不敢公然違反羣眾的意旨，不得已勉強參加；在進行中，劉湘叫人用手提照相機把特務沿途活動的情形完全照下來。羣眾經過大川飯店，竟將該日人等痛加毆打，渡邊洗三郎、深川經二二人當場斃命，其餘二人負傷未死。事件發生後，蔣介石想借外交問題收拾劉湘，曾電責劉湘事前既未防范，事後又不緝凶，對該事件應負完全責任。劉湘復電說，此次事件有成都中央人員領導發動，又系愛國行為，事前未便阻止，事後無法緝凶，並將當日運動中所拍各種照片函送南京。蔣介石無法嫁禍，始改由南京外交部負責交涉。

## 五、劉湘在西安事變以後的思想變化

劉湘的思想，起初極端反共，繼因利害關係，向延安拉攏，可以說還是一種手段。雙十二事件發生時，劉湘召集幹部會議，傅常、潘文華等主張立即發動，調集軍隊包圍成都軍校及重慶行營。鄧漢祥不同意這個辦法，說：“如果張學良把蔣介石殺了，所謂軍校、行營，還搬得起走嗎？如我們這個時候發動，假使張把蔣放了，我們怎么下台？”劉湘贊同鄧的主張，並要鄧去安慰在成都的蔣系人員。時何應欽忽派他的胞弟何輯五來成都，找鄧漢祥介紹向劉接洽，大意謂黃埔系推何應欽為總司令，蔣死後，黃埔的力量，何領導得起來，希望同劉合作，一面他還要到昆明去聯絡龍雲。何輯五並說，他哥

哥主张派飞机去炸西安，就是逼张杀蒋的意思。殊正說得很起劲的时候，张学良就把蒋介石放了。于是何輯五恐慌万状，不敢回南京，便改装飞回上海。刘湘虽然没有发动，但成、渝两地的特务曾借此事向蒋多方挑拨。蒋对刘的恶感，更如火上加油。后来刘湘听說是因为共产党不主张杀蒋介石，张学良才把蒋放了，始而很詫异，经过几天的思考，他便大声地說：“共产党真是以国家大局为重，不計恩怨。共产党经过长征，到北方不久，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尙待布置，这时如果把蒋介石杀了，全国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必然演成混乱局面，徒为日本人造机会而已。这事确是为国家大局着想，抛弃历年和蒋的积怨，标举外御其侮的大义，并且有当家作主的风度，非有伟大的眼光和气魄，决不能做到这步。”共产党对这一件事所表现的伟大气魄，的确感动了刘湘，因而他对共产党初由仇視轉变为利用，再进一步变为推崇，是经过一番过程的。从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所提的提案来看，就可以証明他的思想确有轉变。一九三七年春，刘湘在极端反共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能够大声疾呼，主张“集中人才，精誠团结，解放言論，发揚民气”，且对“国家人才之受摧殘，即元气之受损伤”痛切言之，此已可表明他内心确有轉变，至其措詞之不能不相当含蓄，在当时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明眼人不难一望而知。

## 六、川軍整軍會議

一九三七年六月中旬，蒋介石电刘湘囑即派全权代表到南京，有事相商。这时候全国各省都比較平靜，刘湘认为蒋一定要打他的主意，初派建設厅长卢作孚代表前往，意在探明蒋的意旨，再設法应付。殊卢到重庆晤賀国光后，因賀說卢同刘的关系不够，仍回

成都。因而刘又改派秘书长邓汉祥前往，刘并向邓說：“無論蔣出什么題目，我們抱定一个‘拖’字来应付，拖一天有一天的机会，总以避免和他冲突为上策。”邓到南京，飞机場有五、六十个新聞記者包围他，因当时特务散布謠言，說四川要造反，故記者特別注意。經邓負責声明四川很安靜，記者始散去。蔣派他的副官长姚琮到机場接邓，要邓立即往見蔣。晤时蔣直截了当地說：“四川的軍隊太多，應該縮編。四川一省，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甫澄身体多病，兼管軍民两政，深恐他体力不逮，中央拟派能够同他合作的人去任省政府主席，甫澄专負綏靖地方的責任，使他便于休养，对地方和他个人都是有利的。”邓当即負責代刘答复說：“縮編軍隊，如果四川各軍在一个标准之下，同时进行，自无問題；至軍民分治，請中央再加考虑，因四川在防区时代，混乱多年，人民深受其苦，自前年省政府成立、川政統一后，关于地方治安及用人用錢各方面，始稍有眉目，今截然划分，軍政民政由两个人負責，恐难收輔車相依之效，轉增中央西顧之忧。”蔣毫不为动。邓又說：“委員长日理万机，不便多来麻煩，可否指定一位負責人員从长研討，使汉祥多有陈述的机会。”經蔣指定何应欽之后，邓向何說：“縮編軍隊和軍民分治两件事，何不分两个步驟办理？如果同时进行，难免不逼得狗急跳牆。先縮編軍隊，过一些时再提出分治来，同样可以达到中央的愿望。这是一件大事，望同蔣先生熟商之。”何将这个意思轉告蔣后，第二次邓見蔣，蔣就沒有再提軍民分治的話了，只是說准七月一日在重庆开整軍會議，派何应欽代表到渝主持。邓回蓉时将接洽情形詳告刘湘，刘即分电蔣、何表示拥护整軍會議。

何于六月二十八日飞渝。刘湘部下，大多阻止刘到重庆，并有三个旅长跪在地上痛哭，說到重庆非常危險，万一被扣，就毫无办

法。刘向邓密商，問邓究竟是去好是不去好。邓說：“假使我替蔣介石策划，絕不采取扣留你的办法，因把你扣起来，你的几十万軍隊仍然会成問題。不如采取用繩子勒死的巧妙办法，先縮編軍隊，再軍民分治，最后調你到中央去当个部长，岂不比較省事得多嗎？但这还是我个人的推測，最穩当的办法，是你坐汽車前往，我乘飞机先去，俟何应欽到渝，我先同何密談，从何的态度中就可以作有力的判断。我晤何后，即秘密到璧山来迎你。屆时如果有顧慮，就以旧疾复发为借口，中途轉回成都；倘无顧慮，便大大方方地进重庆。”刘极表贊同。邓即先飞往重庆晤何，首先就說，此間的謠言甚多。何問什么謠言，邓說：“不外說，整軍就是对付刘甫澄。”于是何尽量解释。邓又說：“蔣先生的把戏很多，謠言不能认为毫无根据。”何慨然曰：“我是貴州人，如果蔣真要下手刘甫澄，我肯来当劊子手，同四川人結不解之仇嗎？”何說这个話的时候态度很自然，邓因同何有同乡同学的关系，認定何这話絕不是欺騙他的，于是当夜赶到璧山将經過詳告刘湘，刘始决心到重庆。

七月一日整軍會議開幕，何应欽代表蔣介石說明整軍的意义后，軍长李家鈺首先发言，說他在前方同紅軍作战，刘湘就在后面收編他的軍隊，他想不通这是什么道理。何应欽立即制止說：“我們这个會議有一定的范围，李軍长的話是橫生枝节，出乎范围以外了。”李就沒有往下再說。开会的結果：（一）各軍縮減十分之二；（二）团长以上軍官，由中央直接委派；（三）川軍的軍餉，每月由軍政部派員点名发放。这一来，蔣介石把川軍的用人权、經濟权都拿走了。各軍事长官尤其是刘湘，当然不愿意，但因不愿和蔣破裂，挨头一刀，不能不勉強接受。

在會議将要結束的时候，“七七”事变忽然发生，何应欽便匆忙

回南京，大家以为所謂整軍會議，必然是无疾而終了。殊八月三日蔣介石在南京召集国防會議，全國各軍政負責人員都前往參加。劉湘、鄧漢祥八月三日午後二時同到南京，劉湘隨即往見蔣。蔣向劉說：“我曉得你今天來，故決定今晚開国防會議，請甫澄兄務必參加，一切事情，我們另外約時間再談。”開国防會議時，頭一個發言的是蔣介石，其次是閻錫山，再其次就是劉湘。當時劉湘在會場里大放厥詞，竭力主戰，并說四川可以出兵三十萬，供給壯丁五百萬和糧食若干萬石。在羣情激昂的情況下，蔣介石也不能不主戰。

次日早九點鐘，何應欽在顧祝同家里約鄧漢祥去商量事情。鄧到顧宅時，何應欽即將蔣介石寫給何、顧二人的親筆信交鄧看，信中的大意是說，他四日早八時飛往廬山，准五日九點以前回南京，叫何、顧同劉湘詳商如何貫徹執行整軍會議的決議案，以及四川出兵抗戰共分幾路，每路的人數和指揮人員如何決定，叫何、顧于五日九時去報告他。鄧看畢這個信，便向何、顧說：“現在既決定抗戰，何必還要說執行整軍會議案呢？劉甫澄個人對此不會有甚麼問題，但川軍官兵必然會因此發生一種誤會，認為中央不相信四川將領，減少他們抗戰的興會和勇氣。你們兩位就地位說，就同蔣先生的關係說，都要向蔣先生陳明利害，打消此意。”鄧正在拿着信向何、顧談話的時候，忽然劉湘來回拜顧祝同，鄧不能不把蔣的原信交給劉看，劉沉不住氣，當時臉色就變了。于是何應欽向劉說：“這件事我們認為還應該商量，所以先同冀階兄談，請甫澄兄暫時不必參加，俟我們商量妥后，再同你說。”于是劉湘就先走了。何、顧看出劉湘臉色不對，才答應向蔣去說，要鄧五日十一時到何應欽家去听回信。鄧屆時前往，何向鄧說：“蔣先生對整軍會議案認為必須貫徹執行，意甚堅決。”鄧將何的話轉告劉湘，劉湘說：“我們想法子

溜回四川再說。”邓說：“要溜也不要露馬脚，不然就恐怕走不了。”是日下午五时，蔣介石在孔祥熙家里打电话約邓去談話，一見面蔣就問邓：“你們这几天商量得怎么样？”邓說：“出兵的事已商量好，分为两路，邓錫侯部由川北开拔，取道陝西；刘主席所部，則順江東下。这样分开来，沿途的給养和交通工具，都不感受困难。至执行整軍會議案，刘主席向来服从命令，没有什么意見。不过我替委員長設想，当此抗战用人之际，整軍會議案可否暫緩执行？”邓的話还未說毕，蔣就发气了。蔣說：“世界上無論任何国家，軍政不統一，那个国家还有办法么？”邓又說：“云南、广西、山西，軍政都还没有統一，也不仅四川一省特殊。”于是蔣更怒不可遏了。邓汉祥在急不择言的情况下，就大胆地說：“如果因貫徹执行整軍案而川軍調不出来，怎么办呢？”这一句話确打动了耍流氓手段的蔣介石，蔣便順风轉舵說：“暫時則可，永久則不可。”邓說：“抗战结束后，全国軍政統一，四川自然不会例外。”于是蔣介石又說：“财政厅长刘航琛大嫖大賭，不理正事，太不成話，告知甫澄另推荐一人，把他換了。”邓說：“現在正要出兵，財政上驟易生手，恐有妨害。可否告知刘主席先准备一个适当的人，等出兵告一段落，再行撤換刘航琛。”这个时候，蔣因稍为冷靜，故对邓的建議亦表贊同。

邓回到銅銀巷办事处，将同蔣談話的經過詳告刘湘。刘說：“蔣的話靠不住，我們总以設法溜走为妙。”刘、邓正在談話时，蔣介石忽然来电话說，他就到办事处来看刘湘。蔣来到和刘湘握手后，就說：“甫澄，我們两弟兄自从北伐以来，你对国家和我个人的維護，我是不会忘記的。現在要抗战，四川对国家的关系更重要了，以后希望你多負責任；整軍案俟抗战结束后再說。不过我过去总以为事必躬亲，才放得下心，必須与我有关系的人，才是人才，才肯重

用。这一念之差，几乎把国家誤了。我現在則不然，譬如朱子文当财政部长，我只把財政方針告訴他，至如何安排，如何去做，我决不过問。又如現在我所用的人，有許多是素昧生平的。不过我过去这些短处，甫澄兄或多或少亦不免有相同之处。四川地方之大，人口之多，不亚于欧洲的大国，希望甫澄兄在軍政两方面提綱挈領，多延攬人材，前途一切，自然会收事半功倍之效。”蔣走后，刘湘很高兴，向邓汉祥說：“老蔣今天算同我說了几句知心話。”邓說：“还是‘川軍調不出来怎么办’这句话起了作用。”这一段經過，就充分証明蔣介石的流氓本质。

## 七、川軍出川抗战与刘湘之死

刘湘回成都同邓錫侯商定，邓亲率陈书农、孙震、李家钰等部十余万人由北路出发，刘亲率唐式遵、郭勋祺、饒国华等部約十余万人从东路出发。当时刘湘的病尚未痊愈，邓汉祥曾劝他不必亲自出去。刘說：“过去打了若干年的內战，报不出賬来，今天有了抗战的机会，不能不尽力报国，爭取个人在历史上的篇幅。而且我这次調出去的軍隊，約占全部半数以上，如果我不亲自去指揮，不到半年就会被蔣介石分化或消灭了。”刘湘布置就緒后，省政由秘书长邓汉祥代理，綏靖主任职务由总参議鍾体乾代理，刘湘率兵出川抗战，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到南京之日，日軍已將逼近鎮江。蔣一見面，就說要刘守南京。刘为坚决主张抗战的人，不能說不接受此項艰巨任务，但事实上南京绝对守不住，其結果將不但牺牲川軍，且將落失守南京的罪名。因之，刘湘很躊躇，向蔣說：“我刚到南京，队伍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等我馬上去弄清楚，再来回話。”刘湘原来有严重的胃潰瘍病，辞別蔣介石出来，在車上大吐其血，竟



至昏死。蔣一面派船把他送到汉口医治，一面派陈誠为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并把刘湘所兼的集团軍总司令委唐式遵接任。刘湘到汉口后，病稍愈，得悉蔣介石这两道命令，异常憤慨。跟着唐式遵又派人向刘索取集团軍总司令印信，刘更为痛心；因唐本是刘的心腹，被蔣介石收买后，忽然改变态度，刘湘当然是想不通的。这是刘病加重的主要原因。一九三八年一月廿日，刘湘临死的头一天，何应欽去看他的病，談話很久，他或不免又受了一些刺激，第二天便死了。

刘湘死后，外面盛传他是蔣介石毒死的，其事虽然不确，但由經過一切情形看来，可以說刘湘完全是被蔣介石气死的。

## 蔣介石派張羣圖川的經過

鄧 漢 祥

### 一、蔣、張的歷史淵源

前清光緒末年，張羣同蔣介石（當時名蔣志清），在保定進陸軍速成學堂，而且同講堂、同寢室，彼此交誼甚篤。當時速成學堂總辦段祺瑞挑選學生到日本進振武學校，張、蔣二人也在選送之列。振武畢業後，蔣、張均分配入聯隊見習。適辛亥武昌起義，陳其美在上海獨立，組織都督府，陳任滬軍都督，黃郛任參謀長。黃在日本進測繪學堂時，同蔣、張二人都認識，於是蔣、張二人就到東京同盟會辦事處請發回國路費，由同盟會辦事處負責人任鴻雋各給老頭票三百元。他們便聯袂回上海，經黃郛推薦張羣任都督府參謀，蔣介石以浙江同鄉的關係，委為團長。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失敗後，陳其美被刺身死，張羣仍回到東京進士官學校，蔣介石就在上海同楊虎等過流氓生活。

張由日本士官畢業回來，即加入政學會。一九一六年春，政學會擁護岑春煊在肇慶組織軍政府，反對袁世凱的洪憲帝制，章士釗任秘書長，張羣任副官長，楊永泰任廣東省長，而幕後主持人就是唐繼堯的代表李根源。因雲南是反對帝制首義省份，所以李頗為各方所重視。章士釗、楊永泰、李根源等，都是政學會的主要份子；張

羣依草附木，也成为政学会不可缺少的人了。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袁世凱死后，黎元洪依法繼任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肇庆軍政府就因之取消。后来，李根源到北京任农商总长，张羣在农商部的名义是参事上行走，楊永泰、章士釗等仍充国會議員。这一批政学会的主要份子，在北京多方包围黎元洪，当时所謂府院之爭，政学会諸人都是站在总统府方面。一九一八年熊克武做四川督軍时，张羣任成都警察厅长。胡景翼及岳維峻先后任河南督軍时，不知张羣因甚么关系，得任开封警察厅长。

张同霸据苏、浙两省的軍閥孙传芳素有交往，一九二七年蔣介石北伐到南昌时，委张羣为总参議，意欲使张說服孙传芳，不战而收复苏、浙。在这过程中，张羣縱然沒有达到蔣介石的企图，但蔣认为张有智謀，从此就更加倚重了。

蔣介石窃据国家政权后，先后任命张羣为上海兵工厂总办、軍政部次长、上海市长、湖北省政府主席、外交部长等职，便一跃而为蔣介石参与帷幄的主要份子。张羣为扩张他的政治势力，并向蔣介紹楊永泰作“江西剿匪总司令部”的秘书长。在张羣、楊永泰呼朋引类、广植党羽的情况下，政治、外交各方面都布滿了他們有关系的人，于是一般都呼他們为新政学系。其实所謂新政学系，并无組織，而且张、楊都避諱政学系的名称。

## 二、抗战前的四川局势

当一九三〇年夏，蔣与閻、馮发生战争，张学良在两者之間，有举足重輕之势。蔣介石派张羣到沈阳去运动张学良維護伪中央，閻、馮也派代表去包围张。张学良对张羣說，他絕對維護中央；但对閻、馮的代表又說：“咱們北方人，当然站在一块。”张的用意究竟

何在，誰也不能斷定。這時適鄧漢祥代表劉湘到沈陽，因鄧和张原來認識，故張對鄧比較重視，幾乎隨時都在見面。張羣想在鄧處探討張學良真正意旨所在，對鄧異常敷衍，並坦率的向鄧說，他過去在四川帶熊錦帆系的色彩很重，劉甫澄與熊有政治宿怨，對他也不免有誤會，請鄧向劉解釋。鄧電劉湘後，劉立即致電張羣表示聯絡，因之張對鄧更為親切。

在蔣與閻、馮戰爭中，約一九三〇年九月，劉文輝曾發出“魚電”反蔣。後來張學良發表“巧電”附蔣，奉軍陸續進關，閻、馮就垮了。這個時候，鄧漢祥問張羣，對劉文輝的事可否向蔣疏通。張說：“我不能負責答復，好在我們就要回上海，轉去再商量。”到上海後，張羣向鄧說，蔣在奉化，他要去會蔣，關於劉文輝的事，問鄧怎麼辦。鄧說，由劉湘電蔣，替劉文輝說情，蔣即根據這個電表示寬容。張又說，這也是一個辦法，要鄧打電給劉湘速來一電，由他轉蔣。這一公案，就是由這個途徑解決的。蔣回南京後，張羣又來告鄧速商二劉提出解決四川問題的具体方案來。鄧因而飛重慶晤劉湘，商量結果，劉湘主張軍民分治，他任善後督辦，劉文輝任省政府主席。事實上，他們兩人行使職權，還是只能及於他們自己的防區範圍。

一九三二年冬，二劉因利害衝突，且因速成、保定兩系派別之不同，竟以兵戎相見。劉文輝失敗退守西康，形勢遠不如昔。劉湘則因戰勝，大為擴張，實力乃駕乎各軍之上。這是二劉消長的關鍵，也是速成、保定兩系升降的重要關鍵。一九三五年二月，劉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川康綏靖主任，川政始告統一。

在這個時期當中，劉湘和蔣介石的矛盾異常尖銳，劉企圖割據川康，蔣則處心積慮，非消滅地方力量、直接掌握不可。蔣、劉的矛盾始終無法消除。

### 三、抗战初期四川軍人反对张羣主川的 斗争和被王纘緒出卖的经过

抗战軍兴，刘湘率兵出川抗战，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一日病死汉口。蒋介石认为拿四川的机会到了，于是下令撤销刘湘所担任的第七战区，撤销川康綏靖公署，以张羣继任川省府主席。消息传来，羣情憤极。当即由武德学友会召集会议，反对张羣主川，反对裁撤川康綏靖公署。邓汉祥原来没有加入武德学友会，在开会的时候，有人提议约邓来参加，共策进行，因而推三个人去请邓来。邓到会場，极端赞成反对中央对四川的两道命令，并主张必须联络邓錫侯、刘文辉两部一致行动，无论如何，可以断定蒋绝对无法分兵来打四川，只要我们团结一致，坚持到底，蒋非收回成命不可。会众极端赞同。当时武德学友会是由省府保安处长王陵基领导，王的态度亦甚坚决。

蒋在束手无策的情况下，便约在汉口的傅常，刘航琛、卢作孚去商谈。蒋说：川康綏署可以保留，张羣单独一人到川接任省主席，所有原来的委员、厅处长一律不动，要傅、刘、卢三人回成都传达这个意思，一面以集团軍总司令名义暗中收买王陵基。

傅、刘、卢到成都，先同王陵基勾结好后，即由王陵基请邓汉祥及各师长到他家里吃饭。邓刚进门，傅常说：“我们昨夜晚到得稍迟，来不及看你，以后四川的事，还要请你多费心。”邓问傅：“这话是什么意思？”傅就把蒋介石叫他们回来传达各节详告邓。邓说：“这个办法，别人的意思怎么样我不管，我是不赞成的。张羣早来我晚走，晚来我早走。好在我是貴州人，我的去留，不发生任何关系。”当时廿一軍各将领对邓有相当信仰，邓的态度很可以影响一

般軍官的心理，于是羣起附和邓的意見。王陵基見事不妙，便主張飯后到武德學友會召集團長以上軍官開會決定。開會的時候，傅、劉、盧在王陵基家里坐候消息。因武德學友會就在文廟后街王陵基住宅的對面，開會時有人說傅、劉、盧是漢奸，又有人說劉湘被蔣介石毒死，毒藥是由傅常拿去的，并有主張殺傅常者。于是會場空氣甚為緊張。王陵基竭力替傅解釋，并以身家性命担保，始告無事。反對張羣主川及撤銷川康綏署命令，則全體一致。

傅、劉、盧見情形不佳，遂即飛往漢口向蔣介石報告，把反對中央命令的責任，完全說是邓漢祥一人从中作祟所致。蔣不得已，便自行轉灣，把張羣調為重慶行營主任，命廿一軍將領推一人代理主席，他再从長考慮人選；一面由前方調邓錫侯回來任川康綏靖主任。至代理主席人選，劉文輝、邓漢祥及各將領都認為以潘文華為最適當。潘初已承訖，后来忽然變計，說王纘緒詭計多端，對廿一軍的內容，知道得很清楚，如果不把他拉住，他必然倒在蔣介石方面作破壞工作，不如把主席給王，使他站在我們這方面，較少顧慮。因之，遂決定王纘緒代理主席，并由武德學友會推派代表到漢口見蔣，請求發布命令。時邓錫侯已回成都就綏靖主任職，蔣又電約邓到漢口商詢后，始發表王纘緒代理主席，邓漢祥仍作秘書長。

从此之后，邓錫侯、劉文輝、潘文華、王纘緒、邓漢祥五人每日輪流作主人，借吃飯為名，商量如何把持川康、保持實力，如何表面擁蔣、暗中多方防制，使蔣對川康无从下手。五人晤面，可謂無話不談。在這当中，适蔣介石約龍雲到漢口，龍飛抵成都鳳凰山機場時，邓錫侯、劉文輝、潘文華、王纘緒、邓漢祥一同到機場接龍。五人同龍雲在機場閉門密談，邓錫侯首先發言，請龍在成都留幾天，以便詳商一切。龍說：“我今天非走不可，因飛機是包到漢口。本

来我此次不想去，因蔣来电說，如果我不去，国际上很受影响，就是有謠言，說云南要投降日本人，所以我不能不去。我想先到汉口問蔣，他对軍事、政治、經濟、外交各方面的布置如何，他所謂抗战到底，底究竟在甚么地方。我把这一些問題都弄清楚后，再回成都詳細商量。”于是刘文輝接着說：“我們五个人都要談話，恐怕時間来不及。我想請鳴阶作代表，他的話就是我們几个人的意思。”邓汉祥接着說，川、滇、黔、康，唇齿相依，地理历史，风土人情，都有密切关系；抗战期間，这几省成为后防重地，应如何切实团結，共策进行，尙望龙大力提挈。龙亦誠懇表示愿意合作。

龙由汉口回来头一天，在邓錫侯家里吃飯，商量川、滇、康合作問題，座中只有龙云、刘文輝、潘文华、王纘緒、邓錫侯、邓汉祥六人。飯后，沒有多談就散了。龙云行至中途，忽又折轉到貴州館街邓汉祥宅向邓說：“我們云、貴是一家，我請問你，他們几个人究竟靠得住靠不住？他們过去都是打过仗的，是不是真的能够合作？你一定很清楚，請你告訴我，我才好下决心。”邓說：“他們几位都感覺蔣的路走不通，联合起来，尚可图存，各自为謀，則終必同归于尽。就他們的利害来分析，他們不会靠不住。四川人的性情，同云貴人不同，尽管打过仗，事过境迁，也就无所谓了，不象云貴人打过仗就成終身的冤仇，这是四川人的长处。因此他們的合作，不会有問題。”于是龙云又說：“合作要不要有一个书面的东西？”邓說：“当然要有书面的东西才好。”龙說：“有书面的东西，万一泄露出去，使蔣介石知道，岂不增加麻煩么？”邓說：“这是文字上的技術問題。”龙云接着說：“我要回去抽鴉片烟，請你先預备一个稿子，我們两个人商量后，明天再同他們一起决定。”龙走后，邓即將稿拟好：第一条，拥护抗战国策；第二条，如有违反国策的，就是川滇康三省的公敌；为保

証抗戰國策，三省在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要實行合作。鄧將這個稿子交龍看後，龍甚為滿意。龍說：“我們這個盟約交給蔣介石看，他也不會有話說。”次日在劉文輝家吃飯，經六人共同研究後，一致贊同。龍云說：“簽字後，關於合作的具体辦法，我回去再派參謀長、秘書長到成都來共同研討。”

龍走後，蔣介石即電約王纘緒到漢口，王請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鄧漢祥到他家裏吃午飯，出示蔣電，並征求大家的意見，他是不是應該去。大家一致主張他去，並催促他即日包飛機前往，一面由劉、鄧、潘聯名電蔣介石請發表王纘緒為四川省政府正式主席。

王走後，龍云來電說，他接蔣電，謂川情複雜，請他不要干預。而王到漢口第二天，蔣就任命王纘緒為四川省主席，鄧漢祥調重慶行營第二廳長，其餘旧省府人員，亦全部更換。這時張羣已到重慶接任行營主任，電約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鄧漢祥到渝面商一切。晤時，張羣首先說，要同大家合作，他在中央地方兼顧的原則下，效力桑梓，請大家不要懷疑他。鄧錫侯懇切表示：“通力合作，極表贊成，惟此次省府改組，王纘緒任主席是我們大家請求的，不過把鳴階原任的秘書長委陳筑山接替對於各方聯系頗感不便。若仍以鄧為省府秘書長，則合作更易貫徹。”張承訖負責電蔣照辦，隨即接蔣復電，說鄧作秘書長，王主席不贊成，又証以龍云接蔣電所云，鄧、劉、潘等才恍然大悟已被王纘緒出賣。

事後始知：王纘緒從代理省主席起，即同軍統特務駱德榮、史良等勾結一氣，把每天同鄧錫侯、劉文輝、潘文華、鄧漢祥等密商對付國民黨中央的情形詳報蔣。龍云在成都商談的經過，王亦盡情密報。正在鄧漢祥堅持不到行營的時候，蔣忽電張羣要鄧漢祥立即到漢口，一面張羣又向鄧、劉、潘說：“蔣先生對鳴階很有誤會，此時他



去,必然要吃亏,只要他就行营第二厅长,暫緩到汉口亦可。”邓、刘、潘因被王纘緒出卖,不免惶惧,于是劝邓务必到行营工作,同张羣靠紧,借张的关系来掩护川康地方力量。邓汉祥因而才到行营就职。

#### 四、张羣在錯綜复杂的情势下掌握川政

张羣同蔣介石关系固然很深,但复兴、CC两派同他的暗斗亦很剧烈。张要借川康的力量支持他,也很想通过邓汉祥来联络邓、刘、潘。邓汉祥在这个情况下,因而两面見重,左右逢源,但实际上同张羣只是互相利用,并没有发生任何組織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张仰承蔣介石的意旨,处心积虑,总想掌握川省政权。

一九三九年秋,彭光汉、刘树成、周成虎、謝德堪、陈兰亭、刘元璿、楊晒軒等七將領,由邓、刘、潘策动,联名电蔣,揭发王纘緒祸川十大罪状,請中央罢免王的省主席职务,以謝川人。当时张羣想利用这个机会繼任川省主席,但邓、潘、刘表面縱然同张切取联系,实际仍不愿张掌握省政。于是由邓汉祥婉劝张,俟时机成熟再行着手。但蔣又不愿刘、邓来做主席,不得已由蔣自兼。

在这个时候,张羣为进一步拉攏川康各方人士,乃商由蔣介石发起組織川康經濟建設委员会,聘請邓錫侯、刘文輝、潘文华等以及两省党政軍負有声望的九十多人作委員,蔣介石兼任該会委員長,以邓汉祥为秘书长,实际上是张羣負責主持。一九四〇年秋冬之交,在成都开全体委員大会,原决定蔣亲来主持,临时改派吳鼎昌、賀耀祖代表他参加。开会結果,經濟建設委员会結束,另組川康兴业公司,請中央拨款四千万元,川、康两省拨款壹千万元,另外募股两千万元,凑足七千万元为建設基金,并推张羣为川康兴业公司董事长,由邓錫侯、刘文輝、潘文华三人联名电蔣报告开会議決

各情。蔣复电完全照办，并认为张羣的布置已告成熟，于是电賀耀祖轉商邓、潘、刘，說他不能兼顧省政，拟任命张羣繼任川省主席，希望刘、邓、潘协助张羣。賀耀祖轉达蔣意后，邓錫侯、刘文輝、潘文华、邓汉祥即在方正东街刘文輝家密商，当时提出迎、拒两种办法，結果认为拒絕勢不可能，只好表示贊同。此张羣繼任川省主席之所由来。

蔣介石命张羣图川之主要目的，是借抗战为名，尽量利用川省的人力物力，一面促使张分化刘、邓、潘各部，以期达到逐漸消灭川、康地方实力。在张任省主席的五年多当中，每年征粮九百万担，要拨三成(即二百七十万石)給中央，每年中央又要向四川人民借粮九百万石，共計每年中央在四川拿去的粮食是一千一百七十万石黄谷。強迫征去的壮丁，在张主川期間，約五百万人以上。在人力、物力方面，张羣可謂完全达到蔣的要求。至消灭地方力量一层，雖然沒有完全做到，但潘文华部可以說絕大部分被消灭了，邓、刘两部正規軍，所剩下來的合計不到四师人，邓錫侯最后所掌握的只有一旅人。但邓、刘的政治地位利用张羣掩护，也曾起过一些作用。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国际形势日漸有利于我国，张羣問邓汉祥：“蔣先生要裁撤川康綏靖公署，你看如何位置邓晉康才好。”邓汉祥說：“川康綏署，蔣先生認為是贅瘤，川康的軍人則認為是他們生存的保障，現值抗战緊要关头，中央每月多花一点法币有甚么关系。假使因裁撤川康綏署而使川康軍隊生心，維持两省地方的治安，至少中央要添調五师人来。这不是邓晉康个人的問題，你务必向蔣先生痛陈利害，打消此意。”张說：“这事属于軍政部范围，那你就去同何敬之商量，我同他一道去向蔣先生說。”邓即去找何应欽，請何同张一齐見蔣，并要何坚持保留川康綏署，借以示惠川、康

兩省軍人。何欣然接受，因而川康綏署未被裁撤。

又在抗戰剛要結束的時候，張羣向鄧漢祥說：“請你告訴劉自乾，丟掉軍隊要政治，丟開地方到中央。”鄧問：“到中央去作甚麼？”張說：“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鄧轉達劉后答复張：“軍隊和地盤交出來，自乾很願意。但他說在軍政界任職多年，毫無成就，不特灰心，而且慚愧，他決定回家當老百姓，不願到中央去。”鄧接着又說：“我不過為你設想，你任省主席以來，在實力派方面，只結交了鄧、劉兩個朋友，坐滑竿已經不成形式。再把劉去掉，只剩下鄧一個人，更不成形式。以你同蔣先生的關係，對於自乾都不能保全，誰還肯來走你的路子呢？而且西康乃不毛之地，劉自乾又力量有限，他還能作得起什麼怪嗎？為蔣先生設想，抗戰剛勝利，就下手劉自乾，其他各省，不免人人自危。為你計，為蔣先生計，撤換劉都有影響。”此事經得到打消，張羣在其中確起了相當作用。

## 五、抗戰結束後四川局勢的變化

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南京財、糧兩部召集各省主席財政廳長開財糧會議，鄧漢祥代表張羣出席。鄧由南京會畢回來之前夕，吳鼎昌向鄧說：“蔣先生決定岳軍來作行政院長，請你秘密告訴他準備，他走后，四川主席何人繼任為宜，他應早有安排。”鄧回成都轉告吳意，張羣說：“繼任主席，不外鄧、劉二人。劉恐怕蔣先生通不過，鄧不會有問題，但他是著名的水晶猴子，以後聯繫上不無顧慮。如果決定以他任主席，那就必須你作秘書長。”後來張離四川，關於省府人事，就是照這樣部署的。

一九四八年二月前後，成華大學、四川大學兩次遊行請願，都曾闖進省府，成華大學學生且曾在省府內盤踞數日。成、渝兩地的

特务头子曾扩情、徐中齐、陈介生等全体联名电蒋，謂两次学生游行，捣毁省府，都是共产党策动的，邓锡侯软弱无能，請蒋另选有气魄、有担当的人员来做主席。时蒋介石在庐山，便叫王陵基准备回四川。蒋回南京后，命行政院长张群电約邓锡侯到南京，授意邓辞职，而以王陵基接任川省主席。王遂于四月九日来成都接事，头一天就演成四九惨案①。

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国大会議，选举蒋为总统。蒋仍拟以张群作行政院长，但依法行政院长必須立法院通过，而立法委员中絕大多数是复兴、CC份子，一致反对张群。张見形势不佳，乃避往重庆。邓汉祥于南京国大开会完毕回川，飞抵重庆，适张群、楊森均在飞机场，一同来成都。到后，张向邓說，他在中央处境很困难，打主意仍到四川来布置西南，但必須設法拉攏重庆市长楊森和川主席王陵基。于是张群便約刘文輝、王陵基、楊森

① 一九四八年四月九日，成都四川大学、成华理学院、华西大学等校学生千余人赴国民党四川省政府請愿，要求配給平价米（当时四川省政府供給各大学学生的平价米，仅及需要量的三分之一）。是日，王陵基刚到省府就职，得报后立令成都警备司令严嘯虎派兵沿街戒备，省府内外除調大批軍警布防外，并在大門两旁架設机关枪十余挺，如临大敌。学生游行队伍到达后，推派代表六人入內見王陵基。我是时因代前任省主席邓锡侯办理移交，王接見学生时我亦在場。学生代表还未开口，王陵基就拍桌大罵：“你們今天是来向我道喜的，还是来同我开玩笑的？我告訴你們，我是不容許学生捣乱的。”他一面罵，一面就伸手摸他身上带的手枪。我恐怕出事，就把王陵基推到后面寢室里去，并劝学生回去用书面来交涉。学生代表出去向全体請愿学生传达后，羣情异常忿怒，有一部分学生闖进省府。闖进来的学生进来一个綁一个，共綁了一百多人。同时，在省府大門外面学生也遭到軍警的凶毆，并有一女生被刺刀刺伤。惨案发生后，各校成立“四九血案后援会”，举行罢課，要求严惩凶手，释放被捕同学。至十六日，川省府被迫将被捕学生全部释放。

在中央軍校商談。張說：“抗戰期間，四川對國家在人力物力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貢獻，但地方並沒有得到相當的代價，這就由於我們幾個人，連晉康在內（時鄧在上海）沒有切實聯系所致。今後我們幾個人應徹底合作，切實做到四川人大團結。”於是楊森說：“重慶一市，在政治上關係很少，譬如唱戲，我只能扛旗打傘，夠不上當正腳。”接着王陵基說：“在四川講團結，以張先生同蔣先生的關係，絕對不會有問題。但我們幾個人則不然，蔣先生向來忌諱別人搞小團體，如果要這樣做，那就請張先生同蔣先生商量。”儘管劉文輝當日贊成張羣的說法，但楊、王的表示，無異於唱反調。張會後將此情形告知鄧漢祥，說：“我們有鄧、劉作基本，我想商請蔣先生把重慶綏靖公署改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我到重慶來擔任這個職務，王、楊都在管轄之下，不怕他們不就範。”

後來張羣到重慶接任西南軍政長官，楊森、王陵基對張的一切指示，都採取陽奉陰違的態度，時劉文輝、鄧錫侯、鄧漢祥天天聚議，想利用張羣的關係推倒王陵基，奪取省政，其辦法就是策動川、康、渝的國大代表、立委及省市參議員起來反對王陵基。

一九四九年六月初，熊克武以川康渝國大代表聯誼會主席的身份提議，省主席王陵基舉措乖方，禍川殃民，請由會中推選代表向西南長官公署控訴王陵基，請求轉報中央，立予撤換，並經開會推定黃瑾懷、李蜀華、楊叔明三人代表到渝請願。三人到長官公署時，由副長官錢大鈞接見。三代表歷數王陵基摧殘教育，漠視民意，驕恣顛預；庶政廢弛，貪污淫穢，聲名狼藉，吁請長官公署轉呈中央罷免王陵基，另揀賢員安定川局。錢大鈞當面表示，事體重大，尚須詳加調查。第二次三代表又去見張羣，張答稱：“各位日前所陳各節，已經轉報中央，只有靜候裁決。”當時在重慶的川、康、渝

国大代表、立監委員、省市參議員羅承烈、呂超、冉仲虎等开会欢迎黃、李、楊三人。他們在会中說明來渝的經過，并吁請在座諸人共同发起川康渝国大代表、立監委員、省市參議員聯誼会，会众一致贊同，并决定此会簡称民联会，又商决在渝会众联袂赴蓉开会。隨即发出通知，于六月底以前齐集成都开会。

是时張羣以偽国大代表身份來蓉出席，張羣到成都的当日夜晚，即在鄧錫侯家吃夜飯，座中有熊克武、刘文輝、向传义、王纘緒、鄧汉祥等。鄧錫侯首先說：“諸事齐备，只欠东风，請岳軍兄拿話來說。”熊克武接着发言：“王陵基太不成話了，省主席非換人不可，如果岳軍來兼任，我愿当委員。”鄧錫侯、王纘緒也作同样的表示。張羣說：“这算一个方案；第二个方案，恢复川康綏靖公署，仍請晉康兄任主任，把訓練民众、組織民众，划归綏靖公署办理，縮小省府职权。”鄧錫侯首先說，他絕對不再作綏靖主任，其他諸人也一致反对第二个方案，只贊成第一个方案。次晨張羣約鄧汉祥去，說，反对王陵基，他根据各方的意見，当然可以主張；但撤換王陵基之后，非他兼任不可，他自己怎么好出諸口。鄧說，当然由民意机关派代表去請愿。

在国大、立委、省市參議員开会的那一天，王陵基在会上致詞，大罵这个組織是违背中央意旨，勾結共产党份子，并威吓大家勿以身試法，彼已將崇寧民联組織击潰。因之，更激起会众的憤怒，而会众又时与刘文輝、鄧錫侯、鄧汉祥等暗中接头。于是在会内外运用之結果，卒通过政治自治、經濟自給、武力自卫議案多起，又公推呂超、向传义、胡恭先、楊叔明四人携带省參議會彈劾王陵基案及民联会改革川康政治案、加強民众武力案，飞往广州向代總統李宗仁、行政院长何应欽陈述，請撤換王陵基，以張羣兼任川省主席。呂

超等控訴結果，李宗仁、何應欽都表示此事仍須蔣先生才能作主。時張羣亦到廣州，張密告呂、向、胡、楊四人，說王陵基已經向蔣控訴民聯會是勾結共產黨、反對中央的組織，且說張羣為民聯會所利用，蔣頗為所動，撤換王陵基恐不易做到。於是四代表仍回成都。

局勢演變至此，劉文輝、鄧錫侯、熊克武等認為非另想辦法不可，於是聯袂赴渝會張羣，洽商結果，由軍政長官公署聘請川、康、渝鄧錫侯等三十餘人為委員，組織川康渝民眾自衛委員會，聘熊克武為主任委員，負川康兩省組織民眾、訓練民眾之責任。當時他們估計四川民間可用的槍枝至少有二百萬支，想把这个力量拿上手，作為迎接新局面的準備。劉文輝、鄧錫侯等七月十四日由重慶回蓉向鄧漢祥說，要加緊把自衛委員會早日籌備成立，一面委託鄧漢祥到渝晤張，探詢中央的軍事部署究竟如何，以便應付。

鄧到渝問張羣：“時局日趨嚴重，共產黨終必到四川來，可以斷言。蔣先生對四川作何打算，請你將內容告知，我才好在川康方面努力運用。”張說：“中央決定調一百萬大軍來保衛四川，現正準備給養及防守工事。”鄧說：“準備是一回事，事實上的演變，又是一回事。過去在東三省及河南、淮海各地何嘗沒有準備，但結果都失敗了。萬一四川事出意外，最後的打算如何，不能不未雨綢繆。”張羣說：“中央對重要城鎮，非到萬不得已時決不放棄，放棄時除了有關軍事的建築外，絕不破壞，以便捲土重來，容易恢復元氣。譬如李书城在武漢作地下活動，中央早就知道，其所以沒有下他的手，就是許他存在，到中央撤退時可以減少地方的犧牲。四川到萬不得已時，可以照武漢辦理。但劉、鄧決不能作李书城，這個話也不能使劉、鄧知道。”

邓回成都，将张的谈话密告邓、刘，跟于八月一日在前川康綏署成立川康渝民众自卫委员会，发表宣言，只说保卫川、康的安宁，儼然在国共之間以第三者自居。于是王陵基和特务就拿这个宣言做材料，說該宣言态度曖昧，連“戡乱”的字眼都沒有，向蔣介石攻击自卫委员会。蔣对熊克武本有宿怨，因之，令行政院长閻錫山严令取締自卫委员会。閻致自卫委员会的电說，該会成立于法无据，着即停止。王陵基并通令全省，如有同自卫委员会往来的，立予拿办。自卫委员会遂无疾而終。

## 六、解放前夕蔣、张在四川的最后掙扎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一日，张羣同蔣介石逃到成都，二日午后五点，张到玉沙街刘文輝宅打电话給邓汉祥，約到刘家晤談。一見面，张羣向邓說：“我們現在有四件事要討論：（一）蔣先生应不應該复总統职；（二）拟以东路及川西坝作最后掙扎地，軍事上应如何布署；（三）王陵基非撤換不可，以何人接任相宜；（四）自乾、晉康两部应如何打算。”张羣的主要目的，是在探察刘、邓的态度。当时邓汉祥答复：“蔣先生应不應該复职，要看国际上有沒有必要。至拿川西坝作最后掙扎地，能够使用的軍隊有好多，能征慣战的將領是誰，只有蔣先生才知道，局外人不敢妄參末議。至王陵基的主席今天換不換，也沒有好大关系，所謂船已下滩，为时已晚。关于刘、邓两部的自处，連日也曾經商及。”邓的話至此，刘深恐露出馬脚，便接过去說：“我同晉康，力量本来有限，但絕不畏难，必与共产党拚命到底，这是我們报答国家、报答蔣先生的最后机会。”刘說得非常誠懇，张羣听了很高兴。飯后分手，张說，他明早去会邓后再来詳談。



殊次晨張同鄧錫侯談話中，盡量拿話打動鄧，鄧無意中說出“我們原來組織自衛委員會就是拿來作橋梁的”這樣一句話。張回勵志社打電話約鄧漢祥去，剛坐下，張就問鄧：“鄧、劉同你說話，有沒有保留？”鄧說：“不會有保留。”於是張又說：“剛才鄧晉康說，你們原來組織自衛委員會，就是拿來作橋梁，這個橋梁過到甚么地方去？”憤怒之情，溢於言表。鄧說：“鄧晉康是有名的水晶猴子，他要造反，肯同你說嗎？他明明是一句開玩笑的話。他們是官僚、地主、軍閥，共產黨那條路，他還走得通嗎？”

三日午後七點，張羣又約鄧漢祥到勵志社說：“鄧、劉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同胡宗南同屋辦公，同時作戰。他們的家眷，同熊先生、向育仁和你先到台灣。將來在成都作戰之結果，幸而勝，國家有辦法，個人有辦法。假使失敗，我負責把劉、鄧送到台灣。”鄧當即到玉沙街同劉文輝一道去會鄧錫侯，晤商結果，認為他們的家眷同熊、向及鄧都不能到台灣，只答應他同胡宗南一起作戰，拖時間找機會離開成都。隨後三人又同到玉沙街劉宅把熊克武、向傳義約來，由鄧漢祥轉達張羣所說各情。熊克武堅決表示不到台灣，向傳義聲明願意去，經劉文輝嚴詞責備，向亦表示不去。鄧即設詞回復張羣說：“已約他們幾位當面轉達你的意思，熊堅決表示不去，說他自從在廣州虎門被關閉以後，到現在一直沒有負任何責任，這個時候連居處都不自由，言之淚下。向願意去，但又自言自語地說，平時作議長，四川有事就走了，難免不受人責備。劉自乾說，他的妻子有嗜好，到台灣不方便。鄧說，他只有一个妾，是黃毛丫頭，連牛市口都沒有到過，把他送到台灣，近於開玩笑。至於我到台灣，又要增加你的麻煩，你給我找一張飛機票，我到香港住在我女兒家里，較為省事。”張聆悉，很不自然。

十二月五日午后三点,邓汉祥在刘文辉家里,张羣在电话上向邓说,请约刘文辉马上到励志社有事商量。邓同刘刚进门,张羣指着刘文辉说:“刘自乾,你究竟打甚么主意?”刘说:“我原想同共产党拼了,打不赢就去做喇嘛。现在共产党从玉树方面到西康,要做喇嘛也不行了。”说着又问张:“这几天东路怎么样?”张羣更老羞成怒地说:“你不要问东路西路怎么样,问你怎么样?”于是邓汉祥向张羣说:“这事很简单。蒋先生要邓、刘两部如何作战,下命令就是了。如果周到一点的话,请你约胡宗南、顾祝同和邓、刘商量决定作战计划,再请蒋先生下命令更好。”当时张羣并没有回答邓汉祥,就拿起电话找胡宗南说话。胡的参谋长接电话说,胡因事到绵阳,已由绵阳起飞回来,再有半个钟头就可到成都。于是张羣说,等他和胡宗南约好,再通知开会。刘、邓便辞出。

行至中途,邓向刘说:“聚会地点,以在玉沙街你的家里为妥(因刘文辉家里有两连守卫的兵),如果在别处,万一被扣,毫无办法。”于是邓又回励志社向张说:“自乾的房屋较宽,厨子亦较好,我想叫他准备点便饭菜,今晚就在他家里去会谈如何?”张说:“很好”,说着又拿起电话找胡宗南说话。时胡已回来,约好当夜七时在刘文辉家聚会,谈至十一时始散。

在谈话中,刘文辉故意说:“假使我和晋康原有的力量现尚保存,共产党来了,我们两个人都担得起这个责任。现在力虽不逮,但有一兵一弹,都非拼不可。”胡宗南接着说:“刘先生,你不要灰心,我的四十万军队交给你指挥。”当时彼此勾心斗角,情形甚为紧张。

邓、刘次日即向邓汉祥谈,认为三天之内出不了城,就很危险。七日早张羣飞昆明,九时蒋介石通知刘、邓于当日下午四点到军校

晤面。邓、刘与邓汉祥会商，认为今天非走不可，乃于午后一点潜由崇义桥新繁往彭县起义。张羣八日由昆明回来，曾打电话找邓汉祥，邓亦避未见面。

以上就是从一九三〇年起直至四川解放前夕蒋介石派张羣图川的经过。

## 記 譚 延 闓

陶 菊 隱

前人写譚延闓，大都把他說成是一个“文武兼資、傾向革命”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其实，他虽历任軍职，却不懂軍事，他在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不过是一个投机取巧、善于玩弄阴谋詭計的典型角色。

譚延闓，字組庵，湖南茶陵人，一八七六年生。他的父亲譚鍾麟历任清朝总督、巡撫，曾聘安化宿儒黃凤岐教授他八股文和詩詞歌賦；黃又有武工，因此他也精于騎射之术。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譚进京会試，得中会元，并授翰林院編修，随后回到长沙与龙璋、胡元倬等“办学堂”，就儼然是个热心教育的縉紳之流了。一九〇九年（宣統元年）当选为湖南省諮議局議員并被推为議長，从此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第二年，各省諮議局組織“国会請愿同志会”，要求清政府于一年內成立国会，清政府被迫于九月成立了一个非驢非馬的中央資政院，譚又被推为資政院議員。譚与湖北諮議局議長、資政院議員湯化龙等組織“宪友会”<sup>①</sup>，力爭君主立宪，于是又成为全国的知名人物了。

---

① 資政院議員部分由清政府“勅任”，部分由各省諮議局推选。后者在北京成立了一个旨在促进实施宪政、要求提前召开国会的“宪友会”，并在各省成立“宪友会支部”，这是君主立宪派进行合法斗争的一个政治团体。湖南宪友会支部就是一九一一年譚由北京回湘后組成的。

在維新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初期，湖南人流过不少的血。一八九八年譚嗣同在北京被杀，一九〇〇年唐才常在武汉被杀，特別是一九〇四年和一九〇六年黃兴所领导的两次萍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在当地展开了灭绝人性的血腥镇压，因此加深了湖南人民对专制王朝的仇恨，推进了三湘七泽間的民主革命浪潮。一九一〇年，长沙又因豪紳奸商囤积粮食，引起了災民搶米的巨大風潮。同时，清政府因向帝国主义借款成功，宣布所謂“鐵路国有”政策，这一措施严重損害了地主豪紳的利益，并因此引起了川、湘、鄂、粵等省声势浩大的人民保路救国高潮。以前君主立宪派企图通过和平請愿的方法，提前召开国会，制定一部宪法，把他們的阶级利益和封建王朝的利益結合起来，但是由于清政府采取了拖延、欺騙的政策<sup>①</sup>，最后露出了猙獰的面貌，他們也感觉到此路不通而不能不另求出路了。

### 第一次督湘，陰謀篡夺而来，搖尾乞憐而去

一九一一年，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派員分赴长江流域策动新軍起义。十月十日，武昌革命爆发。十月二十二日，湖南在共进会會員焦达峯的领导下宣布独立。君主立宪派原拟推举譚延闓为湖南都督，但是遭到新軍代表的反对，改推焦达峯、陈作新为正副都督。于是君主立宪派假口“民国成立，应当提倡民治”，于次日成立所謂“湖南参議院”，推举譚为院长，該院参議員絕大多数由諮議局議員兼任，并規定都督命令必須取得該院同意，才能公布执

<sup>①</sup> 清政府又于一九一〇年被迫宣布将預备立宪期由原定的九年縮短为五年，定于宣統五年（一九一三年）召开国会。一九一一年，皇族內閣出現，这显然是“掛羊头卖狗肉”的把戏，“国会請愿同志会”繼續抗爭，受到严旨申斥。

行。十月二十五日，君主立宪派又假口“軍民分治”，在都督之下設立民政、軍政两部，推譚为民政部长，黃鸞鳴为軍政部长。至此，都督的职权就被立宪派篡夺到手了。

由于焦达峯錯誤地认为地主、官僚、豪紳們的意見就是“民意”，而民意是不可违抗的，于是对他们采取了迁就和妥协的态度，这种态度更加助长了反革命分子篡夺全部革命果实的野心。他们誣蔑焦达峯为“会匪”，并且散布謠言，挑拨焦与新軍將領之間的关系。他们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保全秩序，而他们所要保全的却正是维护封建官僚統治的反革命秩序。焦在他们劫持之下，曾經忿而表示辞职或者愿意亲自帶兵援鄂。但是反革命派并不因此而放弃其另一恶毒阴谋。十月三十日，湘軍第五师师长梅馨<sup>①</sup>在君主立宪派的利誘下，制造兵变事件，副都督陈作新乘馬馳往宣慰，被杀于北門外古吊桥关帝庙前。随后变兵蜂拥入城，冲至都督府，又把焦都督杀害了。

湖南独立后，新旧軍合流成立了以余欽翼、赵春霖、曾繼梧、王隆中、梅馨为师长的五个师。梅馨夺帅印的野心由于五个师长互不相下而不能实现，于是諮議局推举譚延闓繼任都督。这个时候，譚既要避免指使杀人的恶名，又要預防革命失敗的危險，他就装腔作势地躲在荷花池私宅不肯出来。经过各方敦促，他才宣称“奉母命出而維持秩序”，似乎他是被迫就职的。

一九一二年国民党成立时，譚加入了国民党，并且窃取了該党湖南支部长的位置。同年十月，湖南革命“伟人”黃兴回到长沙，出

---

① 湖南独立前，仅有新軍一混成协(旅)，所辖为第四十九、第五十两标(团)。第四十九标由王隆中率領援鄂，第五十标留省，梅馨原任第五十标第二营管带(营长)。

席了明德学堂所召开的“欢迎黄先生大会”<sup>①</sup>，当时这位大都督随侍黄兴左右，形影不离。他还建议将新开辟的小西门更名为“黄兴门”以取悦于黄。

谭虽然加入了国民党，但他与君主立宪派始终保持密切的关系。君主立宪派由“共和党”改组为“进步党”，日益成为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的政治工具。谭左手挟黄兴、宋教仁以见重于国民党，右手挟熊希龄、范源濂以通款于袁。他对湖南南北两个邻省的军事领袖——湖北都督黎元洪、广西都督陆荣廷，都极尽拉拢联络之能事。对于湖南的政党政客和下野军人，大多给以名义，以资羁縻<sup>②</sup>。因此，他有“八面玲珑”之称。

谭待人接物非常谦恭，可是内心非常偏窄，对部属的架子更大。秘书长吕苾筹经常在他上马桶的时候，站在一旁回答公事。他是个睚眦必报和喜怒不形于色的“黄老派”，与北洋派元老徐世昌相同。

一九一三年六月，袁世凯企图以北洋派的武力征服全国，先后罢免了属于国民党的江西都督李烈鈞、广东都督胡汉民，并向江西、江苏两省进兵。谭第一次面临到何去何从的难关。一方面，袁是要维持封建旧秩序的，谭的靠山黎元洪和进步党人物又都与袁勾结，他压根儿没有反袁的倾向。但是另一方面，湖南为国民党占有

① 一九〇三年，龙璋捐出西园（地名）地产创办明德、经正两中学，推胡元倬主持校务。同年黄兴由日本回湖南，在经正学堂担任体操教习，借以掩护革命。一九〇四年，黄秘密组织华兴会，运动湘赣边境会党起义失败，逃往日本。谭为明德学堂主办人之一，所以与黄也有历史渊源。

② 当时督、省两署所委顾问、諮议、差遣等职，多至不可胜数。他们外穿纱马褂，内衬布徽章，招摇过市，因此“纱马褂与委任状”成为当时的流行物。

优势的一个省区，在党人們手枪炸弹的威胁下，加以黄兴来电督促，譚又不得不于七月二十五日宣布独立。他事前曾經打密电取得黎元洪的諒解，事后又不出兵援助討袁軍。从七月下旬到八月中旬，黄兴、李烈鈞先后失敗，譚又于八月十三日宣布取消独立。袁要把湖南納入北洋軍的直接控制下，派湯薌銘繼任湖南都督，令譚“入京待罪”。当黎元洪劝他进京并且担保他絕无危險的时候，他預先打好了腹稿，拟定問答题若干条，袁怎样問他，他就怎样回答，一路上默記在心。他到北京先去拜見徐世昌，徐帶他去見袁。他向袁誠惶誠恐地說了“延闔罪該万死”的話，袁就安慰他說：“那也不是你的过失”，还問他“太夫人健康情况如何”，譚才安定下来。他所預备的話竟然一句也沒有搬得出来。不久袁判处譚以四等有期徒刑，通过黎元洪乞情，下令予以特赦。

以上就是譚延闔第一次督湘的全部过程。在这个时期內，除植党营私、投机取巧、四面逢迎而外，譚在湖南沒有干过一件好事，特別是濫发湖南省銀行紙幣二千二百余万元，无法兌現，使湖南人民受到了一次傾家蕩产的損失。

## 二次督湘，狼狽去职，南北战争爆发

后来，袁世凱要做皇帝，湯薌銘在湖南大肆屠杀爱国人士，引起了湖南和全国人民的激烈反抗。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云南軍起义討袁，西南各省紛紛响应，桂軍进入湘南。湯薌銘是进步党首領湯化龙的兄弟，湯化龙又是譚延闔的多年老友。这时譚、湯二人都在上海，通过他們的关系，湯薌銘与国民党軍人派<sup>①</sup>成立了合作协

---

<sup>①</sup> 国民党軍人多属黄兴领导。黄与孙中山分家，所以該派又有“国民党右翼”之称。黄在美国未归，該派人物仍以上海为其活动中心。



定，国民党保証不清算血債，湯接受国民党所介紹的軍人曾繼梧、陳復初、趙恆惕等回湘收編民軍，成立湖南護國軍，湯薌銘于一九一六年五月二十九日通電宣布獨立。於是湖南成立了以曾繼梧為軍長的第一軍，下轄陳復初、趙恆惕兩師。湘西一部民軍開進省城後，又成立了以陶忠洵為師長的第三師。湯薌銘終於不為湖南人民所寬恕而被逐走（七月四日），曾繼梧、劉人熙二人先後代理湖南都督。

當時湖南都督的正式人選，國民黨軍人派屬意黃興，進步黨湘籍人士熊希齡等則主張由蔡鍔調任，但是黃、蔡兩人均無意于此<sup>①</sup>。黃興荐譚延闓自代，譚正是進步黨多年來志同道合的老搭檔，因此兩派意見很快取得一致。此時袁世凱已死，北方組織責任內閣的段祺瑞不但繼承了北洋派領袖的地位，而且繼承了袁的武力統一政策，準備派他的內弟吳光新為湖南督軍<sup>②</sup>。但因湖南人民堅決反對，而帶兵入湘的桂系首領陸榮廷也不允許北洋軍重占湖南，段才被迫任命譚延闓為湖南省長兼署督軍（八月三日）。

這是段的緩兵之計，他給譚的本职是省長，兼署一職隨時可以取消，而北洋軍留駐岳州，隨時可以開進長沙。段在文電上總是稱譚為省長而不稱為督軍，似乎湖南督軍一職尚在虛懸。譚却不許部屬，稱他為省長，因此湖南內部和段內閣恰恰相反，叫的都是“譚督軍”，沒有叫“省長”的。

譚回到湖南後（八月二十日），一面竭力奉行段內閣的裁兵方

---

① 蔡鍔于護國之役後被北京政府任為四川督軍，時因患有嚴重喉結核，急需赴日治療，而他的老師梁啟超也希望他留在川滇一帶建立進步黨的軍事根據地，不願他調往湖南。黃興患有肝病，不願回湘任職。不久黃、蔡二人均病死。

② 段內閣將各省都督名義改稱為督軍。

案，以見好于段，一面却又利用这个方案来打击异己势力。討袁战争时期，程潛向唐繼堯借来滇軍一营，取道貴州入湘，沿途民軍紛紛旧附，程遂自称“湖南护国軍总司令”。程部到省后与第三师一度发生冲突，一、二两师也不愿居程之下，程乃縮編所部为第四师。第三、第四两师分駐南、北門，彼此經常寻衅互鬭，譚即引为借口，宣布裁去三、四两师，把程潛逐出政治舞台<sup>①</sup>。譚又背后語人：“坤載（陈复初字）生就一对三角眼，脑后有反骨，此人終不可靠！”因此湘軍改編时将一、二两师次序顛倒过来，以赵恆惕为第一师师长，陈复初为第二师师长。譚已預知北京陸軍部內定的全国裁兵方案，全国共留正規軍五十师，湖南仅留正規軍一个师、一个独立旅。湘軍改編后北京政府仍然冠以“暫編”字样，准备进行第二次整編，届时第二师将縮編为一个旅。譚要这套手段并不是沒有原因的，赵恆惕自从由桂軍旅长留駐湖南以来<sup>②</sup>，对譚頗为恭順，譚对赵、陈两人早已爱憎分明。

段的第二步裁兵計劃，准备繼續裁減各省的“暫編师”，而北洋軍不在其列。在办理第一次裁兵的过程中，段还采取分化政策，以加深西南各省軍人的内部矛盾。段的內亲、陸軍部次长傅良佐为

---

① 湘軍四师裁併为两师，以第三师併入第一师，第四师併入第二师。編併后第一师所轄为陈嘉祐（原第一师）、朱泽黃（原第三师）两旅，第二师所轄为李右文（原第二师）、林修梅（原第四师）两旅。編余部队及地方民軍分別編为六个守备区，以吳剑学、周伟、謝国光、卿衡、周則范、李仲麟分任第一至第六守备区司令。这是一个“換湯不換药”的裁兵办法，正規軍減少了，地方軍却大大增加了。

② 赵恆惕毕业日本士官学校后，在广西主办兵弁学校，一九一二年十一月編为桂軍旅长，随同广西副都督王芝祥取道湖南援鄂。南北和議告成，譚延闓留赵在湘办理裁兵。国民党反袁运动失敗后，赵也被袁政府判处三等有期徒刑，經云南都督蔡鍔說項，得到特赦。

湘西乾城县人，陈复初为湘西桃源县人。傅利用乡土观念与陈密通往来，将中央预定的第二次裁兵计划和谭延闿颠倒湘军次序的用意向陈道破，陈遂亲北方而怨谭了。

谭也有一套保全地位的打算。他恃总统黎元洪为奥援，段屡次要调他为内务总长，黎都不肯同意；又与桂系首领陆荣廷订立湘桂攻守同盟，这也是段不敢轻易下手的原因。而更重要的是，谭利用湖南人民反对北洋军阀的心理，提倡“湘人治湘”，反对北军侵入。湖南省议会经常发出“湘南自治”的呼声。谭党政客经常大肆宣传：“湖南无畏公（谭）则秩序难于保全，畏公与湖南人民的命运是联在一起的”。的确，上次谭被袁政府解除职务，继之而来的便是杀人如麻的“汤屠户”和烧杀淫掳、无所不至的北洋军。湖南人民受到迷惑，觉得谭虽然一无是处，究竟比北洋军好些。

早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谭母在上海病逝<sup>①</sup>，段内阁只等谭的“丁忧”电一到，即予开缺，以吴光新递补湖南督军。由于熊希龄、范源濂从中斡旋，黎元洪不肯同意，这个计划没有实现。段始终觉得北洋军占领湖南是征服西南不可缺少的首要步骤，一九一七年一月四日，又派湖南变节军人梅馨（即杀害焦达峯者）为长宝镇守使，在湖南内部添上一道内线。此后，由于黎、段争权交恶，引起了督军倡乱、国会非法解散和张勋复辟一系列的大动乱，段才没有余力顾及湖南。

张勋宣布复辟的一天（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谭在伪旨中被授为湖南巡抚。一位新闻记者问谭有何表示，谭连呼“滑稽，滑稽”。

---

<sup>①</sup> 谭母是谭钟麟的婢女，收房后仍然不许共桌而食，谭终身引以为耻。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六日谭母病逝后，谭迎柩回湘，十二月五日在长沙城内大出丧，谭披麻戴孝，步行柩前，为亡母增光。

其实，这不是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这位记者疑心譚因不明风向，所以不敢过早地表示态度。直至七月三日各省紛紛討逆，譚才有通电发表。他派第二师长陈复初出兵討逆，目的在于乘机收回岳州。不料段因討逆軍事已有把握，命吳光新迅速回师岳州，譚就不敢动了。

复辟事变结束后，馮国璋代黎元洪为北方总统，段内閣进一步勾結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大胆地执行其以北洋派为中心的武力統一政策。一九一七年八月六日，下令改派傅良佐为湖南督軍，而将候补湖南督軍多年的吳光新調往四川。段的用意十分明显，既然湖南人民坚决主张“湘人治湘”，他便将計就計，派一个湖南人来接任湖南督軍，湖南人民应当无話可說了。他还授意傅良佐宣布“湘人治湘、軍民分治、不带兵入湘”的三个方針，以和緩湖南人民的斗争。可是湖南人民知道这位新督軍是段的內弟，現任陸軍部次长，又是段手下的“四大金剛”之一。这位湖南人說的是一口北方話，做的是北方的官，所謂不带兵入湘，正象扮着外婆的老狼精所說的甜言蜜語一样；以前湯薌銘声称不带兵入湘，楊善德声称不带兵入浙，后来几时兌过現来。因此，这一措施使湖南人民与北洋軍閥統治集团之間的矛盾轉趋激化。

湖南問題不止是一省的問題，而是西南問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十分明显，北軍侵入湖南后，下一步驟就是进兵两广，征服滇黔。这时西南各省軍閥因督軍团倡乱而宣布的“自主”（独立的变称）并未取消，他們对北方采取了反段而不反馮的态度。湖南易督令下，他們人人自危，因此又加深了北洋軍閥武力統一与西南軍閥地方割据之間的矛盾。

易督令下，譚一面求救于同盟者陸榮廷，一面請熊希齡設法挽

回这个局势。陆叫他准备抵抗，答应与云南軍閥唐繼堯联合出兵援助。陆打电报請馮国璋收回这道命令，馮叫段直接回答。于是段以国务院名义回答說，譚延闓文人不能治兵；新任督軍傅良佐也是湖南人，并无悖于湘人治湘的精神（八月十四日）。熊希齡在北京运动“督、长不同城，督軍傅良佐駐岳州，省长譚延闓仍駐长沙不动”，段也不肯答应。至此，湖南問題已非口舌之爭所能济事的了。

于是譚召集軍事會議来布置作战計劃。这个时候，湘軍第一师长赵恆惕因“丁父艰”已回衡山原籍，由第一旅长李右文代理师长职务；第二师长陈复初态度冷淡，而李右文、朱泽黄又都被北方收买，认为北軍朝发夕至，长沙无险可守，言下大有反对用兵之意。譚看見情形不妙，便急忙見风使舵地改抵抗为欢迎，派零陵鎮守使望云亭到北京迎接新督軍，命刘建藩代理零陵鎮守使；調第一师第二旅林修梅部移駐湘南，第二师第三旅陈嘉祐部移駐湘西，以示絕无抵抗北方之意。陈复初等都暗笑这个书獃子毕竟經不起一吓，这一吓就使他不得不打退堂鼓了。他們那里晓得，这是譚的临机应变的手腕，他已接到陆榮廷的电报，叫他趁北軍措手不及的时候进取岳州，如果岳州不能取，則长沙也不能守，可以保全实力，退守湘南。望云亭是一貫与北京政府通声气的外省軍人，所以用調虎离山之計把他調走，而刘建藩、林修梅、陈嘉祐等則都是主张与北洋軍决一雌雄的<sup>①</sup>。

---

① 刘建藩原任湖南营产清理处长，也是馮國璋对袁独立时上海方面介紹回湘的国民党軍人。林修梅为程潛旧属。陈嘉祐的父亲陈树藩（当时有两个陈树藩，这个是湖南湘阴人，另外一个虽是陕西人，但原籍是湖南宁乡人）久任財政厅长，比較与譚接近。

會議后，譚即電京表示遵令交卸督軍，一面大舉變賣營產，提收稅款，以補軍費之不足。同時，還大放起身炮，對各機關職員一律加發薪金一月，對接近自己的官場中人則各給以安家費，囑其隨軍撤退。當時三湘七澤間瀰漫着一種山雨欲來的戰時氣氛，認為南北大戰即將爆發，“譚畏公”還得捲土重來。因此，湖南政界俄然騰起了一片“與畏公同進退”的聲音。

譚不願與繼任者見面，於九月一日回茶陵原籍“省親”。臨走時他說過這樣的一句話：“我做慣了婆婆，做不了媳婦。”他在茶陵向北京政府電辭省長，隨即化裝離湘赴滬。他的第二次督湘時期，至此終結。

九月九日，傅良佐率領北洋軍衛隊營一營到省，十三日下令改派鄒序彬為第二旅長，陳蓮章為零陵鎮守使。十八日，劉建藩在永州、林修梅在衡州宣布自主。傅命李右文率領湘軍第一旅前往衡山“招撫”第二旅，不料趙恆惕“墨經從戎”，反把第一旅“招撫”過去，十月一日李右文單騎逃回長沙。這時北洋軍第八師王汝賢、第二十師范國璋兩部已經源源入湘，傅改派王、范二人為湘南軍正副總司令，一度攻下衡山、寶慶。十一月十四日王、范二人突然通電主張停戰撤兵，湘軍乘機反攻，傅良佐偕同新任省長周肇祥倉皇逃走，湘桂軍即於次日占領長沙<sup>①</sup>。

湘軍驅傅之戰，除第一師參加外，程潛於十月由粵入湘，在湘南一帶招收民軍，自稱湖南護國軍總司令，也投入了戰鬥。戰事發

---

① 此時北洋派分化為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和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直系勾結南方桂系倒段，王、范突然宣布停戰是直皖鬥爭中的一段插曲。為了壓縮本文篇幅，除直接與譚有關的資料而外，其他與湘局有關的資料，只能略而不詳。

生前，桂系是主張恢復湖南易督前的原狀的，長沙既下，理應歡迎他們的同盟者譚延闓回湘復職。但是桂系企圖占領湖南地盤，陸榮廷的內弟譚浩明竟以湘粵桂聯軍總司令名義“兼理湖南軍民兩政”，既不歡迎譚延闓回湘，又不許程潛兼任湖南省長。湘桂軍攻下岳州後，桂系幻想北方直皖兩系互相火併，本身坐享其成，因此按兵不動。但是，在直皖鬥爭的風雲演變中，皖系仍然占居上風而擬大舉反攻湖南。同時，桂系與孫中山在廣東的鬥爭日益尖銳，桂系感覺到湖南是一座介乎南北之間的火山，而廣東重於湖南，因此便有放棄湖南之意。根據當時的情況，阻止皖系進兵，恢復湖南易督前的原狀，利用湖南為南北雙方的軍事緩沖地帶，對直桂兩系都是有利的。於是屬於直系湖北督軍王占元建議仍以譚延闓為湖南省長兼署督軍，十二月七日馮國璋據以下令發表。譚由上海到南京與另一直系、江蘇督軍李純接洽（一九一八年三月三日），建議北軍停止反攻，桂軍退出湖南，紿湖南人實現“地方自治”，以保持南北和平。這個方案是研究系的頭目之一熊希齡傳授給他的。但是時間已經來不及，三月十日北軍攻占岳州，南北戰爭再度爆發，譚十分掃興地仍回上海去了。

### 三次督湘，“自治”其名，自亂其實，

#### 被部下驅逐下台

由於桂系保全實力，不戰而退，給了北洋軍第三師師長吳佩孚“一舉成名”的機會，於四月二十四日占領衡州。但是，段內閣任命皖系健將、第七師長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引起了吳的不滿，同時，吳的上司、直隸督軍曹錕也與皖系的“小扇子軍師”徐樹錚發生齟齬，

曹錕豎髮乎有代馮國璋而為直系新領袖的一種趨勢<sup>①</sup>。另一方面，桂軍大部分已退回兩廣，僅留“武衛軍”馬濟部與湘軍趙恆惕部同駐永興，程潛的總部設在郴州。程與孫中山的關係比較密切，桂系視為眼中之釘。譚延闓已於四月十二日由上海到了廣州，十九日再到武鳴與陸榮廷相見。通過譚的建議，陸、譚兩人會派張其鏗<sup>②</sup>到衡州與吳佩孚接洽。吳正需要有一個能夠與南方通聲氣的人物，六月十五日湘直軍成立了停戰協定，吳與桂系建立了新的同盟關係。七月，譚在桂系的支持下，到永州重任湖南督軍。

桂系當前的問題是，必須去掉程潛，換上譚延闓，才能把湘南控制在他們的手里。一九一九年六月，有一個從北京到衡陽的湖南人陸鴻逵，自稱為程潛的老朋友，要求吳佩孚派人護送他到郴州。吳打電報叫程潛派人來迎接。九日，程所派人員與陸經過馬田墟時，當地駐軍馬濟部在陸的行囊中搜出北方政客曾毓雋、薛大可寫給程潛的函件，當即予以扣留。程電請釋放，馬濟答以“此案與粵有關，與湘無涉，尚待查明辦理”，隨即以敵探罪名將陸槍決。事件發生後，湘軍將領以“程潛通敵有據”，通電與之脫離關係。二十九日，程棄職出走，於是譚延闓成了湘南湘軍的唯一統帥。原來這是一個騙局，變戲法的魔法家有吳佩孚、陸榮廷、譚延闓等。這個騙局同時也反映了北洋派分化西南和桂系與國民黨的鬥爭。

① 曹錕本為直系，因有擴張實力的野心，受到段祺瑞的誘惑，倒向皖系成為主戰派的一個大頭目。曹部攻湘勝利後，徐樹錚推他向外發展，企圖奪取其直隸地盤，於是曹、吳又重整直系旗鼓而與皖系為敵。

② 張其鏗字子午，早年與譚同中進士，隨後在湖南任南武軍統領，民國成立後譚又任為湖南軍事廳廳長。他雖是廣西人，但與湖南人的關係頗深。他長於詩詞和星相之術。譚知道吳佩孚出身秀才，又在北京崇文門外擺過拆字攤，性喜做詩算命，所以派這樣一個人去聯繫他。果然吳、張二人一見如故，結拜為異姓兄弟。後來張做過吳的秘書長。



但是，譚在南北兩軍作戰的時候，自己安居上海，這次捲來，不免內愧于心。當時的趙恆惕是湘軍師長，林支宇是湘南民政處長。為了騙取趙、林二人的擁護，譚一再表示此行為與士卒共甘苦而來，將來打完了仗，軍事交趙負責，民事交林負責，本人決不貪圖權位。譚又派林修梅為湘軍駐粵代表，把這個接近程潛的起義將領誑騙下台。

一九一九年，由於皖系當權派對外加強親日賣國活動，對內加強鎮壓愛國人民，爆發了歷史上開一新紀元的五四運動。同時，在東西方帝國主義競爭白熱化的背景下，北方直皖兩系的鬥爭也已走到了必須訴之武力的一个新階段。一九二〇年五月，吳師撤防北歸，湘軍乘機發動，從五月二十六日起到六月十一日止，僅僅在半個月的時間內，湘軍三千支“吹火筒”打垮了号称七萬雄師的張敬堯<sup>①</sup>。在驅張戰爭中，湖南武裝農民配合作戰，起了極其巨大的作用。桂系因為有事於廣東，並未參加作戰，不過遙為聲援而已。

張敬堯逃走后，譚延闓於六月十七日到長沙，在又一村講武堂（總部所在地）招待湖南各界人士。我參加了這個招待會。我當時的感覺是，此公別來無恙，但是面貌更加黧黑，似乎一路上飽受風霜之苦。當時我頗為他的雄辯口才和動人姿態所感動。他洎隨聲下地說：“諸位來歡迎我，歡迎兩個字我不敢當。我此行是為與士卒共甘苦而來，是為向三千萬湖南父老兄弟諸姑姊妹贖罪而來。如果說有功的話”，他向站在身旁的趙恆惕瞥了一眼，接下去說，“那

---

① 湘軍實力只有舊步槍三千支左右，而且缺乏子彈，湖南人民稱之為“吹火筒”，並且稱湘軍為“叫化軍”。張敬堯除共轄第七師、暫編第一第二兩師及第一混成旅外，還指揮魯軍、安武軍等等，号称七萬餘人。

是赵总指挥躬冒矢石之功，諸将士奋勇杀敌之功。”

赵恆惕是当时的湘軍总指挥，与譚的地位相去只有“一間”。驅张成功后，譚仍然抓住督軍、省长、总司令三顆印死不放手，并不实践其“軍事交赵、民事交林”的諾言。同一时期，譚派政客以及以前随軍撤退的从龙之士，一个个都爬上了政治舞台，其中著名人物有督署秘书长呂苾箴、政务厅长刘岳峙、樞运局长唐支厦、矿务局总理萧仲邨等。人們对这些“新貴”加上了“馬头、馬尾、馬身、馬毛、馬蹄、馬腎”等不甚雅观的綽号<sup>①</sup>。譚的“江山”是軍人替他打出来的(?)，現在羣馬得志，而以赵为首的各級軍官也都各有其从龙之士，因此引起了譚与軍人之間权利分配的矛盾。譚虽然实现了三次督湘的愿望，但是今非昔比，識者早知其“禍不在萧牆之外，而在萧牆之内”了。

这时，北方皖系已被直系打败，桂系在广东的統治地位也有遙遙欲墜之势。譚鉴于南北两政府都已軟弱无力，便于八月二十二日发表“禡电”，主张各省制定省宪，废除督軍，民选省长，将来采取联邦制把全国統一起来。这个“禡电”被称为联省自治运动的嚆矢。电报发出后，省外湘籍研究系人士熊希齡、范源濂等都大声喝起彩来，熊还寄来“湖南省自治法大綱”一稿交譚参考。譚发表这个“政見”，具有双重目的：对外用以阻南拒北，保持地方割据；对内以文人而为一省的軍民两政首长，可以防止軍人野心家夺取他的政权。但是，在軍人們看起来，这个“政見”不过是紙上空談，譚想利用它恋栈不去，是办不到的。

湘軍驅张后实力大为增加，除第一师轄有朱鶴庚、廖家栋、魯滌

<sup>①</sup> 吳佩孚駐軍衡阳时，譚在衡阳馬嘶巷租有房屋一所，供联系人員居住，因此譚派政客有“馬嘶团”之称。

平三旅外,还有雄踞各县的十二个区司令<sup>①</sup>。湘軍将领大体上分为譚、赵、程三派及无所属的一部分。譚所拉攏的是上层軍官,赵的門生旧部大多分布在中层,程潛的潛势力也仍存在。这些軍人各籍一方,直接委派官吏,就地扣留軍餉,省政府无权过問。他們浮报兵額,侵吞軍餉,但是士兵們欠餉很多,仍然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由于軍心非常离散,軍官派系紛歧,局外人早已看出湖南内部充滿着“自乱”的危机而談不上什么自治了。

十月上旬,被譚騙走的程派軍人林修梅忽然出現于湘西,自称爲湘西建国軍总司令<sup>②</sup>,譚当然不能容忍湖南境内突起这样一支“异軍”,但是湘軍諸将因为林是湘南起义的名将,不愿助譚攻林。譚只得派遣自己可以調动的第一旅长朱鶴庚率部前往“討伐”,于十一月上旬将林赶走了。

紧接湘西风云之后,十一月十三日平江又告兵变,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熾为变兵所杀。該区前身为江道(江华、道县)地方部队,司令刘梦龙(程派)被譚撤換,改派督署副官长萧昌熾接統。变兵以鬧餉为由,拥入司令部,将萧牽至玉带桥予以杀害。事变发生后,譚大为震怒,派駐醴陵的第六区司令李仲麟(程派)就近“督勸”,李忽与变兵所推举的代理第十二区司令于应祥(原任营长)发出“清

---

① 第一区司令吳剑学駐宝庆,第二区司令张輝瓚駐湘乡,第三区司令謝国光駐衡阳,第四区司令罗先闓駐零陵,第五区司令刘叙彝駐洪江,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駐醴陵,第七区司令陈嘉祐駐郴县,第八区司令蔡鉅猷駐沅陵,第九区司令田鎮藩駐芷江,第十区司令李鑑珩駐澧县,第十一区司令林支宇駐常德,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熾駐平江。

② 建国軍是孙中山所用的旗帜,当时譚延闓派卿衡为常澧鎮守使,带兵进入澧州,捕杀鎮守使王正雅。王子育宣起兵为父报仇,推林修梅为主将,以資号召。

君侧”的联名通电，指摘譚所引用的官僚政客都是一些宵小败类，要求改造湘局。赵恆惕在事变中保持“不声不响”的态度。此时譚不但无可調之兵，而且平江、醴陵与长沙相距只有一天的路程，长沙形势非常危急。十八日，譚授意省議會議決裁撤督軍一职，本人专任省长，并将湘軍总司令一职託予赵。这与以前譚所託的本人只愿当婆婆而不愿当媳妇的话不相符合。一般人认为，此时譚只有交出軍权来，才能交換赵拔刀相助，当婆婆当不下去的时候，当媳妇总比被逐出門的好。但是事实并非如此。譚暗中电調宋鶴庚旅兼程回省，并密召第二区司令张輝瓚、第三区司令謝国光迅速帶兵前来。张輝瓚就近先到一步，但因兵力单薄，不能有所作为。譚是用緩兵之計爭取時間来等待救兵的。而且，譚已預定在两个月內完成制宪，随即举行省长民选，总司令一职不久也将废除。这些情况，赵知道得十分清楚，所以他仍然“不声不响”，对总司令一职坚决表示不就。

接着，“兵諫”的呼声越唱越高，第三旅第五团团长张振武（程派）也加入了。据说林修梅在湘西出面乃是“声东击西”之計，把宋旅吸引到湘西去，然后由程派軍人在湘东发动倒譚。李仲麟是平江兵变的主謀者和指揮者。

二十三日，譚召集軍政人員和各界人士举行联席會議，还想有人自告奋勇出兵平“乱”，或者有人出面来挽留他专任省长，但是赵恆惕还是“不声不响”，大家也都鴉雀无声。哑剧演了半晌，魯滌平才站起身來說：“畏公是全国伟人，不止是一省的伟人。今天的会，我們一方面欢送旧总司令，一方面欢迎新总司令。”此时大家的眼光不約而同地都投射在这位大胖子的脸上，我当时觉得此公口才之佳，不在畏公之下。譚听了这几句話，不禁失声而哭。接着，赵也

站起来抽抽噎噎地说：“于应祥以下犯上，戕杀长官，此风万不可长！”随后会场又沉寂了一些时，谭才表示连省长也不愿干了，他将以公民资格留在湖南，任内如有手续不清，可以秉公查办。至此会议便在相对而哭的愁惨气氛中草草散场。

二十四日，谭由总部迁回荷花池私宅。二十五日，省议会推举林支宇为临时省长。赵恒惕在各方“敦促”下接任湘军总司令。湘东变兵认为谭留湘不走仍然是缓兵之计，扬言开入长沙为畏公送行，谭才被迫于二十七晚悄然离湘赴沪。他的第三次督湘，就以五个多月的短暂时期结束了。

谭到上海后，自己解释留湘并非恋栈，他的夫人方氏因难产死于上海，正在迎柩归葬。他所乘轮船于二十八日在城陵矶与运柩轮相遇，因此他写了一首感怀诗，有“相逢不相见，存没两难安”之句。其实，根据当时情况，谭、赵、程三派军人更番轮演“逼宫”、“鸿门宴”等恶剧，谭之不走也确实是一个缓兵之计。谭走后，十二月六日长沙又发生了闹餉驱赵的一幕，十二月二十四日又出现了在谭派军人张辉瓒的阴谋主持下，以召开军政会议为名，诱杀程派军政人员李仲麟等八人的大惨剧。

#### 第四次捲土重来，胜固欣然，败亦可喜

谭所倡导的“自治”，对赵的新统治者地位也是有利的，所以谭走后，赵宣布“继承谭前督遗规”，延聘省内外“名流学者”起草省宪法，然后提交全省人民总投票表决。当然，湖南所谓自治只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把戏，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曾在这个时期领导湖南工人和青年学生反对地方军阀的假自治，并且展开了力争人民自治的斗争。

一九二一年春天，湖北人蔣作賓、李书城、孔庚等先后入湘，游說趙恆惕“援鄂自治”，起兵驅逐湖北督軍王占元。此時湘軍已擴充至兩師十個獨立旅之多<sup>①</sup>，軍餉異常困難；譚、趙兩派互相水火，政潮起伏不定；為了醫治內部創傷，緩和內部矛盾，湘軍諸將認為有“向外發展”的必要；而王占元在北方軍閥中是虛有其表的一個，湘軍估計可在一星期之內攻下武漢。於是七月二十八日，湘軍“援鄂”發動了。當時湖南軍閥擬俟攻下武漢後，召集聯省會議，組織聯治政府，推舉黎元洪、譚延闓為正、副總統<sup>②</sup>。湘軍發動後，果然在一星期之內打垮了王占元，前鋒直薄武昌。不料吳佩孚乘此時機進兵湖北，取王而代，北京政府即任吳為兩湖巡閱使，並任吳的部下蕭耀南為湖北督軍。吳一面用緩兵之計表示愿與湘軍停戰議和，一面派軍艦載兵暗襲岳州，於是湘軍轉勝為敗，被迫為城下之盟，而岳州也落入北軍手中。

由於對外發展失敗，湖南內部矛盾轉趨激化，譚派政客利用省議會為合法鬥爭的障地，迫使趙政府大舉裁兵，企圖以此加強趙與各軍將領之間的利害衝突，從而達到倒趙的目的。趙制定了裁兵方案，擬裁去兵額之一半，並先裁趙鉞、張輝瓚兩旅以為之倡。

① 譚走后，趙對諸將見人升一級，因此湘軍驟然增加為兩師十旅。計有：第一師長宋鶴庚（原第一師第一旅長），所轄第一旅長賀耀祖，第三旅長唐生智；第二師長魯滌平（原第一師第三旅長），所轄第二旅長劉劍，第四旅長鄒序彬；第一混成旅長叶开鑫，第二步兵旅長趙鉞，第三混成旅長謝國光（兼衡陽鎮守使），第四混成旅長張輝瓚，第五混成旅長吳劍學（兼寶慶鎮守使），第六混成旅長陳嘉祐，第七混成旅長羅先閩，第八步兵旅長李勰珩，第九步兵旅長劉敘彝，第十步兵旅長田鎮藩（九、十兩旅均歸沅陵鎮守使蔡鉅猷節制）。

② 同時另有一部分人主張推吳佩孚、趙恆惕為正、副總統而將湘事交譚。這些都是擬議之詞，並未作出決定。

果然各师旅长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手段，紛紛提出辞职。同时，长沙城内出现了“迎譚倒赵”的传单。

譚延闓除在湖南内部鼓动风潮外，还有力争外援的必要。此时吳佩孚利用赵为其工具，对譚已同秋扇之捐，于是譚通过湘籍国会议员周震麟的介绍，投奔到孙中山的旗帜下。照理，譚一贯站在孙中山的对立面，孙、譚二人结合是令人不能理解的。但是，孙是一个“不念旧恶”和“来者不拒”的人，而譚除此以外无路可走，因此一拍即合。周震麟不仅拉攏譚，同时还想拉攏赵参加北伐，他随即以湖南劳军使名义进入湖南。譚也派张翼鹏入湘，劝赵动员北伐。譚自下台居沪以来，赵每年餽以生活费二万元，函电仍称“畏公鈞鉴”。其实，譚经常骂赵为“叛将”，赵也时刻提防譚的“复辟”野心。譚并不服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且深知赵不会接受北伐的任务。他不过是利用孙中山的招牌为自己找出路，同时还有“借刀杀人”的另一用心。但赵也不愧为譚的“好学生”，除派李汉丞入粤婉劝孙中山改道江西北伐外<sup>①</sup>，又于一九二二年元旦提前公布省宪法，以阻止北伐军假道湖南。

同年五月，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改道江西北伐。譚向孙夸口，湘军謝国光、吳剑学、陈嘉祐三旅都可以接受他的调度，因此孙电令謝等出兵侧击赣东，而譚也就准备回湘夺取政权。不料直系很

---

① 李汉丞字吟秋，湖南衡山人，以国会议员留在湖南担任高等审判厅长。他与赵为同乡而兼有师生之谊，主张赵向孙中山靠拢。李向孙中山转达赵的言词说：“湖南实施自治，阻止北方用兵南方，仍然不失为西南各省的屏障。湘军如果北伐，北军朝发夕至，对湘对粤，两俱不利。粤军改道江西北伐，北军在江西的力量比较薄弱，可以一鼓而下，届时湘粤两军共趋武汉，力量就雄厚得多了。”李回湘后向我谈及这段经过，据说孙中山颇为所动。

快地战胜了奉系，并迎接黎元洪入京为傀儡总统。黎要拉拢西南各省，促成全国“统一”，任命谭为新内阁的内务总长。谭却不愿接受这个有名无实的职务。他在拒不受命的回电中振振有词地说：“延闖从西南义师之后，不能悖护法政府之主张，为湖南人民之一，当服从联省自治之主义。”其实，孙中山的护法政府就是坚决反对所谓联省自治主义的。谭之所以自相矛盾，因为他一面站在护法政府的旗帜下，以便有所依归，一面却又幻想留在联省自治的旗帜下，与赵竞选湖南省长。

北伐军深入赣南后，陈炯明军忽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被迫赴沪。这个时候，谭又与章太炎等建议召开联省会议，解决国是，可见谭之投孙并非真心真意，而且在政治上仍是孙的反对派。从八月到九月湖南举行所谓民选省长，谭、赵两人互相竞选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在赵的优势军力下，谭终于失败落选。至此谭才绝口不再谈联省自治主义了。

一九二三年一月，陈炯明被滇桂军逐走，谭随孙中山于二月二十一日由上海抵广州。孙改称大元帅后，任谭为内政部长。谭又派吕苾筹、岳森等回湘劝赵出兵讨伐陈炯明，这又是一种明知其不可能而使孙赵关系更加恶化的手腕。有一天，一位湘籍国民党健将，口称有机密大事，要求与孙中山单独谈话。谭与胡汉民均退入后室。那位健将向孙力言谭之不可靠，足足谈了一小时之久，孙未置可否。谭、胡两人在后室听得非常清楚，谭却始终面不改色。后来胡举以告人，非常钦佩他“休休有容”。当其时，孙中山躬冒矢石，在石龙、石滩战场上与倾巢反攻的陈家军作拉锯战，而谭跼步不离。孙看见了这位名闻全国的湖南伟人，过去曾经是他的敌人——君主立宪派和联省自治派，而此时同甘共苦，比追随自己多年的胡



汉民、汪精卫之流有过之而无不及，不禁大为称许。譚逐步赢得了孙的信任，对于湖南问题就有更高的发言权。他除派陈嘉祐赴湘西活动，并推荐蔡鉅猷为湘西第一军长，令其由辰州、溆浦进兵安化、益阳外，又于六月一日直接致电赵恆惕及宋、魯、謝、吳諸將，指責赵勾引吳佩孚，将进兵湘西，消灭异己；深望打消此举；否則“弔民伐罪，海内岂无健者”。赵极口否认有勾引外援情事，并在回电中影射譚对湘事有挑拨离间之嫌。至此，譚、赵关系露骨破裂。

当时湘軍内部号称为譚派的宋、謝、吳三将领都是湘乡人，因此又有“湘乡系”之称。其实，这三个人的倾向也不是一致的，宋鶴庚所部賀耀祖、唐生智两旅长都属于赵派，他不过是一个“光杆师长”；謝国光的实力在三人中最雄厚，他在情感上虽然与譚比较接近<sup>①</sup>，却存有持盈保泰的一种心理；吳剑学则倾向于倒赵拥譚，这是因为他的实力最薄弱，时刻提防被裁汰，希望鼓动风潮来保全地位。在譚、赵斗争中首先出场的蔡鉅猷，并非譚派，他的防地洪江为贵州鴉片出口的孔道，所收过境税很多，湖南财源非常枯竭，赵企图派兵到湘西夺取这笔税收，加以蔡吸收了陈嘉祐的败兵，这就是湘西问题密云欲雨的原因。

六月九日，宋、魯、謝、吳四人举行湘乡会议，讨论湘西问题。魯滌平在譚、赵斗争中属于中立派，颇有居间操纵之意。湘乡会议决定电譚劝其“在粵謀正当之发展，切勿回湘”，同时劝赵勿下令罢免蔡鉅猷。后者显然具有“集体自卫”的动机。

宋、魯回到长沙后，六月二十五日因为要求拨领军餉未遂，突然逮捕矿务局协理胡瑛，送交省长严办。矿务局收入向来是由赵

<sup>①</sup> 謝母做寿时，譚延闓亲往祝贺，口称伯母，謝母受宠若惊，经常训勉謝国光“不要忘记譚督军的恩典”。

直接掌握的。这一行动不仅侵犯了赵的利益，而且严重影响了他的威信。七月二日，赵采取“杀鸡吓猴”的手段，下令裁撤沅陵鎮守使，調蔡为誥武堂督办，所部九、十两旅拨归第一、第二两师节制。于是宋、魯、謝、吳四人又到湘乡举行会议，商讨对策。吳在会议上态度最为激昂，主张发劲倒赵之师，推宋鶴庚繼任湘軍总司令，林支宇繼任省长。謝反对孟浪从事。最后决定四人联名电請赵表示服从孙中山的态度，然后由湘軍团长以上軍官联名通电表示服从省长。这一决定并非拥譚、拥孙，不过是出一个难题来进一步地打击赵的威信，迫使完全就范。

七月十五日，赵被迫通电称孙为“大元帅”，但仍劝其組織联省自治政府，湘軍团长以上軍官联名通电热烈响应。此时蔡鉅猷已就湘西第一軍軍长，并且进兵溆浦、益阳，赵也派賀、唐两旅进攻溆浦、辰州。十八日，宋、魯、謝、吳等联名通电請赵停止用兵，劝蔡退回原防。二十四日，湘軍团长十七人联名通电拥赵，这是中层軍官对宋、魯、謝、吳的一个反击示威之举。

由于赵与宋、魯、謝、吳之間日益形成对立，謝、吳两人由湘乡各归防地，宋、魯两人仍在湘乡电赵表示辞职。譚延闓乘机到衡阳，八月八日宣布就任湖南省长兼湘軍总司令两职，并升任宋等四人为軍长。八月中旬，赵部叶开鑫旅与謝国光旅在株醴一带开始接触，宋、魯在湘乡表示中立。魯在通电中有“畏、炎两公均吾姑，两姑之間难为妇”的一种“妙論”。八月三十一日，赵軍攻下衡阳，不料駐湘潭的叶部第二十五团团长朱耀华突然倒戈偷袭长沙，此时赵的可用之兵已扫数投入前方，因此无法抵抗，仓皇逃走。朱是张輝瓚的外甥，赵曾打軍用电话叫叶加意提防，叶却以身家性命保其无他，不料张輝瓚夜入朱营，这幕戏剧性的变化就突然发生了。

在此以后，赵軍賀、唐两旅由湘西，叶旅繞道湘东，分別回师，于九月十三日重占长沙。此时南北局势对赵有利，在吳佩孚的支援下，譚軍被击败，宋鶴庚离湘赴沪（后又由沪轉粵），魯滌平投机失败，并因妹夫李希尚被杀和袁植、唐希怵等团叛附赵方的緣故，被迫投归譚方。譚率領敗兵退入广东，孙中山任譚为湘軍总司令兼大本营秘书长，并分別任宋、魯、謝、吳、陈（嘉祐）、蔡六人为湘軍第一至第六軍长。譚在南退途中賦詩一首，有“胜固欣然敗亦喜，西风吹泪到昭陵”之句。的确，譚以赤手空拳而来，却帶回了湘軍一两万人作为他的政治資本，虽敗亦有所得。謝国光却抱怨地說：“我則敗固慘然，胜亦不乐。”后来謝在广东病死，宋、吳两人在北伐軍攻贛失败后下台，魯滌平成为在粵湘軍的唯一大将，而譚有此軍事基础，更能見重一时。

### 在国民党内，忽“左”忽右，甘为“伴食宰相”以終

譚在国民党内仍然施展其八面玲瓏的手腕，周旋于左右两派之間，居然头头是道，对于宋子文拉攏尤力。宋因年輕望浅，不为元老派所重，譚却力保其才堪大用，因而宋頗为感激。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合作和国民党改組后，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員。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北上后因病逝世，而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援下，广州革命政府先后消灭了滇桂軍閥和盘据东江的陈家軍，广州革命根据地获得巩固和发展。七月一日国民政府成立，譚被推为国府及軍事委員會委員，所部改編为国民革命軍第二軍（譚兼任軍长，魯滌平为副軍长）。此时湖南局势发生变化，唐生智傾向革命，被任为第八軍长。七月上旬北伐軍入湘，九月打垮了吳佩孚，十一月打垮了孙传芳。一九二七年元旦，国府迁都武汉，譚被

推为代理主席。不久蔣介石背叛革命，在南京成立了另一政府（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这就是国民党所称“宁汉分裂”的时期。

此时湘、鄂、贛三省革命形势空前高涨，工农运动蓬勃一时。譚在武汉改号为“左庵”，竭力把自己打扮成为一个“左派”，但是他的亲戚故旧和一些攀龙附凤之士都是湖南的地主豪紳，在农运高潮中一个个被赶逐到武汉来，他的内心感到非常苦悶。他一面以“左派”姿态隐藏在武汉革命阵营内，一面却又派遣呂苾箴、姜济寰等在南京、江西一带，偷偷摸摸地与蔣勾結。当时国民党宁汉双方也都认为他是“药中甘草”，而在爭相拉攏之中。

馮玉祥調停宁汉时期，譚与孙科以汉方代表資格于八月二十四日前往南京，协商宁汉合作問題。这时，武汉政府内部起了分化，日益走上了动摇与背叛革命的道路。譚本来就是害怕暴力革命、主张保全旧秩序的反动投机官僚，他看见下游反革命势力获得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展开了反共反人民的恶罪活动，正是臭味相投，即改投宁方面成为国民党中央“特別委员会”的核心人物之一<sup>①</sup>。一九二八年一月，蔣介石于伪装下野之后繼續上台，完成了軍事独裁体制，以总司令而兼軍事委员会主席。当时号称为国民党領袖的汪精卫、胡汉民已经先后被逐出国，蔣还不便自己露面“更上一层楼”，便推这位“药中甘草”为国民政府主席，实际上是做他的傀儡工具。蔣还打算派譚兼任第四集团軍总司令，統率程潛、叶开鑫、魯滌平与唐生智旧部<sup>②</sup>，用以抵抗桂系，但因湘軍派系紛歧，无法統

---

① 特別委员会是宁汉合作时期行使党权政权的过渡性最高机关，由此改組国民政府和軍事委员会，实际上是一个包括西山會議派在内的国民党右派集团。

② 此时桂系进占武汉，唐生智被逐下台，所部退入湖南。

一，此議未獲實現。

一九二八年，東北易幟問題解決後，蔣又要在全國統一後的第一個國慶日登上“元首”的寶座，因此十月八日國民黨中央調譚為行政院長，而將國民政府主席註予蔣。譚不但處之泰然，而且在蔣與桂系及馮閻的歷次戰爭中，非常恭順地充當蔣的看家犬。他的地位雖然僅次於蔣，但已成為無足輕重的“大人物”，因此這段時期就沒有詳加敘述的必要了。

譚在主持行政院會議時，往往閉目養神，對討論的問題從來不置可否。他抱定“三不”主義，一不負責，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他把自己磨煉成為一個“伴食圖諾”的“活馮道”。但他也不是完全不開口說話的，例如蔣介石打算起用趙恆惕，即因他的堅決反對而作罷<sup>①</sup>。他除“三不”主義外還有一個“混”字妙訣<sup>②</sup>。他做“太平宰相”，吃得異常考究<sup>③</sup>。他一生的功名富貴都是從“混”字妙訣得來的。除“混”字妙訣外，胡漢民說他還有一個“和”字妙訣<sup>④</sup>。

① 一九二八年蔣在津浦路與孫傳芳、張宗昌作戰時，趙恆惕部賀耀組、葉開鑫等軍均在前方。蔣迎趙到南京擬加以重用，譚力言此人不可靠，蔣只得一度到揚子江飯店回訪趙，從此沒有下文。蔣對南北軍閥兼收并蓄，雖背叛孫中山的陳炯明亦邀特赦（一九二〇年十月三日），但趙終未見用。

② 一九二九年春天，唐生智任軍事參議院院長時，譚偶然向唐流露了兩句真心話：“古人所稱‘允執厥中’。‘中’字是人生的第一妙訣，此外還有一個‘混’字是人生的第二妙訣。”

③ 譚有自制的食譜。譚死後，他的廚師在長沙坡子橫街設肆營業，其名菜有“組庵肉”、鵝羹等。

④ 譚死後，胡漢民輓之以聯曰：“景星明月歸天上，和氣春風在眼中”。一九三〇年三月胡在湯山被囚時，有一首詩，題為“憶組庵，仍用師、期韻”。詩曰：“太傅沖和未易師，灌蘭鋤艾尙無詩。擬從吏部規棋癖，肯學君虞有妒痴。風景不殊身逝後，江山無恙我忧時。去年今日經風雨，正復回章索和期。”胡自問修養不及譚，認為譚能夠周旋進退于汪、蔣、胡之間而無所忤，他本人則因性情偏急為蔣所囚。其實，譚對部屬并不和氣，已見上文。

譚以腦溢血症死于一九三〇年九月二十二日，年仅五十五岁。蔣、宋两家族对于譚的死亡的确是抱有沉痛的心情的，蔣下令全国下半旗三天，停止娱乐三天，并給以治喪費一万元。一九三一年九月四日举行“国葬”时，蔣由汉口赶回执紼。譚葬于中山陵側灵谷寺，“財政部长”宋子文拨款为之修墓，宏伟仅次于孙陵。宋美齡为譚的次女譚湘作伐嫁与陈誠，当时陈誠虽不过是一个师长，但已成为蔣王朝的得力骨干之一。

綜觀譚的一生，由一个文人成为地方軍閥，由君主立宪派变为国民党元老，忽“左”忽右，忽汪忽蔣，堪称极尽翻云复雨之能事。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极端腐朽的蔣王朝的下面，他是一个代表官僚、地主階級的典型人物。

## 抗战期间阎锡山和日寇的勾结

南桂馨 赵承绶

### 一、“七七”事变前后阎锡山与日寇的暧昧关系

阎锡山自一九三〇年扩大会议失败后，在逃往大连的期间，同日本就发生了暧昧的关系。一九三一年秋，距“九一八”事变前不久，他突然从大连乘坐日本飞机回到大同，并且在和赵承绶的密谈中，提到张学良“此时方自顾不暇，那能顾及我们”。后来，他的参谋长朱绶光也曾秘密告诉黄国梁说，“华北纵然被日本侵入，山西也不至于陷于兵灾。”从阎锡山当时的行动和上引这些谈话看来，他不仅对于日寇侵占东北以至华北的阴谋有所预闻，而且必然已经同日本有了具体的勾结。他们之间的条件虽然无从详悉，但日寇决不会只限于使阎专管山西，必然要他在华北搞出一种什么局面来，这也是可以肯定的。不过，当后来抗日战争爆发、日寇侵入山西时，八路军和其他抗日部队也同时迅速进入山西作战，这样，就暂时地把阎锡山同日寇勾结、投降日寇的预谋打断了。

此外，阎和日本的暧昧关系，还有以下几种迹象：（一）在“七七”事变前一年，阎的亲信、西北实业公司经理梁汝舟和民政厅长邱仰濬先后到过日本。蒋介石政府曾经电阎询此二人赴日有何事故，阎答以系私人行动。这当然不是什么私人行动，不过个中真相

无从探悉罢了。(二)太原绥署参事苏体仁,一向是代阎办理对日外交事务的,当日寇侵占华北最紧急的一九三六年冬季,苏忽来平,和日人林龟喜经常往还,直至“七七”事变,迄未回任;同时,太原也设立了日本领事馆,日人在太原到处横行。

林龟喜是日本大仓洋行驻北平的经理。当时,凡是日本来的文人政客,大都住在扶桑馆;凡是军人,大都驻在大仓洋行。这地址就在北池子,原为张镇芳的住宅。日本军人经常在这里通过林龟喜与中国亲日派和汉奸们接头,俨然是一个大型的特务机关。林龟喜精通汉语,熟悉中国官场情况,和山西久住平津的官员往来有素,与梁上椿私交更厚(因梁妻是日本人)。梁也是参与秘密的一人,苏体仁与林龟喜的往还,也是通过梁的关系,他们之间互相勾结的具体内容,虽然局外人不得而知,但他们对南桂馨也说过象朱绶光对黄国梁所谈的那些话,两相对照,阎与日本的关系就更为明显了。

山西沦陷后,阎锡山从汉口派宋彻来平,策动南桂馨、温寿泉、苏体仁等回晋成立伪组织。不过阎对他们三人的看法和态度有所不同:他认为南是日本留学生,又是他的属下,在本省也有些声望,假定此际出来替他维持山西局面,可能获得日寇的青睐。南如不出,其次则是苏体仁。苏也是日本留学生,而且替他办理外交有年,是他培养起来的人,自然会听他的话,大事也会和他通气,尽可能不背他的意旨。至于他让温寿泉回去维持,只是陪衬,并非真意,因为在辛亥起义后,温当时是副都督,因和阎意见不合,离开山西;直到山西政权扩展到冀察以后,阎才给他一官半职(河北省建设厅长)。商震去职,温也久已赋闲。同时,温虽留学日本,但和日本人往来不多,日本也不会要他。阎不过是为了敷衍面子,所以也提了



他的名子。总而言之，閻意最好是南、苏合作，否則二人居一。提温并非真意。

## 二、日、閻对南桂馨的誘迫

日本侵华，历来是从多方面寻找它可以利用来作为汉奸走狗的对象，所以，在山西方面除了閻錫山以外，也想拉攏南桂馨。山西内部，原有三派：一是以赵戴文为首的赵派，一是以南桂馨为首的南派，一是以田应璜为首的議員派。議員派自田应璜死后已經分化，而且这一派原来对于山西内部并沒起过重要作用，就是田本人，对閻也是“尊而不亲”，只是过去替閻办办对奉张的外交而已。至于赵派，对閻唯命是听，实际就是閻派。对于某些事敢于在某种程度上与閻对立的，只有南派。日本人想着閻如不能就范，令南回晋，既可以号召他本派的人，又可以吸引他派的人，共回来替他們奴役山西。南虽一再表示“不为”，他們仍然沒有放弃。而且閻从太原撤退到平阳后，在他的“行轅通訊”上，已經刊登出南桂馨准备担任汉奸省长的消息，南在津知道后大憤，因此时电报不通中央，乃托天津电话局长张子奇（局址在英租界，尚未移交日本）代他发一向中央否認“行轅通訊”消息的电报，但张未应允。苏体仁劝他不必介意，以为閻不过“想当然耳”，并无恶意。

正在这时，太原經過一守一攻，一出入，老百姓灾难很重，南、苏及其他在北平的晋籍人士，拼凑了相当数目的赈款，經過日本駐軍同意，由賈政斋持款回太原发放，并仿北平例子，組織維持会。其会长人选，大家提議由一无党无派的老者曾紀綱出任，众无异议。賈回太原后，即成立了維持会，以曾紀綱为会长，并由該会逃出南桂馨为省长，温寿泉为公安厅长，但当时温、南均不知道，后

来也均未就职。

曾紀綱因年老，不久即故去。这时高步青正托南設法参加日伪組織，南因提議由高回晉任維持会长。高初已同意，并由林龟喜介紹，見了日寇駐平特务机关长喜多。但高忽又改变原議，欲作省长。林龟喜大怒，謂南曰：“你們出尔反尔，太不象話，高某不回，你要負責；你无办法，我們有办法！”高知事不了，始又承飭原議。南至此有些畏惧，遂入德国医院，拒見日本任何人物。后为宋彻知晓，唆使日人福田川次郎以向南索債为名（晉北应县曾集股办了一个亚麻公司，南为董事长，买过一架日本“帝国制麻公司”的旧机器，說明公司获利后再偿买价，这时尚未获利，福田出資买到这一債权），大鬧德国医院。此事經德国領事干涉，并由南向大陆銀行挪借两万元，終于了去这笔債務，結果，宋轍之計不售。日方見南回晉无望，乃轉向苏体仁等。

### 三、日、閻与苏体仁

苏体仁是朔县人，本是貧苦出身，經他长兄以仁的培植，留学日本，回国后，因受同乡先輩田应璜的保荐，担任省立一中的校长，又因南桂馨的保荐，調任山西大学預科学长兼督署日文秘书；后来又由他的族侄苏峻山的介紹，結識了赵戴文（俊山为赵的学生）如果按山西的派別說，他是身兼三派的分子，但因他地位較低，所以三派对他都不忌妒。后来他在閻錫山同日本勾結方面曾为閻出力不少，为人也比較謹慎，因而得到閻錫山的信任。

“七七”事变以后，閻派宋彻到平传达閻意时，苏表示如果南桂馨肯回省，他愿帮南，担任秘书长或厅长职务。伪华北政府成立时，日方通过原田（日本大使館参贊），伪方通过王揖唐，拉南桂

馨参加(作建設总署署长),經南拒絕。其他日人也劝苏体仁参加(作次长之类),苏知道南不干,也拒絕了。在南入德国医院后,日本人逼他回晉組織伪省府,他迟疑不决。后来日本宪兵到他家搜索威吓,他因住不起外国医院,就入了蒲伯揚医院,但由于日方的胁迫和林龟喜、梁上椿的劝告,終于一九三八年春决定回晉。他帶着伪华北政府的命令回到山西就任伪省长后,为了对閻表示服从,首先以宋轍为民政厅长。华北各省的伪省长,無論用人行政,都是通过日本顧問,服从特务机关的。但是苏到任后,关于簡任人員,他可和日方商酌任用;各县县长由他陸續撤換的很多(日軍到晉后,利用地痞流氓作县长,这些人勾結日本宪兵和翻譯,欺压人民,无所不至),遇事也可向日本軍方力爭(如日方要增收公粮,苏始終反对),这都是各省沒有的先例,而日方竟能多所容納。日方之所以如此,目的就是要通过苏体仁来勾結閻錫山。

#### 四、“汾阳协定”和“安平會議”

如前所述,自閻由日人护送从大連飞回山西以后,始終和日本通款的,但这不是一根直綫式的发展,而是藕断絲連的。閻是两面派,在国内战争时如此,在抗日战争时也如此。他不是真心抗日,抗日为的是欺騙羣众,抬高身价;他也不敢真心联日,目的是要自存,也就是要挟日本来向蔣介石討价还价。日本和他联系,也不是真要通过他統治华北,而是一种誘降手段,使他脱离抗日陣营,瓦解中国的内部团結。双方各怀鬼胎,从而在抗日期中,閻錫山对日本是亦勾亦抗;日本对閻錫山是亦打亦拉。明白了这些情形,然后再叙“汾阳协定”。

先是,汾阳县的一个区长名白太冲的,因被日本俘虏而作了日

本特务。他带着日本宪兵大矢秘密到吉县见了閻錫山，說明日本愿和他合作。閻在这时，正因傅作义的脱离，陈长捷的动摇，蒋介石的不发餉，旧部走投蒋介石去作官，新軍力主抗日，投向八路軍去革命，眼看着有土崩瓦解、将被消灭的趋势。因此，閻也愿意和日本更进一步地勾結，派总部机要处副处长刘迪吉到了太原，找伪省长苏体仁和梁上椿向日本交換意見。閻在这时，又恐怕部下不赞成他的这种做法，所以強調他的两句格言：“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大作思想动员。那就是說，为了他自己的存在，勾結日本，甚至投降日本，也是合理合法的；至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是不在他心上的。

苏、梁提出了閻錫山的具体要求以后，太原日本軍部认为閻的要求太奢，几乎攔了半年，沒有决定。后来日本陆軍省特派田中隆吉到太原說，只要閻肯合作，任何条件，都可暫应允；言外之意，就是等他通电脱离抗日陣营之后，什么条件，都可不算。太原日本軍部接受了这个指示，因而答应了閻的要求。在“汾阳协定”之前，閻派赵承綬到了孝义县白壁关村，通过白太冲和日本駐汾阳旅团的参謀长宮内协商，要求日方先把孝义县城让出来，由閻派軍接防。日方应允后，赵承綬的部队就开进了孝义，这就为“汾阳协定、閻日合作”先打开了通道。

“汾阳协定”的时间是一九四零年夏秋之交，双方代表人如下：

閻方代表：赵承綬、温怀光（三十三軍軍长）；

日方代表：安边（华北軍参謀长）、南山秀吉（太原日軍参謀长）；

中介人：苏体仁、梁上椿。

协定主旨是“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内容共有二十多条，因年久了，不能逐条记忆，但其要点不外以下几项：

閻向日本要求：

（一）給予步枪五万支、輕机枪五千支、重机枪五百支、子弹若干万粒；

（二）給予軍費七百万元；

（三）条約签定后，即由山西伪省府供給閻軍全部給养；

（四）先由伪省府从山西境内代閻招足五十个团的兵数，使閻回到太原，統治山西；然后再編五十个团，使閻进驻北京，統治华北；

（五）日本把山西省的政权交还閻錫山，由閻委人陸續接任各县县长职务。

日本向閻要求：

（一）閻通电全国，脱离抗日陣营；

（二）閻將小船窝的黄河渡口交給日軍駐守（意在断絕閻和蔣介石的联系）；

（三）閻所統率的軍隊，营以上的单位必須請日本人任顧問或指导官；

（四）閻先將他的总司令部移到孝义城内，并在太原、汾阳、孝义、运城、临汾等处設立联合办事处，互通情报。

在这协定成立后，日本就給了閻步枪一千支、軍粮五千石，在孝义拨付，作为定物。但双方对此协定，均无誠意：閻是为了騙取日本武装并推緩对他的攻击；日本是为了騙閻脱离抗日陣营。所以，协定一直沒有履行。过了些时，閻派赵承綬代表他到了太原，

向日军索取“汾阳协定”所允许的军械。赵住了三个来月，年底才回防，但始终未从日方得到任何供给。一九四一年四月，赵承绶又代表阎到了太原，重申前议，催日执行。日本人对赵说：“阎锡山骗遍了中国军阀，难道还想骗我们日本不成？你代表不了阎锡山，我们不和你谈，非和阎面谈不可。”赵住了一星期，就回去复命，结果，又产生了“安平会议”（安平村在吉县，阎很迷信：他驻吉县，取义“万事大吉”；驻宜川，取义“便宜百川”（阎字百川）；这次会议选定安平村，又是取其“平安”之义）。

安平会议的时间是一九四二年五月六日，双方代表人如下：

阎方：阎锡山、赵承绶（集团军总司令）、吴绍之（太原绥靖公署第三办公室中将主任）、杨贞吉（省公安厅长）；

日方：安边（华北军参谋长）、花谷（太原日军参谋长）、岩松（太原日军司令官）；

中介人：苏体仁、梁上椿、林龟喜（林未出席）。

在会议前，阎听说日本人带有照相机、电影机等物，他通知中介人要求日方不得在会议时拍照。但日方未允，竟然照了相并拍了电影。阎很愤怒，对梁上椿说：“这点事都办不到，还能和日本人共事吗？”而且阎希望日本先给军械，日本希望阎先行通电，进驻孝义，矛盾重重，会议自不可能有何结果。在会议上阎发言说：“我们的中日合作，只能承认日本是盟主，中国的一切，必须自主。共荣不能是日本独荣，共存不能是日本独存。照你们的办法，我无法向中国人交代，从而也不能号召中国人。如果是要名存实亡的政府，现在南京已经有了汪精卫，北京也有了王揖唐，何必要我呢？”在阎发言时，花谷掉头不听，昏昏欲睡。花谷发言时，态度傲慢，用教训的口吻对阎说：“珍珠港一战，英、美都被我们打垮了，何况蒋介石？”

日本有必胜的把握,你如愿和我们合作(就是投降),这时机万不可失,稍纵即逝,你要三思。”会议就开到这里,不欢而散。会后,日本又要求阎锡山立即通电脱离抗日阵营,阎谓考虑一个时间再说,会谈就此决裂了。日方来时用骡马运来了很多礼品和四百万现钞,本来是用以诱阎的,会议决裂后,又原封未动地运回太原。

在会议以前,阎还有意拉拢日本,自得到珍珠港事件的消息以后,他认为日本得罪英、美,非失败不可,但会议已定,只好开一开,可是从此更无诚意,所以说了以上的那些话;但他在太原和汾阳所设的办事处并未撤销,同日寇的关系还是藕断丝连。日本人回太原后,大骂阎锡山,并且印发了若干传单和会议的照片,用飞机散发到蒋区重庆、西安一带。日人此举原系有意用来伤害阎的,但蒋介石得悉后,反而恐怕他真和日本人合作,急派徐永昌、贾景德向他疏通,以后军饷如数按月发放,并给贾景德以铨叙部部长的位置。阎的困难,反而因此解决了;日本没利用了阎,反而被阎利用了。日本鬼子“鬼”,阎比他们更“鬼”。

日本之用苏体仁,原来是企图利用他来联络阎锡山的,现在既然同阎锡山弄僵了,当然也就要把他甩掉。因此,日方首先裁掉他的特别费。其次,花谷授意日本顾问经常殴打省府职员,使苏难堪,并逼苏把撤换了的阳曲县县长么伯璋(日本侵入太原时委任,原是亨得利钟表眼镜行技师。)立刻复任,还向他道了歉。苏受此种屈辱,他的伪省长再也作不下去了。这年冬季,他被调为伪北平市市长,就借此溜之大吉。苏体仁在调伪北平市市长后几天,就转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最后作了王荫泰的政务长官。但他每转一任,均向阎报告经过,请示应付策略;他们的关系,始终是密切的。

## 五、馮司直与王驥

馮司直是本省平定县籍，清朝举人，日本經緯学校毕业，能說日語。他原属赵戴文派，曾任省长公署的教育科长兼省教育会的会长。后来崔廷献繼南桂馨作天津市长时，他又作了天津市府秘书长；回省后也作过教育厅长。不管什么时候，他总是往上爬，山西淪陷以后，他既是留日学生，就认为时机不可失，总想要取得伪省长的地位。日寇在华北各省以至各县，都設有“新民会”，这一机构是日寇利用汉奸来奴化中国人民的工具，凡作新民会领导的人物，必須是死心塌地、甘愿作日寇的忠实走狗的头号汉奸，而馮就是这一类的人物，担任了山西省新民会的会长。但他不滿意于这个地位，在苏体仁作伪省长时期，他就常常向日本鬼子方面造謠攻击，借此献媚，并且利用与伪华北政府的政务委员长王揖唐同年的关系（王和他是同在一年中的举人），与王大事拉攏，互換照片，互和詩篇，借图达到取苏而代之的目的。苏既調到北平，水到渠成，他就繼苏作了山西的伪省长。他既然甘心作大汉奸，当然为虎作倀，唯日本顧問之命是听。久之，輿論大为不滿，就是他的同类人們，也恨他过于无能。日寇知道他不能很好的达到奴役山西人民的目的，終于把他甩掉，使王驥接替他的伪省长的职务。

王驥是山西寿阳县人，早年他的同县人崔廷献作保晉煤矿公司經理时，他作稽核，可以說是受崔廷献的卵翼而起来的。他后来漸漸上升，居然作了省銀行的經理。抗战时期，他不知为了何事，和閻錫山不合，这时崔廷献住在香港，他也就跑到香港住起来了。珍珠港事件后，崔认为日本在中国可以持久，慫恿王設法回省参加日伪組織，相机行事。这时日軍駐晉的參謀长花谷，以前在伪滿任



职时和在南满铁路作事的王驥同县人赵某很熟。王驥有此线索，就北上找赵介绍他见了花谷，先任桐旭医院院长；在馮司直作省长时，轉任教育厅长。他知道馮作不下去的时候，又有花谷的靠山，他也渐渐活动起来了。然而这一举动，大为在北平的閻派人物所不满，因而林龟喜一类的日本人也通不过。王驥知道这种消息，亲到北平找到梁上椿。梁說：“馮司直敢背閻独立作了省长，将来一定杀头。你和他不同，受过閻的培养，也作这个勾当，真是大胆！”王表示絕无背閻之意，至于泣下，并請梁代为設法。后来梁也替他向日方疏通，終于取得了伪省长的地位，一直維持到日寇投降。

由此可見，閻錫山对于山西，即使在淪陷时期，也毫不放松，而是千万百計地通过他的一些亲信羽翼同日寇沆瀣一气，串通勾結，来維持他的統治。

(李秦葵記)

## 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親历記

周 大 文

### 一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早，我到中南海內福祿居密电处上班，在中南海丰泽园后上房与大元帅府秘书长任毓麟相晤，他匆忙地告訴我：“大元帅今天决定回奉，你可以回家作些准备。”我听到这話，即时回家把行李收拾好，随即回到中南海待命出发。是日午后六时我率領密电处全体人員約二十余名到东車站，并在行前发了一件密电致奉天留守吳俊陞，通知他如有要电可拍到京奉沿綫专車中。晚上八点多鐘张作霖来到車站，随行的人除大元帅府人員和卫队外，有靳云鵬、潘复、何丰林、刘哲、莫德惠、于国翰、閻泽溥、张作霖的六太太和三公子学曾、日籍顧問町野和仪我等。专車共有二十二节，张作霖乘坐的包車在中間，是前清慈禧太后所乘的花車。包車后边是飯車，前边是两輛兰鋼車，刘哲、莫德惠、于国翰等在这两輛兰鋼車中。在专車前面，还有一列压道車。

我們这次随张作霖出关回奉，許多人心里都有些忐忑不安，耽心会发生什么事故，因为前些日子张作霖同日本公使芳泽謙吉有过一場面对面的严重冲突。

五月十七日晚上张作霖正和梁士詒、李宜威等几位客人打麻将牌的时候，芳泽来訪（是預先約定的）。梁、李等人要走，张作霖堅留他們說：“我与芳泽没有什么可談的，不大工夫就能說完。”可

是他由純一齋里間屋出来会见芳泽以后，过了很长一阵时间还没谈完。在里間屋的那几位客人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大家叫李宜威去听听他们说什么，因为李懂得日语。李听了听，也没听出什么来，只听到张作霖说：“我这臭皮囊不要了（“臭皮囊”是张作霖常用的口头语），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们抬不起头来的事情。”跟着，不待芳泽辞去，他就先离开了客厅进入里間。当时留在里間的几位客人都很惊讶，不知道芳泽究竟提出什么问题惹起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

事后据张作霖的承启官长赵锡福和当时在场的差官们透露，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晚上芳泽来见张作霖，向他提出了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的无理要求，并且诱惑张作霖说，如果他能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张作霖未为所动，正色回答说：“我们家中的事，不劳邻居费心，谢谢你们的好意。”芳泽说：“你们打得过北伐军吗？”张作霖说：“若打不过他们，我们可以退出关外。”芳泽说：“恐怕未必能回得去吧。”张作霖说：“关外是我们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芳泽见张作霖不能上套，就进一步采取威胁手段，从怀里掏出一张纸单来交给张作霖（可能就是日本政府关于满洲问题警告南北两方的党书），接着又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回答说，他尚未接到报告。芳泽竟然用恫喝的口吻对他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该负一切责任。”张听罢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里的翡翠咀旱烟袋猛力向地下一摔，摔成两段，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未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他说完之后，就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就这样收场了。

张作霖和芳泽既有了这么一场严重的冲突，所以我们大家在临行时都有一种惴惴不安的预感，惟恐在山海关出事。我在出发时私自备妥一个裹伤包，还有两盒饼干，以防万一。

## 二

专车由北京开出后，直驶天津，过津时靳云鹏、潘复、杨毓珣和日籍顾问町野等在津站下去（町野闻系张作霖派往联系阎锡山，他因与阎不熟，准备到天津找一个与阎认识的日军官同去）。专车到山海关时，车站上只有一两名日本守备队站岗，态度如常，看不出紧张的样子。吴俊陞已先由奉天赶到山海关站迎接，他还向我说：“老弟，给我来的电报看见了，你们都辛苦了。”

专车平安开出山海关后，大家觉得放了心，都解衣而睡。吴俊陞上车同张作霖见了面，彼此说了几句话之后，他们就和刘哲、莫德惠、常蔭槐等玩了一夜扑克牌，一直到快到皇姑屯时才散。车到新民时已经天亮，我看沿铁路两旁皆有步哨警戒，面向外立，作预备放姿式，十余步就是一岗。可是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地点附近，就没有看到哨兵警戒了。

专车过皇姑屯时，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接。齐登车后，专车即向东行驶，开往小西边门外奉天车站。数分钟后穿过南满铁路桥洞时，我正在走廊向外张望，忽见南边有两个着黄色制服的人跑上南满铁路大堤。我进入包房，尚未坐定，即闻轰然一声巨响，刹那间又是一声，比前一声更大，车才煞住，我被震昏倒在地下。等我恢复知觉，睁眼一看，包房里车窗和窗前小桌不知去向，满地都是玻璃碎片。当时我疑惑已经受伤，可是试试四肢皆能转动，站起来又摸摸身上，也如平常，并无疼痛之处，只发现左手掌流血，可能是被

碎玻璃扎破的。我取出药布药棉擦了伤口，没来得及包扎，就赶快跑出包房。在车厢走廊上看见我们的机枪卫队，排列向南北两方扫射约数秒钟，经何丰林喝令停止射击，枪声停止。我下车一看，大吃一惊，张作霖那辆包车全部车箱塌下，已不成车形，后边那辆饭车也是一样，还直冒烟，开始起火。再一看南满路铁桥东面桥栏矮铁墙炸的向天竖立起来，洋灰桥墩东面上半截炸去三分之一。这时大家忙于抢救受伤的人员，首先我看见吴俊陞被数人架上一辆皮棚马车，向市内而去（后据闻当时已死，头顶穿入一大铁钉）。又看见日籍顾问仪我满面是血，向车头方面跑去。又看见莫德惠从车上抬下来，送赴小西边门外奉天市立医院，刘哲是带着伤自己步行走去的。这时张作霖已经被抬上宪兵司令齐恩铭的一辆破旧汽车，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车中，回转帅府去了。当时我叫勤务兵郭万元到列车上把照相机取来，准备摄影。正在此时，由南方沿着南满铁路来了一队日本军，持枪向我列车方面跃进。我赶紧跑入市内，因而未能把这有历史价值的照相拍成，至今思之，真是遗憾。

我入市内，因为不了解这事是否有内部原因，所以未敢逕直回家，先给家中去了一个电话试探一下。接电话的是家中的厨师老褚，我问他听见响声没有，知道不知道是什么事，他回答说，听见了响声，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回答的话说得很流畅而自然，估计大致没有什么问题，我这才回家。我一到家，就先给北京张学良打电话，没叫通。恰好奉天电报局局长张志忻来看我，我立刻求他到密电处代发一个急电给张学良报告此事，只说“大元帅受伤较重，但不要紧”。随后又给天津胡若愚和张学良的如夫人谷瑞玉打电话报告。我打完电话后，匆匆忙忙洗脸、换换衣服，吃了点东西就赶紧去到帅府。我先到秘书厅见到袁秘书（袁世凯的九弟），他

告訴我說，張作霖因出血過多，無法挽救，已于半小時前故去了，他要我嚴守秘密。

後來張作霖的盧夫人曾經把張作霖臨死時的情況告訴过我。據她說，那天當差官跑進來報告說“大元帥被炸受傷，車已到大門口”的時候，大家慌作一團，趕快跑出去迎接。汽車從花園門口開了進來，大家把張作霖從車上抬入小樓樓下屋內。他滿袖是血，用剪刀把衣服剪開，發現已折斷一臂，隨即派和祉仁承啟接來杜醫官施行緊急治療。這時張作霖還能說話，對盧夫人說：“我受傷太重了，兩條腿都沒了（其實他的腿並沒有斷），恐怕不行啦！告訴小六子（張學良將軍的乳名）以國家為重，好好地干吧！我這臭皮囊不算什麼，叫小六子快回沈陽。”說完不久，就瞑目長逝，時間是六月四日午前九時三十分。

當時軍署參謀長臧式毅怕張作霖去世的消息透露出去，引起地方人心不安，更顧慮日本將會乘機有所舉動，而且張學良還未回來，因此決定嚴守秘密，封鎖消息，並且每日令廚房照常開張作霖的飯，杜醫官天天來府假裝換藥并填寫醫療經過、處方等等，以瞞過日本的窺探。日本方面不斷有人來慰問求見，皆經婉言謝絕。一直到張學良回到沈陽以後，始宣布張作霖于六月廿一日因傷逝世的消息，在哀輓錄、行狀內也是填的六月廿一日，其實都是假日期。

### 三

在張作霖回奉前好幾日，南滿鐵路與京奉鐵路交叉的鐵橋附近一帶，日方即不許行人通過，有日本守備隊在該處放步槍。到六月三日午後，南滿鐵路來往火車全部停止。這事很惹人注意，因為平日南滿鐵路每五分鐘就有一次列車開行。在張作霖決定啟程回

奉的前几天，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曾有密电到平说，老道口（即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地点）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加防备。但是张作霖对这个报告未加重视，给吴俊陞和奉天省长刘尚清去电说：“齐随本帅多年，素知其本性向来轻举妄动，好造谣言，现日本方面对我缓和，勿庸顾虑，应严予申斥”云云。

在上述情况发现之前，五月二十二日夜間在該桥左近还发生了一件日軍用枪刺刀挑死两名所謂“南方便衣队”的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日本駐奉总領事館打电话給奉天交涉署請派員調查，該署派第一科科长关庚泽前往。后据关向我所述調查情况如下：

他来到現場，見地上倒有年約三十余岁的男尸两具，身着新灰布制服，足穿黑布洒鞋。尸首旁放着一个破搪磁面盆，里面有两个上锈的小炸弹，在死尸的旁边，还有印着“救国軍总司令部公用笺”字样的一张信笺，上面写着“茲派×××等去东北三省一带工作”。据日方说：“这是南方派来的两名便衣队来扰乱东北的，走到我們守备队步哨网內，向他們盘詰，他們不答，我們就照軍規把他們扎死了。”但是，据关庚泽說，在調查这个案件以后二三天，又发生了一件事，揭穿了日方所布置的这个“南方便衣队”的阴谋：头几天奉天監獄忽然跑来一名身着灰布制服、黑布洒鞋的人請求收容保护。据这个人說：“我們数人在南滿站作小工，因吸食白面，被日本警察抓走，拘留在一处，也沒有审問，先給我剃头洗澡，然后換上我穿着的这身新衣服和新鞋，并且給我們吃好的，喝好的。住了好几天以后，昨天半夜忽然把我們几个人叫出来，帶到南滿路鉄桥地方，對我們說：‘你們隨便走吧’。当时我觉得莫明其妙，可是我准知道日本小鬼沒安好心眼，我早就提防上了。果然，这时过来几个日本兵，一語未发，用枪刺向头先的几个人就扎。我一看不好，撒腿飞跑，拼

命逃进城来，那几个人死活不知”等語。

皇姑屯炸車案发生后，日本总領事館派內田領事到交涉署請派員会同調查，該署署长高清和仍派科长关庚泽前往。关来到現場，看見桥帮被炸改形，桥上鉄板被炸得飞出去很远，洋灰桥墩东头炸去一部，火車两輛已无車箱，光剩底盘。关科长按照現場情形推測，爆炸物显然是由上而下的，其破坏力之大，也非手擲炸弹可及。旋軍署參謀长臧式毅又令兵工厂派专家前往查勘。据兵工厂两名白俄技师报称，根据爆炸的破坏情况来看，爆炸物須在五百磅左右，才能有这样大的破坏力量，爆炸物是装置在南滿鉄路桥上的，装置这样重的爆炸物，絕非徒手所能办到，而且装置所需要的时间至少須数小时。

关庚泽会同日本內田領事到現場調查的第二天，內田又到交涉署找他，拿出一张用打字机打好的日文报告，硬說这次爆炸是南方派来的便衣队所为，要他签名盖章，联合彙报，当經他拒絕。內田威胁关說：“如果你不签名盖章，日本軍人将对你过不去，于你不利。”关回答說：“张大元帅偌大的人物都被炸伤，我这样一个小脚色又算什么呢，任凭它吧。”內田无法，只好辞去。

在炸車案发生的当天，陶尚銘曾到关东軍司令部找齋藤參謀长探問炸車案情形，齋藤也推說：“这里得到的情报，此事是南方便衣队所为。”陶以后多方探訪，始知是日本关东軍大佐參謀河本大作所为。一九二九年春日本众議院曾为某重大案件（即指皇姑屯炸車案）向軍部提出質問时，始把河本大作大佐免职。一九三〇年河本来奉，住奉天滿鉄医院时，滿鉄本社情报課課員野田兰藏是河本密友，向他問炸車事始末，他回答說：“这事就算我干的吧，否則牽連过多”云云。



## 韓復榘的特諜隊和张宗昌的被杀

王 慰 农

抗战以前韓復榘統治山东时期,我曾在济南市政府作小職員,因为我沒有参加韓復榘的領導集团,所以对韓復榘統治山东的内幕了解得是不够的。为了响应周总理的号召,特将我在当时接触到的一鳞半爪的事情写出来,以供参考。

### 一、青年党与特別偵諜隊

一九三二年四月,我正在賦閑,住在济南市政府第二宿舍,某日忽被市长聞承烈召見,同时被召見的还有卓肇之(四川人,原为聞承烈兵站監部職員,是时也在济南閑往)。聞承烈很严肃地对我们說,要派我們两人参加一个秘密工作,即参加韓復榘所部三路軍軍法处所屬特別偵諜隊,具体工作是随着承审員出庭录口供、整理案卷。他还告訴我們:“特別偵諜隊是由青年党組成,負責緝捕山东境內的共产党。你們的主要任务是了解每一件案情和他們的活動情况(指青年党的政治活动),常常回来报告,要和靳參事(靳芳洲)联系。”

特別偵諜隊隊部設在商埠緯十經七路路南、路北兩幢小樓內,对外不公开,由軍法处命令商埠公安局加意保护,但不許查戶口。审案地点在城內省公安局司法科,并借用看守所羈押人犯,借用司

法科的政警作刑訊時的行刑者。隊長程鳳平(真名不知道,大概是姓陳),秘書王飛鵬(真名不知道),承審員張守義(真名翟蒼陸,河南登封一帶人,日本留學生)。隊員有嚴、段、張、劉、李、戚、黃(女,系已故青年黨某人之妻)等姓約五六十人,全是青年黨黨員。另有三個非青年黨的隊員,是韓子敬(天津人,麻臉,曾作過津浦路天津廠工會的負責人)、徐子才(河北省某縣人,左眼有毛病)、于芝生(河北寧河縣人,留蘇學生,回國不久)三人,均系在天津被捕叛變的共產黨叛黨分子,由青年黨向天津公安局要來作工作的(當時天津公安局長為張學銘,曾利用青年黨在津逮捕過一批共產黨員,據說張也是青年黨)。我和卓華之兩人,則是聞承烈派來的非青年黨的隊員。後來聞又派王子通(西北軍老軍官)、桑平伯(魯西人,北大畢業生)兩人參加。

青年黨在隊內公開活動,他們出版《南鍼》月刊,內容除了引伸他們黨所標榜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理論外,還發表一些反共言論。他們同黨見面,互稱“同學”。他們以每月收入的百分之一交黨費。這些事,他們都不迴避我們。他們每月有一次到兩次的黨會,就在路北樓上他們的黨部舉行;他們的黨部禁止非同學入內。

特別偵諜隊系一九三二年一、二月間成立的,成立的起因是青年黨黨魁曾琦向山東省主席韓復榘危言聳聽地說共產黨在山東如何活躍,要赤化山東,……他打保票,要在一年之內把山東境內的共產黨全部肅清(這是後來聽說的)。特別偵諜隊直屬三路軍軍法處,隊內成員每人都發給一個有韓復榘簽名蓋章的特別身分証書,在山東境內可以隨地要求軍警協助捕人,可以隨地檢查郵件,可以免費坐火車、汽車……。從四月份起,韓加派聞承烈為該隊的監視人,而我等又是聞派進去作具體監視工作的人。

特別偵諜隊緝捕共產黨，有三種辦法。第一是利用韓子敬、徐子才、于芝生三個叛黨分子作眼線找舊關係；第二是命令他們的黨員裝扮成進步分子混進共產黨里去（據說姓嚴的在天津曾鑽進共產黨內，逮捕過幾名共產黨員）；第三是檢查信件（用各種藥水試驗可疑的密寫信），檢查進步書刊，再按住址捕人。前兩個辦法在濟南一段沒有起什麼作用，至於第三個辦法，他們花費了不小的力量在郵局檢查信件書刊。他們曾用這種辦法查到大明湖畔司家碼頭一個線索，逮捕了一些嫌疑犯，但是審訊的結果，查明系國民黨改組派秘密活動的系統，只好釋放。另外，他們曾從火車上抓來幾名情緒激昂、好談國事的旅客（那時正是九一八以後），但事實證明，這些人都不是共產黨。

半年的光陰過去了，他們還沒有搞出什麼成績。他們既怕給他們的黨魁丟臉，又怕在山東站不住腳。因此，他們就決定集中全力向曲阜第二師範進攻，因為二師曾演過“子見南子”的話劇，孔家認為是侮辱他們的祖宗，同二師校長宋還吾打官司一直打到南京，結果把宋撤換了，人們還風言風語地說二師是共產黨活動的場所。他們派出大批隊員化裝成小商販、旅客（以參觀孔廟孔陵為名）、學生（以打算到二師升學為名）潛入曲阜，同時在曲阜郵局嚴格檢查二師師生的每件郵件。當時正是暑假前預備大考的階段，二師學生三五成羣，在孔陵草地上溫課，每天總有賣小吃的“商販”、逛孔陵的“旅客”和外地來的“學生”來打擾他們，和他們攀談交朋友。大約前後經過一個多月的時間，特別偵諜隊寫成了一張六、七十人的黑名單，報告了韓復榘。於是在一個酷熱的下午（好像是八月末），由濟南開出一列專車，特別偵諜隊全隊出發了（我也在內），還帶了一連的兵力。到曲阜車站正是夜半，全體下車，跑步

到了曲阜城下。县长不准开城門，程队长焦急暴跳，唯恐走漏消息。后来经过县长用电话向山东省政府联系以后才开了城門。队伍进城后，包围了二师，程队长率队入内，按照名单搜捕，漏掉的很少。五、六十岁的老教师和二十上下的青年学生一律五花大綁，押上火車。当晚在济南公安局司法科开始了“慶审”，用手翦、皮鞭、压槓子諸般酷刑来逼訊这些文弱的师生，有时連司法科的老政警也不忍下手。翟承审还不时停下审問，竭力向行刑的人宣传共产党是毒蛇猛兽，如何共产共妻，要把社会秩序打乱，“现在你們对这些入客气，将来共到你們头上的时候，可不客气哩！”

“曲阜二师是共产党的大本营，曲阜二师的案件是极重要的破获。”——青年党队员們虽然流露着这样得意的言論和乐观的情緒，但是审訊的結果，只搞出一个教国文的老教师肖寄语和一个学生裴康增是其中主要的“罪犯”，他們的罪証是：学生的作文里有“普罗利塔利亚”、老师的批語里有“小布尔乔亚”这样的語汇，另外就是在日記里所写的对政府不战而退、丢失东北三省表示不滿的文字，此外一无所有。后来刘龔潮受刑不过，承認和共产党外围組織发生过联系；裴康增承認搞过学生爱国运动。这样的收获，距离要求相差太远了，而特別偵諜队却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时，他們所作的擅捕濫刑、查扣信件书刊（最初还是扣些社会科学的书籍，后来連字典、辞源都扣，他們还扣留了教育厅长何思源的不少刊物书籍）、侵犯人权等种种助紂为虐的罪恶勾当声聞于外，招致了各阶层广泛的反感和憤怒。山东省国民党省党部和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也向韓复榘提出了質問，因为他們虽然同意搜捕共产党，但他們对于青年党肆无忌惮、藐視他們的法紀的行动却不能容忍；并且当时国民党还不承認这个曾为軍閥作鷹犬、杀过国民党的青年党是

合法的政党。至此，青年党在山东无法无天的行动，虽韓复榘也不能掩护了。大概是在一九三三年春間，特別偵諜队宣告解散。在解散前，程“队长”和黃“队员”結了婚；是年下半年，北京西单大木仓某公寓发生了一件桃色凶杀案，被害人就是程“队长”，凶犯是“同学”，原因是为了爭夺黃“同学”。特別偵諜队解散后，青年党还是留下了段、戚等一部分文化較好的“同学”，在济南商埠办了一个私立渤海中学，校长是孙老头（三路軍师长孙桐萱之父），在当局默許之下，进行半公开地发展青年党的活动。韓子敬、徐子才两人也被留在济南，負責观察、报告共产党的动静，和市政府靳参事联系。我于一九三五年年底轉移到保定河北省政府工作，关于渤海中学的究竟和韓、徐的去向就不知道了。

## 二、张宗昌之死

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下午，济南市政府快要打鈴下班了，突然从市政府的东北方向津浦站（当时市政府設在津浦站南面的旧德国兵营）传来一片枪声。大家都愕然，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工夫不大，由車站传来消息說，张宗昌被人刺杀了。张宗昌是一周前应山东主席韓复榘的邀請来到济南的，韓复榘很隆重地招待他，大家都有耳聞，今天怎么又会有人刺杀他呢？由車站繼續传来了消息，才知道是郑参議（山东省政府参議郑繼成）为父报仇。

原来郑繼成的叔父郑金声系馮玉祥部下的軍长，一九二八年北伐时被张宗昌所俘，于张敗退时被张枪决。郑繼成为其叔父承嗣，蓄意报仇。这一天张宗昌要回天津了，趁张上火車的时候，郑用手枪将他打死，并且声明是为父报仇，自行投案，已送往地方法院。

当日晚間据在場目觀此事經過者談：张宗昌是日乘晚六点的

特別快車回天津，帶着他的旧日參謀長金某及護兵兩人，都已上車，車就要開了。張正站在頭等車的門口向站台上送行的人羣打招呼告別之際，鄭繼成突然從送行的人叢中搶前一步，舉槍對張宗昌罵道：“我打死你这个忘八蛋，”不料槍沒打響。張回頭就向車里跑去，鄭上車緊追。張跑到車的盡頭，跳下車來就往東北方向跑去，鄭隨後追來舉槍再打，還是打不響。這時張的護兵追在鄭的後面，向鄭開了一槍，恰巧鄭被鐵軌絆倒，子彈從頭上掠過。鄭的槍因為這一摔，就打響了，鄭的護兵也趕到，開槍打倒了張的護兵。鄭從地上爬起再追，張已倒在十股道附近。鄭趕上去連打兩槍，結束了張宗昌的性命。在他們開槍互擊的時候，停在十股道的兵車開槍彈壓，響起一片槍聲。鄭既打死張宗昌，回到站上高呼“為父報仇，現在投案自首”，當由三路軍駐站辦事處派了十幾名武裝弟兄押送到地方法院。車站送行的人們也散去了，只剩下張的參謀長金某對着張的屍體大哭。也有人談鄭太僥倖了，因為張宗昌本來帶着一支最新式的手槍，前幾天為石友三見到了，極口稱讚這支槍，張即慨然贈給了石。張是紅胡子出身，有名的神槍手，如果那支槍在手，再有几个鄭繼成也不是張的對手。也有人談：前兩天韓主席在省府珍珠泉上西花廳設筵招待張宗昌，張入座後，看遍了同席的人，忽然驚慌失色，有如大禍臨頭地要退席。主人和陪客們也慌里慌張，不知所措，好象有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被客人發現了似的，氣氛非常緊張。過了一會兒，張解釋說，他最忌諱十三這個數字，今天同席正是十三人，一定會有不祥的事情發生。當時陪客中有一人就借故退了席，減十三為十二，但張始終不愉快，好象覺察到殺身之禍，就在眼前。

鄭繼成為父報仇，槍殺張宗昌，並且自首投案，這個消息很快

地传遍了山东，郑继成在人们心目中顿时成了英雄人物。济南法院看守所所长的办公室成了郑的临时会客厅，所长又让出自己的住室作为郑的寢室。仰慕这位英雄的人们前来饋送礼物、慰問致敬的，絡繹不絕。各民众团体、社会組織紛紛向南京发出了請求特赦郑继成的电报，主要理由是，张宗昌祸国殃民，通緝令尚在，人人得而誅之。这时馮玉祥在泰山叫人搜集了有关郑继成为父报仇的文字，印成了小册子，内容有郑继成生平事略和报仇經過，以及济南七十二个同业公会請求特赦郑的电文（其实这些文字大半是我写的，捏造的成分很大，因为市长聞承烈将这一任务交给了社会股主任陆实君，我和陆住一宿舍，成了陆的代笔人，写一篇請我吃一頓小館，是当时酬劳的代价）。这本小册子当时流行得很广泛。時間不久，南京的特赦令来了，郑继成大搖大摆地走出看守所。

在郑案将近結束时，聞承烈将郑的档案要来，交陆实君审閱，陆又交我代看，我当时指出了一处需要糾正，即：法院指定的律师为郑辯护說：“根据檢驗吏的驗断书，张宗昌头部致命的一弹，系步枪弹，郑当时拿的是手枪，因此說郑不是杀人犯。”我認为这是法院有意識地留下的痕迹，应当糾正。陆照我的話报告了聞承烈，后来如何处理，就不知道了。

十年之后（一九四三——一九四四），郑继成在商邱作了汉奸部队头目张嵐峯的座上客，我那时也在张部鬼混，和他朝夕見面，后来也就无話不談了。有一天我問他杀张宗昌的經過，他說：“你見過馮先生印的‘郑继成为父报仇’的小册子嗎？上边写的很清楚。”我說：“你別瞎吹了，那本小册子靠不住。”郑說：“你怎么知道靠不住呢？”我說：“你的事略和杀张的經過是我写的。当时陆实君从济南法院看守所拿来由你口述、由他筆記的材料交給我，我認为

这些素材不漂亮,大部分不能用,我只采用了几点,把它加以夸张渲染,并臆造了一些事实加进去,写成了英雄式的小传,那怎么会靠得住呢?”郑笑了,并说:“你说呢?”我说:“杀张宗昌,是韩复榘有计划、有布置的行动,叫你顶名去干的。石友三先缴了张的械(要了张的手枪),是为了你和送行者的安全;珍珠泉西花厅的宴会上,可能有人露了马脚,以致张有些觉察;再有,法院档案里的验断书上明明写着张宗昌是被步枪打死的,就是被预先停在十股道上的兵车奉韩的命令开枪打死的。你是机会造成的英雄,是韩复榘赠给你的荣誉。”郑说:“你知道得这样清楚,又何必问我呢。”后来我问郑,这案子背后有没有“二统”(中统、军统)指使,并举一九三五年施剑翘杀孙传芳作例子,但他坚不承认。



# 四川綦江战干团惨案回忆

——記抗战期間一件蔣幫特务屠殺  
爱国青年的罪行

周 振 強

## （一）战干一团成立的目的和組織及其主要負責人員

芦沟桥事变后，在伟大的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深怕爱国青年学生跑到延安抗大，增加抗日力量，对他们不利，因而于一九三八年春在武昌南湖成立了干训团（全称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以抗日救国的假面目，大量誘騙爱国青年学生入团，加以法西斯的训练，企图作为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工具。该团由蒋介石自任团长，陈誠兼任副团长，并任命桂永清（留德学生，特务組織“力行社”的組織者）为该团教育长。该团政治部主任起先是邓文仪，后改为滕杰（二人都是力行社的組織者，而滕杰同时是该团三青团負責人）。该团团部之下，直轄三个总队，第一总队总队长楊厚焯，第二总队总队长睢友蘭，第三总队队长萧劲（此三人都是力行社社員）。他们崇拜法西斯希特勒，对进步学生是极端仇視的。他们以滕杰为首，利用三青团特务組織監視学生的言行。一九三九年秋，该团到四川綦江时，团部駐綦江城外外滩子，第一总队駐綦江兴隆場，第二总队駐江津牛角渡，第三总队駐綦江广兴場。

## （二）屠杀爱国青年学生的起因

一九三八年秋武汉被日寇侵占时，該团即由武昌撤退到湖南沅陵。一九三九年春，該团由湖南沅陵迁到四川綦江。在迁移途中，有些进步的职员和学生等組織了一个忠诚剧团，沿途宣传抗日，頗得各地人民的欢迎。不料該剧团因演“李秀成之死”一剧，为当时桂永清派駐該剧团的特务分子密报桂永清，說此剧内容是宣传共产主义，并說該剧团中有共产党組織，等等。桂永清得报后大怒，即轉报当时的政治部部长陈誠。旋得到了陈誠的同意，以国民党組織部頒发的“惩治异党条例”为依据，在一九三九年秋即命該剧团返綦江，以宣传共产主义、有共产党嫌疑的罪名，將該剧团职员和男女学生五十余人分別扣押在綦江枣子园、第一总队駐地兴隆場和第三总队駐地广兴場，并派政治部主任滕杰、总队长楊厚灿、蕭劲負責审讯，并发了六千元作为特务經費，在全团五千余名学生中大事清查所謂共产党。在桂永清这个法西斯措施下，就对进步的爱国青年学生进行大屠杀。

## （三）我奉命彻查此案的經過

一九四〇年六月間，桂永清奉蔣介石令調任駐德国主任武官后，我奉令代理該团教育长。桂永清屠杀学生虽是极端祕密的，但終究瞒不了人民的耳目。当时有不甘心受桂永清屠杀而冒危險逃到重庆的人不少，他們向社会揭发了战干团屠杀学生的真相，这样就引起了当时重庆社会輿論的不滿，都說該团是杀人的魔窟，是野兽吃人的場所。有子女在該团的人們聞到自己的子女被害，紛紛向政治部提出申訴，要求彻查。政治部部长张治中見到問題这样严重，就召我到重庆，詢問該团屠杀学生的真相。我当将我任教育

长后所了解到的桂永清屠杀进步青年学生大約有二百余人的簡略情况报告了他。他听了报告后甚为震惊,說:“这是狼心狗肺的人干的事”,即令我速回綦江彻查此案并将有关人員先行扣押具报。下面是我当时彻查所得到的真实情况。

(1) 桂永清指使部屬屠杀进步学生: 滕固、萧劲、楊厚灿等在桂永清指使之下,为了向蔣介石邀功图賞,就不择手段,采用极殘酷的电刑来审讯进步学生。学生受刑的凄惨情景,据当地人民反映,“比野兽吃人时还要可怕”。因受刑不过,屈打成招,而承認是共产党的学生,都被活埋。例如我在彻查中發現有一个十六岁的姓李的学生写了一本“力行哲学”的稿子,約有二三万字,因其中有一句“这样乱杀人”的話,就被認為是共产党而遭到活埋。凡学生中稍有进步思想或对杀害学生的行为稍有不滿的,都被認為是共产党而遭到殘杀。又如我在彻查中調了一个因受酷刑而成殘废的胡姓学生来問,他說当时大队长楊天威硬說他是共产党,并說他是負責通信的;因为他不承認,就用电刑逼他,他因受刑不过,只好承認是担任通信的。楊又問他用什么方法通信的,他說是用无綫电。楊又問他无綫电机藏在那里,他就胡乱說是埋在后面山上。后来楊逼他交出无綫电机时,他迫于无奈,于夜間将自己的挂表拆散,当作无綫电机零件繳了去;他还乱招了許多同学是共产党。

从一九三九年冬到一九四〇年春这一段时期中,被害的学生在名册中有案可查的,計有:被总队长楊厚灿、中队长胡某等活埋在兴隆場附近山中的第一总队学生約六十三名;被总队长萧劲、大队长楊天威、张少泉、总队附陈焜活埋在广兴場附近山中的第三总队学生一百二十四人;由政治部主任滕杰、特务連連附桂清庭活埋在綦江桥江鎮附近山中的二十三名。以上共計二百一十名。沒有名册可查的大約估計有五六十名。此外,因受刑致成殘废的約四

十余名，被認為有共产党嫌疑而被監視的約有三百余名之多。

(2) 伪造証据：我在彻查中，調了第三总队总队附陈焜来問：“你們杀了的共产党，有什么証据？”他說：“沒有凭据。”我又問他：“传单、标語是什么地方来的？”他說：“是萧劲印好，暗中派我散发的。”后来又調总队部書記徐国全来問，他說传单标語是萧劲秘密叫他印的。

(3) 侵吞学生財物：(一)据当时第三总队部書記徐国全报告說，萧劲在收发室沒收了被杀害的学生的挂号信約八十余封，內有汇款約千元；萧劲还常冒用被杀害的学生姓名写信向他們家里繼續要錢。(二)我在楊天威、张少泉、胡中队长等家中查出他們吞沒被杀害学生的財物，計有：各类挂表、手表約七十余只，西装、中山装一百余套，各种毛毯一百五十余条，一二錢重的金戒指三十余个。

我将上述桂永清及其部属屠杀爱国青年学生的真实情况报告政治部部长张治中后，他当即命令我說，对殘废的学生要好好医治，对所謂有共产党嫌疑的学生要好好安慰，将扣押的人員楊天威、张少泉等七名連同脏物送軍法司懲办，对逃跑了的萧劲、楊厚灿要我呈报通緝。他并慨叹說：“这真是‘忠党爱国，屠杀青年；服从命令，謀財害命’。”事后他亲自到綦江对学生慰問了一次。

战干一團杀了这样多的学生，如全部公布，势必引起社会的震动，会受到共产党的責难，所以当时政治部第一厅副厅长袁守謙秘密指示我，将被杀害的学生只报二十余名，其余的从一九三八年学生入伍时起陸續以开除、逃亡等伪造名义分期报請备查；如有来文詢問学生下落的，可以用开除、逃亡申复，并囑我将战干一團限三个月內結束。我奉到这个指示后，就一一照办，并将战干一團于一九四一年一月間全部結束。

## 附 載

# 編写“辛亥革命到太原解放 山西历史資料”工作總結

**編者按：**山西省編寫了一部关于閻錫山統治山西將近四十年的史料，不久就要出版。據我們了解，他們在編寫这一本书的过程中，獲得了不少的寶貴經驗，这些經驗对于我們征集和撰寫文史資料的工作有很大幫助，現在把他們的工作總結先在本刊發表，供作參考。

### 一、編 写 过 程

我們这次編写“辛亥革命到太原解放山西历史資料”的工作，是在中共山西省委和省人委、省政协直接領導和督促之下进行的。这个工作从一九五九年九月六日开始，經過了拟提綱、分組編写、綜合审查整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九月六日到九月底，編拟了提綱，向各方面征求意见，最后并作了修改补充；第二阶段从国庆节后到十二月底，分組編写出初稿，彙集起来有三十三万多字；第三阶段从一九六〇年元旦后至三月廿八日，进行了全面审查和系統的整理工作。前后历时六个多月，完成全部初稿共八篇、十七章、一百二十九节，計三十六万三千多字，另附有一般社会經濟专稿，总共

近五十万字。

去年九月底提綱确定以后,随即选調有关人員,按內容性質,分为軍事、政治經濟、党团、对外关系四个組,分头研究編写。参加編写的人員,計軍事組十六人,政治經濟組九人,党团組三人,对外关系組三人,共計三十一人。

編写阶段的工作,主要是搜集材料。这次取材,有三个来源:第一是亲身参与过閩錫山反动統治内幕的各項活动、与各个重要問題有关的社会人士的回忆录或口述材料;第二是有关的个人日記或抄件;第三是有关的历史书籍和反动刊物。在軍事和对外关系方面,文献記載較少,以回忆录、口述材料为多;政治經濟方面,以参考文件为多;党团方面,則两者參半。此外,还通过向有关方面函詢、詢問、座談和借閱文件、书籍,以及回忆核对等方式来蒐集資料。前后收到个人提供的宝貴材料如日記、抄件等共五十八件,借閱过省图书馆、文管会、文史館、省参事室、公安厅、市人委、民革、师范学院、十二中学等方面的书籍、刊物共二百二十件。此外,还召开了十七次各种专题座談会,証大家回忆对証,以求真实。

在編写过程中,我們始終遵循着“真实”、“具体”、“丰富”六个字的指示精神,并采取边看、边写、边訪問、边研究、边补充的工作方法;遇到了解不透的問題,随时走訪可能了解的人,或专函詢問,从而做到了写得快、材料多、內容丰富翔实。

初审工作原由历史学家梁园东担任,半途因梁患重病,改送师范学院历史系审閱。师范学院批改了一部分,并提出了书面意見。因此,我們又进行了第三阶段的审查整理工作。

为了尽可能地把第三阶段工作做好,使能系統完整,避免重复,故又重新組織了力量,每組选抽一人,組成綜合性审閱小組,对

初稿进行全面审查。我們参考了师范学院的意见，首先研究确定了审查要点，就是：务求真实具体，詳述事实经过，并特别注意在内容分析上的立场、观点等问题；对于初稿所用的詞彙、概念以及表现的語气等方面，都作了詳細的审查。文字方面，除引用原文者外，一律要求通俗易懂，便于大众閱讀。对一事数次出現者，則分清主次，詳写簡叙，恰当配合，使节节有中心，相互有关联，力求真实詳尽，内容丰富。

我們审查时就按上述要点，集体朗讀原稿，发现问题，提出研究，然后进行修改或改写；对于事实的叙述不圓滿或不具体的，加以补充；对于所叙事实的时间、地点、人物有出入的，经过反复查对，加以訂正。对于部分文字不通順、語意不明显的稿件，也都作了修改。計大返工的軍事稿三十三节、政治經濟稿六节、党团稿六节、对外关系稿七节，其他零星修正补充的占全部稿件节数的一半以上。

经过以上一系列的綜合整理工作，軍事稿删併后，由原来五十五节改成五十节；政治經濟稿删掉二节，补加八节，由原来三十节变成三十六节；党团稿併入軍事稿的四节，由原来三十节变成二十四节；对外关系稿删併后，由原来二十节变成十七节，章数也由原来十八章归併为十七章，全文仍分为八个大段。

## 二、收 获

1. 对辛亥革命后山西近四十年的軍政情况，特别是对閻錫山在各个时期所采取的反动措施，作了比較系統、全面的介紹。

2. 在介紹史实的同时，对閻錫山反共、反人民的本质和阴险毒辣手段以及殘暴凶恶的面貌，作了比較詳細的揭露和批判。

3. 以閻錫山从辛亥革命到太原解放这一长时期内一贯投机取巧、专横暴戾，以及暗中勾结日寇和美帝、危害国家民族的种种滔天罪恶事实，把閻錫山的哲学思想所谓“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这一掩盖罪恶的幕布彻底揭穿。

4. 反映了山西人民在閻錫山反动政权长期统治下的重重灾难，过着牛马不如的悲惨痛苦生活的真实情况。

5. 编写过程中，参与编写人员受到很大的教育，政治水平不断提高，看问题的方法也有所改变。如在审查初稿时，用集体朗读方法进行审查的时候，许多人在一听之下，就能发现稿内有关立场、认识、观点等错误问题，立即提出意见，认真加以修改。因之，大家在编写过程中不但写作能力有所提高，而且进一步认识到閻錫山的罪恶，同时也了解到自己过去对山西政治、经济等方面所起的不同程度的消极作用，并且从今昔对比中，更加体会到解放后在党的挽救和教育帮助下真正做人的幸福和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因而完稿后个个心情舒畅，精神愉快。

### 三、缺 点

1. 所蒐集的資料，因为时间紧迫，在一些细节方面还不够广泛深入，因而有些章节内容感到不够充实，不够丰富。

2. 在开始编写时，各组联系不够紧密，在某些问题上各组没有提出重点，致使初稿在许多章节的内容方面有許多重复矛盾之处，不得不返工整理，因而浪费了人力，拖延了时间。

3. 编写人员，限于政治水平和写作能力，所写稿件，质量还不够高，文字还不够好，特别是对于现代语言所用的词彙和语法修养不够，因而在表述真实情况方面受到了一定的局限。



#### 四、体 会

1. 在計劃撰写以前,大家总觉得都有不少材料可以写,誰也不发愁;但一到提出具体任务,規定期限,要按期完成时,就感到任务重,時間短,材料不够,无法着手,有些恐慌。但是由于党的領導和支持,及时进行了思想动员,反复交待政策,不断解除顧慮,使大家認識了这一工作是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一个組成部分,在材料来源和人力支援等問題上,党也負責予以帮助解决,因而大家胆子壮了,信心足了,这一工作才能順利进行。因此,大家从編写史料的过程中深刻体会到,党的領導,政治掛帅,是完成工作的根本保証。

2. 通过訪問蒐集和集体研究討論,得到許多宝貴材料,不仅使大家开始工作时的愁眉苦脸变为信心十足,而且稿件質量也逐渐提高,真是想到那里就可以做到那里,再也不用发愁了。这样,大家都进一步体会到个人的渺小,如果不依靠党,不走羣众路綫,仅仅依靠个人,想作些什么事情,总是胆小力弱,不敢动手;而依靠党的領導,走羣众路綫,就会力大无穷,智慧万千,这是作好一切工作的有效方法。

3. 在編写工作中,虽然規定了不拘观点,不拘帽子,只要求詳述事实,弄清情况,但如果沒有正确的观点、立場,是不容易写出有价值的資料来的。所以我們一开始就有意識地注意了立場、观点、認識等問題,每一章、每一节都經過反复研究,弄清对錯,辨明是非。这样,不但写出的資料有一定的正确性,即对参与編写的每一个人的思想改造、認識提高,都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4. 在这次編写过程中,我們深切感到,破除顧慮是搞好这一工作的重要关键。因为有些人一牵涉到自己历史上的阴暗面时,总

是不愿写,不是借故推诿,就是避而不谈,或则在众所周知、无法掩饰的情况之下,只是轻描淡写或在无关紧要的琐事上敷衍搪塞一番,这对党所号召的搞清历史实际、弄清事实真象,以教育后一代的精神,是不相符合的。所以必须打通思想,政治挂帅,认识这一工作是建设社会主义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事实上历史虽成过去,真象总会有人知道,谁也无法掩饰,自己不写,总会有人写的,还不如自己忠实地把事实写出来,教育我们的后一代,以取谅于人民。这也是对于一个人的思想认识、政治觉悟的一种考验。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提高思想认识,解除顾虑,真实材料才能不断地涌现出来。

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